

炎黄春秋



我心中的方志敏
从“京九”到京九：
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乌兰夫、傅作义

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

《清宫秘史》作者

姚克不平凡的一生

历史档案中的

杨乃武与小白菜



8
95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主持会议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会长李德生



黄骠军校同学会会长李默庵(右)与张爱萍



出席会议的部分老战士(左起:杨成武,李德生,孙毅,吕正操,萧克,张爱萍,王平,李运昌)

座谈会报道详见本期4页《抗日老战士集会,抚今追昔话统一》

本期导读

我心中的方志敏

——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60周年

有多少当代青少年读过《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知道方志敏烈士的遗言？本刊这期发表的温济泽同志撰写的文章，不仅是缅怀先烈，更主要的是昭示未来。让方志敏烈士高尚的人格风范和革命精神在一代一代的人们心里活着，活下去，天长日久……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

这是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光辉一页，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爱国主义篇章。乌兰夫与傅作义，代表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一方，却能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携手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历经起义、哗变、重建、进军的曲折道路，终于奏响一曲凯歌。

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法西斯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却依然气焰嚣张，矢口否认其罪行。日本辩护律师买通美国律师，千方百计为战犯包庇、开脱，演出一幕幕丑剧。中国法官与各国法官通力合作，严密查证，高举法律的利剑。于是，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反复大较量。

从君主立宪派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话说杨度

杨度，是近代史上一位卓尔不群的政治人物。由于他前半生历经曲折，上下求索，晚年又埋头工作，不计毁誉，以致他在世和死后很长一段时间，被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客。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有反对满清专制，帮助孙中山北伐，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生历程呢！

从“京九”到京九： 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一个世纪前的“京九”铁路，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缩影；一个世纪后的京九铁路，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透过这两幅迥异的画面，可以引发令人思索的话题……

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这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长期以来已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广为传播，不少文献记载也被作为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谬误流传。本文是作者根据清代档案材料，筛选整理而成的。读后可知“奇案”。

下期要目

- △叶剑英与马万祺谊深情笃
- △宋庆龄与三个美国友人的交往
- △高树勋率部起义亲历记
- △太行《新华日报》社长何云殉国录
- △察北抗日同盟军被葬送的悲壮故事
- △“文革”后期被扭曲了的报人办报
- △轰动天京的“杖责天王”事件
- △热心引进西方文化的清朝巡抚徐继畲

通 讯	殒 星 篇	春 秋 笔			
<p>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p> <p>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楔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p> <p>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丁洪章</p> <p>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p> <p>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李华鹏 贝兆江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p> <p>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p>	<p>④ 抗日老战士抚今追昔话统一</p> <p>⑥ 我心中的方志敏</p>	<p>——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六十周年</p>	<p>①① 从「京九」到京九: 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p> <p>②②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抗日军队</p> <p>③③ 一九四〇年宋子文何以赴美求援</p> <p>④④ 屠城血祭</p>	<p>——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十年记</p> <p>⑤⑤ 中国文化宝库的惨痛浩劫</p>	<p>⑥⑥ 东京审判: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p>
	李 耐 因	温 济 泽	徐 庆 全 才 铁 军 刘 江 涛 郝 玉 峰 连 若 雪	殷 学 成	韩 真 王 俊 彦

目 录

<p>编读窗</p>	<p>⑧6 要用准确语言表达历史事件 王人广</p>
<p>古镜台</p>	<p>⑧3 明初削藩的悲喜剧 王世华</p> <p>⑦7 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刘耿生</p>
<p>文荟园</p>	<p>⑦5 写给抗日名将的挽联 吴海发 辑</p>
<p>艺苑志</p>	<p>⑦2 厉慧良五次为毛泽东演戏 刘连群</p>
<p>九州景</p>	<p>⑥9 孙中山、毛泽东海宁观潮 陈伯良 项伟</p>
<p>赤子心</p>	<p>⑥5 为华人增光的曼哈顿建筑师李名仪 艺舟 陈滨</p>
<p>人海浪</p>	<p>⑥1 洪深：一身侠胆的中国「易卜生」 李振家</p> <p>——话说杨度 杨第甫</p> <p>⑤7 从君主立宪派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高梁</p> <p>⑤0 《清宫秘史》作者姚克不平凡的一生 罗昌洪</p>
<p>轶闻录</p>	<p>④8 发动庐山兵谏的邓演达 罗昌洪</p>
<p>英杰谱</p>	<p>④5 张晋遇险与勒石铭恩 黎莹 贾存周</p> <p>——地道战中两位伟大母亲 官洁民</p> <p>④3 舍子忘死护众生 文治虎</p> <p>④1 鸡蛋坨也有五壮士 文治虎</p>

抗日老战士集会 抚今追昔话统一

● 李耐因

1995年6月20日上午。北京城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一扫平日的宁静，热闹起来。今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和山西忻州地委、行署将在这里联合召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

主办单位的领导人黑伯理、李宝光、姜思毅、冯征、杜导正、刘培植、耿文卿、赵凤翔等，8时刚过就来到会场。他们要在这里迎接座谈会的参加者们。今天座谈会的参加者中有50年前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卓有功勋的老将军、老同志，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部分在京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以及著名抗日将领的子女等。

8时半左右，萧克将军到了。抗战初期，他是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是华北敌后战场的名将。今年虽已87岁高龄，却依然神采焕发，步履稳健。他是今天座谈会的主持人。

张爱萍将军到了。他拄着手杖，身材高大而清瘦。他是新四军的名将，大江南北敌后战场留有他的足迹。王平上将到了。抗战期间，他一直活跃在河北、山西战场，是百团大战的参加者。杨成武上将到了。1939年，他指挥部队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本侵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使日军丧胆。新四军著名将领叶飞上将，迈步走进大厅。他当年曾率部夜袭浒墅关据点，火烧虹桥机场。

李德生将军到了。他现在担任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会长，也是今天会议的主人。

李默庵先生坐着轮椅进入大厅。尽管他的手有些发抖，但坚持在签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子。在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州战役中，他是中路军团的左翼指挥官，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同抗击日寇。他回忆起那段经历，便

说：当时全民一致，只有一个敌人。现在他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李默庵先生同萧克将军热烈握手，互致问候。在50年前的忻州战场上，他们曾一道指挥部队抗击日寇。

老同志龚子荣坐着轮椅到了。他已经双目失明，但是他说，这个会一定参加。他委托杜导正代他在签到簿上留下名子。也是双目失明的万毅将军，今天也到会了。随后赶到的是90岁的吕正操上将，他是当年东北抗日先锋队的总队长，冀中战场的名将，东北民主联军的高级将领。

客人们陆续到了。他们中间有李运昌、莫文骅、李力安、熊向晖、穆青、温济泽、李庄、刘延东、程元、杨荫东、林上元、郑庭笈、文强，还有来自美国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沈策、周凌军等。

白鬓苍苍的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以及冯玉祥将军之女冯理达、卫立煌将军之子卫道然、张治中将军之女张素我、吉鸿昌将军之女吉瑞芝、续范亭将军之女续磊等，也赶来与会。

9时整，座谈会开始。萧克主持并致词。萧克将军说，三十一—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空前的民族团结，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韧不拔，经受了血和火的考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反对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关键。今天我们回顾50年前这场战争，就要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和祖国和平统

一事业，警惕分裂主义、投降主义危险。

萧克将军特别指出，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屈辱的时代虽然过去，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悲惨的历史。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国人民伤亡3500多万人，损失和消耗1000亿美元。但是，时至今日，日本一股右翼势力仍拒不承认对中国和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事实。不久前日本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实际上是个不反省、不认罪决议。不承认侵略，就是还梦想侵略，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必须提高警惕。

91岁的李默庵将军在他的讲话中回忆了忻州战役中国共两党两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情景。他说，我作为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深切体会到：中华民族是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者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抚今追昔，深感今日国家之和平、安定、发展局面来之不易。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不懈奋斗。他指出，最近台独分子猖狂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李登辉挟挟自重，为台独活动推波助澜。爱国的中国人和海外黄埔军校同学对李登辉的台独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和谴责。他说，台湾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望台湾当局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台湾独立”是行不通的死胡同。

李德生将军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国人民。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抗日战争初期，曾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冀东抗日联军司令的李运昌同志，在发言中回顾了冀东敌后抗战的情景。他说，敌后战场在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从敌人手中夺回土地，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19块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展开斗争，牵制了侵华日军56%的兵力和95%的伪军。没有敌后战场，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李运昌以他在冀东亲身经历的事实，控诉日军当年的暴行。他说，日军包围了潘家峪，在这个村庄屠杀了1230个村民，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儿童。日军在冀东地区实行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东西700华里、南北200华里的“无人区”，屠杀了几十万我国人民。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悲惨的历史事实，永远不能忘记为保卫祖国光荣牺牲的抗日军民。

吕正操将军用他在冀中抗战的事实，说明离开人民一事无成。他说，冀中抗战的胜利，是冀中800万人

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的结果。我能活到今天，多亏人民的保护。我们继续发扬抗战中那种鱼水一样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我们就无往不胜。

从美国回来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沈策先生，也是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总顾问，今年已经88岁了，但仍然精神矍铄，声音宏亮。他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八项主张，震动台湾，影响极大。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一定要统一，也一定能够统一，任何人逆流而动必将自食恶果。同他一道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的周凌军先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他说，台湾同大陆隔离，是爱国的中国人不愿看到的。少数台独分子鼓噪分裂祖国，是数典忘祖的行为。我们要发扬抗战期间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努力促进祖国统一。

温济泽在座谈会上提出三点倡议。其中包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日本投降的那一天——8月15日，法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要广泛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等。

原山东省副省长马连礼，在座谈会上朗诵了他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和期望祖国统一填写的一首词《鹧鸪仙》。词中有句：“八点主张会有时，人间道、沧桑归宿”。

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也在座谈会上发言。她说她的幼年、青年时代，是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歌声中长大的。她说，父亲常讲，中国要自强，要抗日。教导我们，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誓死卫国。她说，1947年，我同父亲一道到了美国，美国参议员跑来向父亲游说，说：蒋介石不行，美国支持你，你要多少钱美国都给。父亲严词拒绝了。父亲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国人怎么能听从美国人摆布？现在，李登辉花上千万台湾人民的血汗钱，打通访美关节，鼓吹分裂，败坏民族声誉，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中华民族经历百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站起来了，我们绝不容许台湾同祖国分离。

忻州地委书记赵凤翔在发言中介绍了忻州建设情况，欢迎老将军、老同志到忻州参观、访问。

会场上一派同心同德、共谋祖国振兴的气氛。

时光在热烈谈话中流逝。原计划开两个小时，却到了12时座谈会才结束。兴奋中的老将军、老同志们呼喊着：来个合影，来个合影。于是，他们站成一排，肩并肩，膀靠膀，在闪光灯下留下珍贵的纪念。

我心中的方志敏

——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60周年

●温济泽

今年8月6日，是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60周年。他活在我的心中，也差不多有60年了。

那是1935年初冬，我在苏州军人监狱坐牢的时候（这时我已入狱3年多了）。我被关在“新”字监11号（这个监狱有“改”、“过”、“自”、“新”、“病”5个牢房）。一天，看守打开号子（囚室）门上的大铁锁，关进一个新来的政治犯。他中等个子，瘦瘦的，说话带着山东口音，20岁左右，姓郭名三（后来知道他的真名叫郭子清），是南京国民党军官学校的学生，因“共党嫌疑”被捕，判了5年徒刑，解到苏州来的。我们相识以后，知道彼此都是共青团员，年龄又相差不多（我比他大一两岁），晚上睡通铺，他挨在我的身边，因而很亲密。他告诉我，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我也听说了）；他又告诉我，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方志敏先后被捕牺牲（我第一次听说）。

关于方志敏的牺牲，他谈得比较多，比较具体。

对方志敏是怎样被俘的，没说清楚。他只告诉我，方志敏被俘以后，临危不惧，浩气凛然。敌人把他捆绑押往南昌（当时是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所在地），在途经弋阳县城（方志敏家乡）时，敌人企图在城内开所谓“庆祝大会”，借以向群众示威和恐吓。这时红军长征，南方苏区已全部沦陷，但弋阳一带农民闻讯，毫无畏惧，聚集了几千人，扛着锄头、扁担，手持镰刀、棍棒，潮水般地涌进县城，等候囚车到来，准备拼死救出自己的领袖。押车的敌人看到人山人海，不敢停留，沿着城边急驶而去。

到了南昌，在一个公园里开了所谓“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据外国记者报道，这个公园的周围，排满警察队伍，密架机关枪，严禁行人穿行。方志敏带着手铐脚镣站在铁甲车上，器宇轩昂，气吞山河，威严不可侵犯。观众以静默表示对方志敏的尊敬和同情，连蒋

介石军队的官兵亦莫不如此。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一个记者询问方志敏有何感想，他庄严地回答说：“我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我很高兴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敌人没有收到臆想的效果，倒是给方志敏一个宣传的机会。

敌人把方志敏关押在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此后的情况，外界不可得知，只听说方志敏谋划越狱，未成，以后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我在狱中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引起我的悲愤之情和复仇之火，至深至烈，迄今不忘。

关于方志敏被俘及其他情况，是我在出狱之后又过许多年逐步了解清楚的。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出苏区，北上抗日。先遣队起初是由红军第七军团改编的，打出江西、福建，转入浙西，进军皖南，一路遭到国民党军堵击，损失巨大，返回休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将红七军团和新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新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率领，再向皖南挺进，又遇强敌阻击，伤亡巨大，为保存力量，又奉令调回赣东北苏区休整。1935年1月，经过江西德兴县怀玉山区时，主力部队和先头部队被顽敌割断并包围，我军多次突围，冲出大部分，但包围圈也逐渐缩小，最后只剩下八十多人，方志敏总是令别人先走，自己留下。此时已到万分危急时刻，有一个警卫员逃跑，被敌人抓住叛变告密，敌人倾巢出动搜山，方志敏终于不幸被俘。

二

我在狱中还听郭子清说过，方志敏在看守所写过一封给全党同志的遗书，还有其他文稿，托人秘密地带了出来，交给了党组织。对于这件事，我牢记在心。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已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已形成，释放政治犯是两党达成的协议之一。我本来还有7年刑期，也被无条件释放出狱。1938年初，我从上海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7月，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我在中宣部图书室里找到了一本《烈士传》，是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扉页上写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书里有25位烈士的传略，其中有一篇《方志敏同志传》，文中大段地引用了他的遗书。

我怀着既惊喜（看到这本书）又悲痛（那么多同志牺牲）的心情读了这本书，读了这篇传记。我知道了，方志敏1899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考上南昌工业学校，后转到九江教会学校南伟烈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方志敏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部长，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和组织南昌起义，后又组织和领导弋阳一带的游击战争。他开始只有3支枪，其中1支还是坏的，因此群众中流传“方志敏靠两支半枪打天下。”他先在弋阳、横峰建立了苏维埃，以后扩大成二十多个县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就成为赣东北苏维埃和红十军的领导人。他在第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和第二届主席团委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3年国民党曾在南昌、福州等地贴出告示：“凡生擒或献出方志敏头颅者，赏洋5万元。”后又将赏额加到8万元。

我特别着重阅读了传记中引述的方志敏给全党同志的遗书。

遗书说：“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是不能再与你们共同奋斗了，我是如何的惭愧着和难过着呵！……我们虽在狱中，但我们的胸中，仍是不断的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诚仍和从前一样。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恢复这次损失！同志们！越狱恐难可能（主要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就死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上了！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与刘王曹同志^①等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得不到为党拼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弃！同志



方志敏在狱中

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之惨死，提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赶快赶走，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

遗书又说：“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的积极性、坚决性、创造性，用尽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达到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建立！”

遗书最后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固无所怨，更无所惧，……我们坚决相信……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得到全部成功！……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

这是方志敏烈士（当时只有36岁）在英勇就义前的自白，是他从死牢里带出来给全党同志及后代的遗

言，这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面对敌人枪口时最后发出的呐喊，这也是他为拯救全中国和解放全人类奋斗到最后一刻发出的宣言。我是含着泪把它读完的，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到1947年从延安撤退坚壁清野时，才不得不把笔记本烧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又找到了这封遗书的全文，把它抄到笔记本上。一直到八十年代，我又在一本《工作日记》的扉页上，写下方志敏遗书中关于“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那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工作守则。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五千几百万党员，有多少人记得方志敏烈士的英名和知道他的遗书呢？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过去！要永远牢记前辈的那些苦难经历和流血牺牲奋斗的历史。

三

方志敏被关押到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以后，到8月6日英勇就义，在这里度过他一生最后的6个多月。

他开头两次谋划过越狱，未成，就利用狱中可能的但艰难的条件，在他短促一生最后的日子，秘密地写下了16篇约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这是他留给我们和后代的极为珍贵的革命精神遗产。

这些文稿和信件，有些托同情他的看守所文书高易鹏、代理所长凌风格秘密地带出来，辗转交给了党组织，还有大部分托一位可靠的囚友胡逸民秘密收藏，到1936年秋出狱时才设法带出来。胡逸民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的军法官，蒋介石定都南京后，胡逸民担任过中央监狱长，为人正派耿直，被蒋介石猜忌，沦为阶下囚。方志敏与他同关在一个看守所。他崇敬方志敏，在所里多方面帮助过方志敏，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囚友之情。他把方志敏的文稿和信件带出狱以后，秘密地送到了章乃器和胡子婴的手里，转交给鲁迅，又几经周折，才送交党中央。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文稿和信件，大多编成了单行本《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在五六十年代）和《方志敏文集》（1985年）先后出版。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约13000字，到今天仍是我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的历史教材。

《可爱的中国》，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用笔墨写成的文字，而是一位杰出的共产党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救国救民，用血和泪写出惊醒世人和教育后代的宣言。这时方志敏已经是一

个随时会被提出去杀头的死囚。

方志敏是一百多年来受尽列强侵略苦难的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他在《可爱的中国》里沉痛地诉说：当他还在高小读书的时候，听到老师讲述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就心怀愤恨，立下救国之志；后来南昌求学，看到一些“可恶的洋人，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肯与中国人伍的神气”，污蔑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而“愤愤不平”；看到管理中国邮政的“一个碧眼黄发高鼻子的洋人”，坐在由4个中国人抬着轿子里“傲慢自得”，而深为慨叹：“中国的邮政，为什么给外国人管理呢？”有时站在江边远望，看见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自由行驶，而不能不自问：“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们的欺负不成？”有一次在一艘在长江行驶的日本轮船上，看到了个没有钱买票的中国穷人，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殴打、倒吊、侮辱的悲惨情况，他愤怒地自问：“中国人难道真比畜牲都不如了吗？”在九江一个教会学校读书，看到“西人教员”的月薪比中国教员高出十几倍，而异常气愤：“难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宠爱的骄子，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瘪三？”后来漂流到上海，在“法国公园”门口看到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感觉这是“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自问“华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在上海的租界上，“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的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无辜的人们身上乱接；假若你再走到所谓‘西牢’旁边听一听，你一定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在包探捕头拳打脚踢毒刑之下同胞们一声声呼痛的哀音。”他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说：这就是“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呵！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

他诉说了许许多多悲惨的事情，归结起来说：“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问题，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出，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负的青年！”“我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決心。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

他热爱祖国。他说：“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土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

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是无地不美，到处是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为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

他赞美了母亲的可爱和美丽，把笔锋一转，转而向同胞呐喊：“那个叫‘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正在“拿出屠刀……向我们母亲……砍下去！”他还咒骂“我们之中出了败类，眼睁睁地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他大声呼吁：“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

他眼看“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仍自信地说：“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他在临死的时刻，仍憧憬着中国光明的未来，他说：“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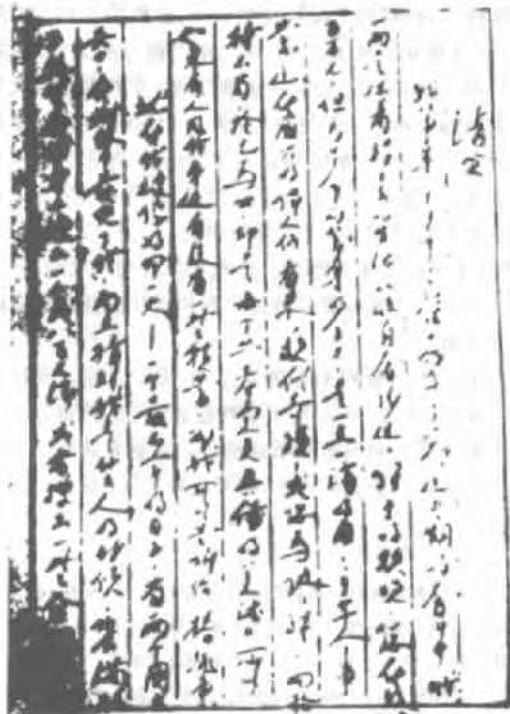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在方志敏牺牲后 14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又有 46 年了。与新中国同龄的和更晚出生的中青年，能较深切了解旧中国苦难的恐怕不多了，那么，你们去读一读《可爱的中国》吧！一个人，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过去。一个中国人，更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过去所受的深重灾难，不能忘记过去在敌人屠刀下牺牲的几百万先烈和被杀戮的几千万同胞！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早被赶跑了，但是，方志敏对中国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还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能把中国建成理想的“明媚的花园。”

四

方志敏的遗书，有一篇题目叫《清贫》，也是我们值得细读和深思的。

这篇文章记述了，方志敏在山林中被俘的时候，有两个国民党军士兵，总想在他身上搜出千百块大洋和



金戒指之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衣领捏到袜底，从衣角找到裤裆，除了一只手表和一枝自来水笔，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出。他们又猜疑他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于是在树丛、山洞、地下又搜寻了一阵，也毫无所得。

《清贫》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指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文章在记叙了上面说的搜身那件事之后又说：“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夏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里保藏着——怕国军（指国民党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夏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文章结尾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的遗文，大多数没有注明写作日期，这一篇的后面倒是注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

60年来，国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我们不再要求过“清贫”的生活。但是，“洁白朴素”，艰苦奋斗，这仍然是我们的“传世宝”，“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啊！以史育人，以史鉴今，今天有些人，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满脑子想着“人民币”，这还能叫“革命者”吗？更有甚者，有些人贪污腐败，盗窃国家财产，挖社会主义墙脚，这已经堕落成“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的病毒和害虫了！江泽民同志在党十四大的报告中说：“腐败分子危害党和人民，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我们一定要把反腐败斗争坚定地持久地进行下去！

五

方志敏被俘以前，在先头部队和主力部队即将被敌军割断，而陷入重围时，他决定派少数人留下接应主力，先头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有人劝方志敏先走，他说：“我自己身为全军最高指挥员，绝不能先走！”在最后一刻被包围的紧急时刻，有人又劝方志敏化装到白区暂

时隐避一下。他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直到不幸被俘。

方志敏被解到南昌关进看守所以后，国民党轮流派人来劝降，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方志敏回答是：“我头只有一个，心没有两条！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有一天，蒋介石也来到方志敏的囚室。蒋介石见他脚上带着镣，马上假惺惺地叫来狱卒把铁镣打开，还强笑着对方志敏说：“方先生，你很有才干，我还要倚重你。只要你在报纸上登个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你就可以自由。我任命你当江西省主席。”方志敏冷淡地坚毅地回答说：“谢谢蒋先生，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你快下令执行吧！”蒋介石连骂几声“娘希匹”，怒冲冲而去。方志敏大义凛然，在床沿上用指甲刻着“视死如归”四个字，有些人看到了都深感钦佩。

在方志敏一生最后的这些日子里，他身居囚室，受到监视，仍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做了不少有利于革命的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发现同被囚禁的红十军团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秘密写条子要他调查红十军团被俘同志的情况，然后经乔信明等的努力，在被俘同志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还将一些被俘后表现很好的人发展入党，加强进行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有些人后来牺牲了，也有些人被判徒刑坐牢，出狱后参加了新四军。方志敏还对所方人员，包括前面说过的文书、代理所长等，进行劝说、引导和教育工作，使其中一些人尽量为被囚人员做一些好事，有的人后来弃暗投明，最突出的是胡逸民，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方志敏还利用特殊条件，秘密写下一批遗文和遗书，除前面说的《在狱中致全党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清贫》外，还有《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十几篇，这些也都是他留给我们后代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值此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60周年之际，我就所闻、所知、所读、所思写下这些纪念文字，希望方志敏烈士高尚的人格风范和革命精神，在更多的一代一代的人们心里活着，活下去，与天地共长久，与日月同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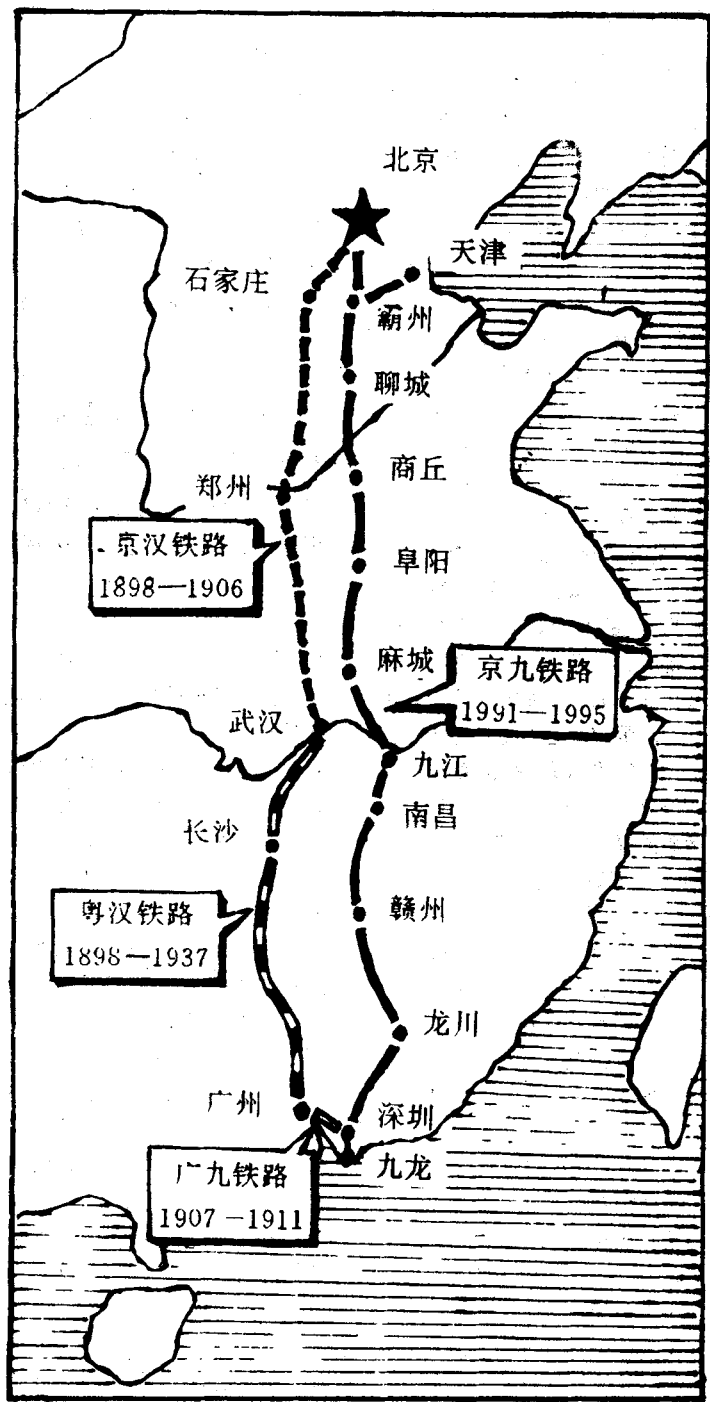
注：与方志敏同时被俘的红十军团干部共35人，起初都囚押在看守所的三等号子（囚室）里（分优待号、二等号和三等号三种），同方志敏关在一个囚室的有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刘畴西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以后方志敏调到优待号。

（责任编辑 王 恂）

“京九”与京九铁路示意图

从「京九」到京九 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 特约记者 徐庆全 才铁军 刘江涛



1991年9月5日,在山东与河南交界处的台前县黄河北岸一个叫孙口的地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欢呼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全长6673.9米的黄河铁路大桥开工剪彩仪式正在举行。邹家华兴致勃勃地按动电钮,启动了试钻桩的第一钻。这隆隆的钻机声,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铁路工程——北京至九龙铁路工程,进入了实施阶段。

这一消息,令国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对于京九这项举世瞩目的铁路工程,1993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京九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是这样的概括的:

“京九铁路,由北往南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线路北起北京,经霸州、衡水、聊城、菏泽、商丘、阜阳、麻城、九江、南昌、向塘、吉安、赣州、龙川至深圳,与九龙相连。全长2538公里(含联络线168公里。)国家一级干线铁路。为我国纵贯南北的又一铁路大干线,是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一项造福人民的宏伟工程。”

京九铁路工程,是中国目前仅次于三峡工程的第二大工程,它享有数个中国铁路建设之最:

总投资额概算达300个亿,其投资规模之巨,为中国铁路建设之最;

全长2538公里的铁路一次建成,开中国铁路建设之先;

从全面施工到全线通车,三年完成,建设周期之短,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前无古人。

全线有桥梁549座,隧道126座,桥隧总长190公里,其工程之浩大,拔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之头筹。

今年12月,这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将开启了,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价的。同时,由于这条铁路的决策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前提下产生的,因而它的建成也将披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但是,事情还不止此。如果我们把镜头向前推一个世纪,以那个时代所酝酿的“京九”铁路为参照物,站在历史的高度透视这项浩大的工程,我们就会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中华民族由屈辱到自立自强的轨迹……

一、在英人麦克唐纳带着一份野心勃勃的铁路计划来到中国后,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这种怪物

184年9月26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英联合声明》。

这一声明,将142年前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割让出去的香港的主权,重新收归中国政府,并规定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时间为:1997年7月1日。

正在酝酿规划北京至九江铁路的领导和专家们,抓住这一历史契机,把九江改成了香港的九龙,使“小京九”变成“大京九”。

香港,中国人民关注的1997!饶有趣味的是,近一个世纪前的“京九”铁路的规划方案的出笼,其落脚点也是在香港上。但不同的是,它的策划者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在这里横行霸道的列强们,首当其冲的是英国人。

1842年8月29日,也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抵御罪恶的鸦片的回报,英国强迫中国签定了《中英南京条

约》,将香港划归为殖民地,实现了蓄谋已久的占领一个海港,并以其为跳板掠夺中国的野心。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纷至沓来的西方列强,已不满足于对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的控制,他们想把掠夺的触角伸至天然水道达不到的广大内地,因而产生了在中国建筑铁路的企图。英国人直言不讳地宣称:“关于我们开发东方帝国的政策,以新辟的道路和交通来代替旧时的战争和吞并领土的政策,成为我国越来越明显的真正的政策。”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1863年秋天,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要机构之一的怡和洋行,请来了本国的铁路专家麦克唐纳·斯蒂文森,实施其在中国建筑铁路的计划。

麦克唐纳一到中国,就策划提出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以汉口为中心,向南经湖南到广州;向北经天津到北京;向西经川、滇到缅甸、印度;向东到上海。构筑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清政府对这个计划根本不感兴趣,其中的原因并非是考虑到铁路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因素,而是因为政府官员们并没有见过铁路。

但是,英国人毫不气馁。为了诱使清皇帝接受他们的计划,1865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长的小铁路,借此大肆宣传,让大清官员们见识见识。可是,这种广告所达到的效果却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大清官员们不但不赏识,反而由步军统领以“见者诧异,谣诼纷起”为由,下令将它拆掉了。

麦克唐纳的计划虽然破产,但是英国后来筹建“京九”铁路的计划却是以此为蓝本的。

英国在建议、请求和引诱毫无

效用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对铁路的无知，与美国相勾结，采取欺骗手段，于1872年组织“吴淞铁道公司”，宣称要修筑一条“寻常马路”，骗取了上海道台沈秉成的默许。1875年，修成了上海苏州河北岸到江湾徐家花园的铁路，企图以此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接受他们的铁路掠夺计划，而清政府自有自己的打算，次年抓住火车轧死人的事故，以“收回自办”为由，动用285000两白银，将铁路赎回。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竟又将铁路拆掉了。

但是，吴淞（上海至吴淞镇）铁路毕竟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看到了新式运输工具的优越性。特别是到了19世纪的六十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人们一改视铁路为怪物的观念，将修筑铁路视为富国强兵主要内容之一。

1882年，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在李鸿章的主持下通车了。但这已然比西方国家落后了半个多世纪。

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并没有看到这一差距，铁路的修筑还是处于步履蹒跚的状态，因为倡议筑路的主修派不得不与反对筑路的顽固派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是，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13年的时间里，一共才筑成铁路348公里，平均每年筑路不足3公里。

甲午中日战争后，顽固派们才放弃了对修筑铁路的阻挠，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为军事运输做出了贡献，显示了它在国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因为此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列强们，纷纷以铁路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清政府只有速建

铁路，才能遏制列强的欲望。

1895年7月，已取代李鸿章主持铁路大计的重臣张之洞，在所上修备储财折中倡言：“中国应开铁路之地甚多，当以卢（卢沟桥）汉（汉口）一路为先，此路南北东西皆适中，便于通引分布，实为诸路纲领。”

张之洞的这一倡言，虽然是步麦克唐纳的后尘，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能认识到这条贯穿南北的铁路对经济的发展意义的人，毕竟算是真知灼见了。

但是，这已经晚了，英国人已经不容许中国人抬起这一“牙慧”了！

二、“京九”铁路前期 蓝图：卢汉铁路修筑权的 争夺

甲午中日战争后签定的《马关条约》，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的贪欲，他们谁也不愿意落在初兴的日本之后，像一群恶狼一样，争先恐

后扑向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短短几年间，辽阔的中国领土，许多划入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各重要的港口遍插外国旗帜，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内河游弋；中国绵长的海岸线，竟没有一处可以作自己的海军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可以控制的中国广大内陆的铁路，也成为帝国主义的觊觎目标了。

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批准“卢汉铁路”最早倡议人张之洞的计划时即指出：鉴于这条铁路“道路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集资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但为防止帝国主插手和掠夺，特别强调“洋股不准”参与招商。

尽管清政府对洋人有防御之心，但列强们还是认为有机可乘，其商人、资本家纷纷来华，竞谋承办。他们各种渠道，从事钻营，或由本国公使向清政府推荐，或向经办铁路的大员提出要求，甚至勾结买办、商人、洋务官吏为之奔走活动。



光绪己亥年的保定府车站

待张之洞为筹建铁路创办的大冶、汉阳铁厂，经营不善，亏累甚多，他不得不将督办卢汉铁路之责交李鸿章手下办理洋务的盛宣怀时，洋人插手的机会到了。因为官款难筹，华股难集，盛宣怀即使有“洋人合股公司，事权全属洋人”、“只能以铁路抵押”的担心，也不得不向洋人借债了。

为了既能借到洋债而又能尽可能避免洋人对路权的操纵，盛宣怀煞费苦心，多方考虑，最后选中了美国。理由是“美国未贷官债（此时清政府已向俄、法、英、德借债），并于中国无所覬觐，铁路工程尤精”，因此，“如借美债，用美匠，各国忌心稍逊”。

总理衙门原封不动批准了盛宣怀的设想，1896年10月20日，命他为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

但是，盛宣怀的想法过于简单了。既然清政府“洋股不准”的规定被打破，卢汉铁路的修筑便形成了“一兔在野，众相追逐”的局面，在弱肉强食的争夺战中，最后得主就容不得盛宣怀来定了。于是，盛宣怀的说贴公布后，列强们立即象苍蝇见血一般纷纷围拢过来。

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的英国，此时，不仅已将长江流域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而且又将香港附近的九龙以99年的租期强占了。麦克唐纳在中国以汉口为中心的庞大的修筑铁路的计划，其北端为北京，南端则延伸到九龙了。

要实现这一方案，就必须力争得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当盛宣怀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时，英国立即乘虚而入。1897年4月初，自称中英公司代表的英人恭佩耳，立即向盛宣怀提出承办卢汉铁路的计划。盛宣怀在走投无路这际，认



京汉铁路黄河边的铁路隧道

为“此机不可失”，立即与英国草议借款400万英镑的合同。合同规定：年息四厘七毫半，九五扣收款，由国家担保，即以卢汉铁路为抵押。与此同时，英国又与盛宣怀草签了另一密约，规定日后中国“造支路与卢汉路连接或造粤（广州）汉（汉口）路，若借洋款”，该公司有优先借款权。

正当英国人为合同和密约的草签弹冠相庆时，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洞察到英国的野心。张之洞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恭佩耳与盛宣怀密约“兼造粤汉”，意在“从香港接路”，如果任其计划实现，“恐随时借端生风，渐图干预”，力主清政府不批准这一合同。

可叹的是，虽然由于张之洞的努力，英国人的阴谋破产了，但限于历史的局限，竟又成全了另外几个列强的野心。张之洞决定向比利时借款，可是，比利时揽办卢汉的借款，是与早有掠夺这条铁路的野心的法国相联系的。张之洞心里虽也清楚，但他认为“比款中即使有法款的成分也无大害”，理由是“即

附有法股，乃法商，非法国也。法商但能分比商之利，岂能出头揽我铁路之权？”

像盛宣怀一样，张之洞的想法也太幼稚了。在此后与比利时签定合同的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不但法国总揽了借债的80%，而且俄国熊也从中得了一杯羹。

1897年5月25日，盛宣怀在武昌与比利时银行工厂合股公司代表签定了《卢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合同规定：借款450万英镑，利息4厘，九扣付款；期限30年；国家批准，以路作押；5年完成。

这年6月，当中比双方议订正式合同时，来中国的比公司代表杜夫尼了解到，当时正在商谈的英德借款的利息为四厘五，以及中国过去几次借款都是有经手行佣的情况时，便要求利息再提高五毫。这样，双方经过一个月的讨论还价，才于7月27日签定了《卢汉铁路借款续增合同》，将利息提高到四厘四毫。

此后，虽然比方又多次进行刁难，清政府都予以满足，但比方仍

不按合同办事。原定于1898年1月24日到期的头批借款，比方却以种种借口拖延。清政府多次交涉，也没有结果。2月22日，法国领事白藻泰、大使吕班以调停为名，袒护比方。吕班公然以比股多系法款为由，向总理衙门提出加息的无理要求；并威胁道：比债若不成，则应按《中法和约》第七款，交与法国承办。法国的干预，使清政府面临着“比办，法必干预；比罢，法必索办”的任人宰割的局面。而且，在清政府与比利时交涉的过程中，俄国公使也面见李鸿章，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了。在1898年6月26日签定的《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中，这条铁路名义上为清政府所有，但它的建造和行车权由比法操纵，而铁路财权则由华俄道胜银行来掌管；他们不仅获取了高至五厘的利息，而且还享有分取二成余利和材料免拿关税的优惠条件。

合同签订后，法、比、俄兴高采烈，把此事当作“出色的外交成就所造成的可喜的结果”大加颂扬，而清政府却在此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卢汉路借债条件之苛刻史无前例，更加刺激了其它列强的胃口，拉开了列强大规模掠夺中国铁路的序幕。英国又急急忙忙地从幕后首先跳出来了。

三、放长线钓大鱼：英国人的眼睛依然没有离开卢汉铁路

英国欲先取卢汉再夺粤汉铁路修筑权的阴谋虽然破产，但它并不甘心失败。在清政府与比利时谈判之际，它先是百般干预；干预失败，又将炮舰云集海上，给清政府

施加压力。但因此时比、法、俄三国联手，英国也无可奈何，只好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首先将本国的工程师金达安插在卢汉路施工的指挥位置上，以充分了解工程的进度，寻找涉足机会；其次，利用贷款和强占的手段，谋取卢汉路外围的关内外铁路的修筑权，然后再向卢汉路渗透。虽然后来英国的这一阴谋又被清政府识破，将关内外铁路收归大清国，但因金达仍居于这条铁路的总管兼总工程师的位置上，所以全路的实际管理权仍统揽于英人手中。

1906年4月1日，全长1214.5公里的卢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改称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在剪彩仪式上，英国人似乎比大清官员和承办此路的比利时及其背后的法、俄人更为高兴。因为英国人正酝酿着坐收渔利的阴谋：

这条铁路的南端本来就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在它又夺取了关内外铁路的实际管理权后，其势力范围又渗透到这条路的北端周围。南北两端既然为其控制，剩下的就是将这条路的实际管理权弄到手了。

英国预测的前景是：这条路是南北交通要道，沿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特别是山西、直隶（今河北）一带的大量煤炭和河南的大宗农产品都要经过该路运输，客货运业务将十分发达，营业盈余额势将逐年增加，是一项大为可图的财源。清政府不甘心比利时这个债主继续分取二成的余利，必有赎回这条路的想法。但是，财力有限，欲达目的，必将采取以债还债的方式。此时，英国即可以不苛刻的贷款条件为诱饵，使自己成为这路的债权人。这一目的达到后，通过逐渐的渗透，就可将这条路的全权抓到手中。这样，就为下一步谋取粤

汉，实现“广九”的“宏伟蓝图”打下了基础。

情况果然如英国所料：在这条路通车一年后，清政府即决定收回了。清政府虽曾否定以债还债的方式，避免使这条路刚出狼窝又入虎掌，决定以试办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但是，这种美好的自立的愿望无异于空想，空嚷嚷一阵没结果后又被迫回到了英国人设想的以债还债的老路上去了。

1908年10月，清政府向英国汇丰银行和法国汇理银行各借250万英镑，期限为30年，前15年利息为五厘，后15年利息四厘五，折扣94。

1909年1月1日，清政府“派京汉铁路局局长梁士诒及该路监督郑清濂，将比公司经手各项文卷、帐目、款项、材料，一并点收，并将抵押卷据，悉数收回；迭次合同，全行作废。”收回了京汉铁路的管理权。

英国虽然没有达到独家垄断借款的目的，但以借款为契机，渗透京汉铁路的阴谋也实现了。随后，英国又将目光盯在了粤汉铁路上。

四、粤汉铁路“去美来英”，广九铁路借此动工

在由汉口接展至广州的粤汉铁路提上修筑日程后，英、俄、法、比都想获得粤汉路的修筑权。

在这“强邻相逼，时是日非”的情况下，1897年冬，湘、鄂、粤三省绅商联合呼吁清政府，以自办的方式，速修粤汉路，以杜塞列强觊觎之心。

1898年1月26日，清政府接受了绅商们速办的建议，却摒弃了自办的方式，依然让盛宣怀借洋款来修筑。盛宣怀在卢汉路借款时，

拉拢美国合兴公司未成，依然对它情有独钟。他一接办粤汉路，就要把这条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和重要的经济价值的南部干路的贷款权让给美商。当人们对他的这一作法提出指责时，他却振振有词：卢汉借比款，沪宁借英款，粤汉借美款，是防止一国独占的补救办法。

美国合兴公司对盛宣怀送上门来的粤汉路贷款权自然是开怀接纳。双方只经过两个月的函电往来，就签定了合同。但是，此时的美国基本上还是个资本输入国，合兴公司尽管大包大揽，但其财力是难以独家承担对粤汉路的投资的。因此，美国合兴公司在签定合同不久，就与英国的中英银公司勾结，双方就联合在华投资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彼此分别以粤汉路和广九

路的投资权折半交换。美国的这一举动，为英国将其势力渗入粤汉路，实现其修筑“广九”的野心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此，美国合兴公司依然没有能力尽快来华开办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在合兴公司中占优势地位的比利时人，涌起了取美而代之的念头，到了1904年的2月，比利时人当上了公司的总经理，粤汉铁路的贷款权实际上转到了比人手中。

美、比置中国人于不顾，私下转让粤汉路权的作法，激起了湘、粤、鄂三省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强烈呼吁废除合同，收回路权。湖广总督张之洞认识到：比用法款，权即属法，卢汉铁路即已如此。若粤汉再归比、法，其害不可思议。因此，他接受了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的主张，力促盛宣怀“按照合同的第十七款声明美公司废约之咎，将此约作废”。甚至，不惜采用“改废约为赎路”的方式，“重在收回路权，不争银数”，以使“美国体面毫无损伤”。

一向爱占便宜的美国，趁机勒索了675万美元的“偿费”。其中300万美元为抵偿已完工的广州至三水支线和两次勘测粤汉全线的费用；375万美元为补贴公司的权力损失。

在中国人与列强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可以据理力争的商业机会中，中国人却成了愿打愿挨的黄盖，真令人扼腕悲叹！

当时的清政府来说，要拿出675万美元赔偿费又谈何容易？唯一的办法仍然是以债抵债。此刻，英国又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了。

英国人毫不犹豫地拿出了110万英镑（约合550万美元），但是，前提条件是张之洞作出了如下的许诺：“将来粤汉铁路修造，……

如需向洋借款，先向英国商”；“如修造粤汉铁路之款已向英国借定，优先采购英国厂商的铁路器材”；“湖北、湖南境内，另有修造铁路之事”，也享有此项优先权。

英国人拿到如此之多的优先权后，又兴致勃勃地拿出了麦克唐纳的路线图，挥笔将正在酝酿的广九铁路线图直接连接到广州。

尽管广州到九龙的广九铁路在1911年完工，但是，英国人想将此路与粤汉、京汉相连的野心也难以实现，因为当英国人在清政府为赎回路权的过程中占尽便宜而洋洋自得时，它根本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也同样没有预料到），正是这一代价高昂的赎路事件，使中国人民不仅彻底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也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自发地揭起了抵制列强、“收回利权”的大旗，中国大地的上空激荡起保路护路的滚滚风云。

此后，历史贻误，虽然清政府、袁世凯政府等仍有拍卖路权换取“外援”的可耻行径，但是并没有为它们起到续命汤作用。列强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困扰，掠夺到手的中国铁路建筑权，难以实施，英国孜孜以求之的在中国获得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控制权的愿望，也彻底破产了。

正因为如此，京汉、粤汉、广九铁路虽然修成并相连，有“京九”铁路之实，但历史上却没有留下“京九”铁路之名。——这正是本文对此加引号的原因。

五、周恩来对吕正操说：看来京广、京汉铁路之间，还得修一条南北干线，要修直的，标准要高一点



京汉路建成时立下的碑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 1993 年 4 月 20 日与京九铁路建设者亲切握手

历史巨变，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任列强宰割的屈辱地位，继之而来的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 年 10 月 1 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庄严升起，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勾画蓝图时，把事关经济命脉的铁路的发展放在首要考虑的地位。一方面对旧有的铁路进行改造，如历史上的京（北京）汉（汉口）、粤（广州）汉（汉口）铁路，在经过改造后，以京（北京）广（广州）铁路来命名。与此同时，也规划着新的铁路建设蓝图。1991 年 9 月 5 日开工的京九铁路的宏伟蓝图，即是在此背景下酝酿的。

1958 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滕代远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北京到九江修建一条京九铁路大干线，在中国东部开辟继京广、京沪之后的第三条南北大通道。这是中国铁路建设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构想。随

后，铁道部将京九铁路纳入中国铁路路网规划。

“文革”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铁道部领导人吕正操阐述了自己意见：看来在京广、京沪铁路之间，还得修一条南北干线，要修直的，标准要高一点。周总理的指示与铁道部的想法不谋而合。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京九铁路的前期准备工作，第一次进入实施阶段。

京九铁路有两大关键的工程，一是长江大桥，一是黄河桥，线路的走向、工期，都要受到这两个控制工程的限制，铁道部决定先上马长江大桥。尽管当时整个中国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但在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的安排下，京九铁路的前期准备工作仍在悄悄进行着。1972 年初，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组建的新交通部，经过反复比较论证，将桥位选在了九江市下游的白水湖。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全长 6 公里的九江长江公路铁路两

用特大桥正式开工，计划工期 6 年，1979 年建成通车。当时，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这一消息。

但是，“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已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当时仓促开工的葛洲坝工程，已使国家的财政气喘吁吁，哪里还有如此巨额资金在长江上再建一座特大桥呢？九江大桥的建设受挫，京九铁路的建设方案也随之搁浅了。

打倒“四人帮”后的 1978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又重新提起京九铁路的话题。重新恢复的铁道部向国家计委送上了《关于北京九江铁路设计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我部准备明年开始京九两座特大桥及大别山地区隧道重点工程开工，争取‘六五’期间全线修通。拟按双线、电气化、客车速度 160 公里标准，建成一条现代化铁路。”随后，铁道部又按高速铁路（时速 160 公里）标准，进行了全线勘测和部分设计。这就是比较有名的“京九铁路高速方案”。

这个“高速方案”不可谓不好，但在当时新建一条全长 1200 公里的准高速电气化铁路，无论在财力、物力、技术上，都不是没有问题的。

京九铁路前景如何？这一宏大工程开始接受时代的审视。

六、商阜线难言初衷，九江桥柳暗花明

1984 年 10 月 16 日，新华社编印的供领导人参阅的《经济参考》撰文称：“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是铁路衰落，高速公路兴起。”在这之前的 1984 年 2 月 17 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应“加速输煤管道的试验研究和建设，使之成为煤炭运输的重要

辅助手段”。

这两家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机构的观点，不是空穴来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国内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铁路建设的争论。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以铁路为骨干的交通运输结构应予调整：1000公里以远的客运，不是铁路的优势，应由民航来承担；400公里以内的客货运输，也不是铁路的优势，应由公路来承担；沿水系无需修铁路；沿海航运则应成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

铁路究竟是不是“夕阳工业”？是不是只能起到“运煤官”的作用？这两家新闻机构的观点，将这场争论推向深入。

许多专家、学者坚持了中央早在五十年代末就确定的“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的经济思想。他们认为，民航票价昂贵，能耗高而容量有限，百姓很难承受，1000公里以上的长途客运全由民航承担显然不现实；400公里以内的客运全由公路来承担，也同样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客运量的需要。在这样的国情下，只有铁路运输才是全方位、全功能、全天候的运输方式。他们断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铁路必将有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南北铁路大干线的京九铁路的修建，势在必行！

1983年，铁道部向国家计委呈报了《关于审批北京至九江铁路衡水阜阳段设计任务书的请示报告》，7月18日，国家计委房维中副主任在向国务院呈送报告签发意见时写道：“经研究，为了适应煤炭等主要物资运输的需要，拟同意批复。”这里强调了“煤炭”，大概是计委为避免这个报告受当时的争论左右，免遭搁浅命运的良苦用心吧。

7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个

报告，工程正式立项。这也是国务院第一次公布“京九铁路”建名。

1986年2月，铁道部决定修建北京至九江铁路中段的商丘至阜阳段177.88公里的铁路，开辟华东铁路网第二通道。但是，一些专家对这一决策仍持不同意见。

为了避免决策失误，8月5日，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在山海关主持召开了高层次的华东铁路网专家论证会，让持各种意见的专家各抒己见。经过9天的讨论，多数专家、教授的意见趋向一致：从铁路网、近期应急和远期发展的结合考虑，认为商阜线位置适中，具有形成铁路网骨干线路的条件。丁关根当即代表铁道部宣布：论证会的结论是最终决策，商阜铁路马上开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证会的所有文件只字不提“京九铁路”四字，而代之以“华东第二通道”。笔者曾为此当面请教铁道部总工程师沈之介、中国铁路大师陈应先等当年与会专家，他们笑答：也许是一种策略吧。

商阜线的开工可以说是京九铁路的“不宣而战”。事后，丁关根表示：“商阜线有形成中国铁路路网骨干线的条件，将来连起来，就是南北大干线。”

商阜线开工的炮声，也给迟迟不能竣工的京九铁路九江大桥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1986年12月，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到江西考察。这位铁道部的老部长自然要挂怀九江长江大桥。当万里接到九江市长张国镇的关于这座大桥因资金短缺迟迟架不了钢梁的报告时，他即风尘仆仆来到大桥工地，并当即拍板：“国家拿一部分，有关省各出一部分，集资解决。”

这个新思路，不仅为九江大桥

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也为日后整个九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

九江大桥的工地又热闹起来了！1991年8月，重3000多吨、最大跨度已超过200米的主跨钢拱梁稳稳地落到8号桥墩上。1994年，公路通车，铁路桥将由九江口向北铺轨通过！

谈到九江大桥建设的意义，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说：“九江大桥是京九铁路的头号控制工程，是全线的关键所在。九江长江大桥如不提前建设，京九路‘奋战三年，全线铺通’的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因为大桥本身的工期至少也要六年。这一重大决策归功于周总理，万里同志也起了重要作用，付出了很多心血。”

七、“小京九”变成了“大京九”，“大京九”连着1997

一项重大决策的形成，除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左右和需要领导人当机立断外，还需要一个舆论准备、一个外部形成共识的环境。在京九铁路大决策过程中，这一规律使“小京九”演化成了与1997相连的“大京九”。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抓住这一契机，人们为京九铁路继续向南延伸找到了一条充分而又充分的理由。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原铁道部副部长、老红军邓存伦等社会知名人士提出：“将北京至九江铁路（即小京九）延长至香港九龙（即大京九），并力争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全线贯通。”

这一方案，不仅使京九铁路延长至香港九龙，由“小京九”演化为“大京九”，也使这一伟大的工程因此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而蜚声世界。

1990年3月，吕正操就京九铁路及整个交通运输状况致信江泽民、李鹏同志。3月22日，江泽民在信上批示：“请李鹏同志阅批。看来吕正操同志花了不少功夫，是否待有关部门研究后，要给吕老一个回音，请酌。”李鹏3月23日批示：“家华同志，吕正操同志的意见，请在制订‘八五’计划时参考。”之后，邹家华副总理又将吕正操的信批给了国家计委。

对“大京九”的决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从1987年的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开始，一直到1993年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等省人大代表团以及刘立春、王屏、冯祖椿、沈之介等众多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

几百件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要求修建大京九路。全国政协1987年还专门召开铁路网络论证会。京九铁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经济的战略问题，提到了共和国最高议事机关。

1989年12月，铁道部完成了大京九南段线路走向的研究和论证。这一方案是：九江以南由向塘西经三江镇至南边坑，利用向吉地方铁路142公里至吉安；再经赣州至龙川；利用广梅汕铁路213公里至常平，最后南下深圳，连接九龙。

至此，整个京九铁路线路走向大局已形成！

线路方案有了，建设资金还是个问题。国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几百亿元的巨资。为此，1989年，国务院发展中心杨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史清琪等同志提出了《关于联合集资在1997年修通北京至九龙铁路的建议》。接着，众多有识之士都提出类似的建议。这些建议引起国家计委的高度重视。很快，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主持，在北京召开了集资修建京至九铁路座谈

会。

国务院有关部委、京九铁路沿线九省市的代表认真讨论后，郑重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通过多方集资，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争取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贯通京九铁路。

1991年9月5日，当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台前县的孙口响起时，从中央到地方，亿万人民在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条南北大干线的同时，也把焦渴的目光投向了1995年——京九铁路全线通车的日子。

八、京九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更牵动着亿万百姓的心

在等待和期盼的日子，从中央到地方，凝聚的都是关注、兴奋和焦虑的情感。

1992年7月16日下午，朱镕基副总理来到北京京西宾馆，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铁路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卡脖子瓶颈。今后国民经济能不能上台阶，就得看铁路运输了。南北铁路运输特别紧张，大量物资过不去，京九铁路是矛盾的焦点，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他要求京九铁路提前一年到一年半建成。他表示：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可直接找他！

1993年1月11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朱镕基再一次来到铁道部招待所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关于京九线的建设问题，能不能再提前一些，让它在1995年就能有所分流。哪怕还没有完成，往前赶一赶也好。”

（下转第64页）



京九铁路龙头车站—北京西客站模型（李士忻 摄）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

● 郝玉峰



乌兰夫（前排左二）与新三师部队官员合影（1938）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进华北。中国共产党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醒全国人民注意，日本关东军部正积极筹组所谓的“蒙古国”“华北国”，因此全国“任何部队只要实行对日作战，（红军）就愿意与之紧密携手共同抗日”。时任国民党第七军团司令兼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将军，表示欢迎中共号召。早在1931年，傅作义就与关押在绥远监狱的中国共产党员王若飞有来往，王若飞经常写信或面谈劝告傅将军抗日，对其思想影响很大。1933年，傅作义率三十五军进行长城抗战期间，中共也曾派人与傅作义联系，称赞他的抗日壮举，希望他抗日到底。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当“八一”宣言发表之后，傅作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并允许共产党的报刊书籍在他的部队中公开发行。

阅读。他还与中共中央联系，请求派共产党进入他的部队，帮助他做抗日政治工作。这个时期，我党先后派潘纪文、王一然等20余名共产党员，进入傅作义部队担任政治工作职务。

一天，傅作义把潘纪文请来，要他帮助物色一位俄文翻译。潘纪文立刻想到乌兰夫，他问：“傅将军要求什么条件？”

傅作义说：“当然要坚决抗日、精通俄文的人才。”

潘纪文说：“这事好办，明天我就给您领来。”

潘纪文直接去找乌兰夫。这时乌兰夫正在归绥土默特小学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领导中国共产党西蒙工委做民族工作，主要是争取蒙族德王抗日，二人相见之后，潘纪文征求他的意见，乌兰夫当场就答应下来。

次日上午，潘纪文带乌兰夫来见傅作义。傅作义握住乌兰夫的大手，见他长的浓眉大眼，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怔住了。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似乎在哪里见过面！”

潘纪文笑笑说：“他就是国民党通缉了几年的蒙古族共产党员陈云章（乌兰夫的化名）。”

“噢，你就是从苏联回来的陈云章呀！原名叫云泽对不对？”

乌兰夫点了点头。

傅作义虽然没见过乌兰夫，但对他的身份、历史以及胆识、才华十分了解，内心庆幸自己又得到一个好助手。傅作义说：“陈先生能不记前嫌，给我当俄文秘书，实在令傅某敬佩！”

乌兰夫说：“历史上化干戈为玉帛的事例很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携起手来抗日呢！”

傅作义便将乌兰夫担任的工作交待一番，而后命秘书拿出一台高频率的小收音机来。说：“这台收音机既能接收苏俄的广播新闻，又能听听音乐，就算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二

自从当了傅作义的俄文秘书之后，乌兰夫每天午夜扒在家里的小炕桌上打开收音机，接收记录苏联电台的新闻广播，翻译成中文后，第二天早晨便送给傅作义阅读。

像乌兰夫这样年轻有为、博学多才、能文能武的蒙古族干部，深受傅作义的钦佩。

1935年夏天，视敌为友的德王访问“满州国”之后，加紧了与日寇勾结，筹划成立伪蒙古军司令部。日伪布重兵于察哈尔地区，矛头指向绥远，形势更加恶化。



绥远抗战中的傅作义将军

有一天，傅作义阅罢刚刚收到的塔斯社新闻，便把乌兰夫留下，想听听他对时局的看法，探讨如何组织绥远的军民对付日伪的进犯。

傅作义提出，绥远大部分属于蒙民居住地区，应当动员蒙古族群众组织一支抗日武装，保卫家乡。试想现在如能有两个蒙古族骑兵师部署在草原上，他德王和日本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从乌兰夫来说，自1931年王若飞来绥远向他提出抓武装抗日斗争之后，他便时刻重视这个问题。在德王招募青年建立学生队，培养军事干部，成立百灵庙蒙族保安队时，乌兰夫就抓住时机，把一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军官秘密派进德王的保安队去，为掌握这支部队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今日傅作义提出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后，两人可谓不谋而合。他对傅作义讲：“德王那里不是有一支现成的蒙古族武装吗，我们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就有了发展蒙族武装的基础。”傅作义说：“根据目前德王情况，这支部队很可能编入伪蒙古军，成为日寇侵华的帮凶。除非搞暴动把队伍拉过来。”乌兰夫说：“当前我们还是尽力争取德王，阻止他降日，如果他顽固到底，死不回头，我们也有办法把保安队从德王那里拉出来抗日！”傅作义知道乌兰夫经常出入百灵庙保安队做抗日工作，在这支武装里仍有影响，现在保安队的两个头面人物云继先和朱实夫，前者是青年团员，乌兰夫的叔伯

妹夫；后者是留学苏、蒙的共产党员，乌兰夫出头去做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乌兰夫心里也明白：傅作义和德王因鸦片税和“蒙古高度自治”问题，发生过多次磨擦，成见很深，互相敌视，无法与德王接触；蒋介石也曾派黄绍竑、巴文峻等人到百灵庙做德王的工作，莅临绥远，对德王“软硬兼施”、“恩威并举”，但均无济于事。对付德王的任务只有落在共产党人的肩上了。

三

乌兰夫为了争取德王抗日，多次秘密到百灵庙去，向德王保安队官兵做抗日宣传。重点向他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罪行，用抗击日寇侵略，保卫家乡，保卫国土，不做亡国奴的思想，启发教育他们。

到1935年冬，日寇与德王的双簧愈演愈烈，你唱我和，狼狈为奸。为此，乌兰夫决定再去百灵庙亲自和德王谈谈，摸清德王的态度，劝他悬崖勒马，如果德王死不回头，就要把广大官兵拉过来。他化名乌云达赉，通过朱实夫介绍，在蒙政会德王办公的蒙古包里会见了德王，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

德王故作谦逊地问：“乌云达赉先生远道而来，不知有何贵干？望不吝赐教。”

乌兰夫说：“欣闻德王首举义旗，要振兴我蒙古民族，敝人乃至整个蒙古民族，无不钦佩之至，特来拜访致意。”

德王高兴地说：“不敢，不敢，余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代，振兴民族大业，是时代对余等的重托，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但是，当谈到如何振兴蒙古民族，特别是靠什么实现振兴时，两个人当然就谈不到一块了。德王说：“要实现振兴民族大业，就要有钱、有粮、有枪炮和人马……这些靠谁给呢？难道上天会赐予么？”

乌兰夫说：“此乃蒙古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要靠自己。”

德王听了大笑说：“靠自己？您不是不知道，蒙古民族缺衣少食。瘦羊的肠子里能有多少油呢！”

乌兰夫说：“即使这样，中国如此之大，难道就找不到真正的朋友帮助我们么？”

德王干脆摊牌了，说：“真正的朋友？我就跟您实说了吧！这些年来，余曾亲自找过蒋介石，老夫子也亲自来过归绥，余也派人去广州找过胡汉民、陈继棠。结果如何？他们口头上甜言蜜语，行动上空空如也，至于傅作义更不用说，他呆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天天都想吃掉我们”。乌兰夫解释说：“德王对傅作义将军不要误会，他是欢迎您同他合作抗日的。”“算了，我是领

教他的好心了！现在只要日本人——”

德王提到日本，自知失言，急忙停住，端起茶碗喝茶。

乌兰夫抓住话头，追问道：“只有日本人支持你，对么？”

德王只好明说了：“对，现在只有日本人支持余等搞‘高度自治’！”

乌兰夫说：“既然德王爷如此坦率，也恕敝人一吐为快。我们蒙古族有句谚语叫‘土默川上的狼，善眉善眼的吃人’。那日寇占领我东三省后，扶植溥仪当他们的儿皇帝，搞什么‘满洲国’，其真正用心是想吞并全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难道他们会真心实意地帮助蒙古民族么？”

德王连忙申辩说：“余是利用日本人的金钱和武器而已。”

乌兰夫说：“话是这么说，到时候谁利用谁可就很难讲了！我这里冒昧地向德王爷进一言，古时秦桧卖国求荣，遗臭万年；今日的溥仪认贼作父，遭到国人唾弃。德王爷若步他们的后尘，结果会如何呢，请三思而行！”

德王听了乌兰夫的话大为不悦，猛地右手一拍桌子说：“余主意已定，千秋功罪由余一人承担，勿需别人教训！”他大声吼叫下边人，“送客！”

乌兰夫只好起身告辞了。从德王的蒙古包出来，直奔保安队去找云继先和朱实夫。云继先和朱实夫、云蔚、赵诚等人，正在等乌兰夫和德王谈话的结果。乌兰夫向他们介绍了方才同德王谈话的情况。

众人商议后异口同声地说：“把保安队拉出去参加抗日！”

乌兰夫根据德王的态度，认为目前也只好搞武装暴动了。但对暴动之后部队的去向，分歧很大。有人主张就地占领百灵庙，控制由国内通往苏、蒙两国的交通咽喉；有人提议把暴动队伍拉到陕北去，加入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也有人提出和傅作义取得联系，把队伍拉到归绥去。

乌兰夫对这个问题本已成竹在胸，但又担心提出把队伍拉到傅作义那里去，众人一时接受不了，便帮助大家三种去向进行分析：

“占领百灵庙和去陕北这两个方案，固然很理想，但是条件不允许呀，你们想想，日寇的机械化部队和李守信的大批伪蒙古军就在察哈尔一带，几个小时就能开过来，我们千把人马在百灵庙能顶得住，能站住脚么？至于去陕北也不行，因为我们同党中央没有联系——”

“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只有去找傅作义了？”云蔚

截住乌兰夫的话说。

乌兰夫很严肃地肯定地点头，并解释说：

“傅作义过去是推行过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可现在响应我们党中央‘八一宣言’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打日本，还是长城抗战的将军，我们现在把队伍拉到前山去和傅作义一块抗日，有甚么不对的呢？有人可能担心，傅作义知道这场暴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会不接受我们。这一点请放心，我现在还给傅作义当俄文秘书呢，他是不会不接纳暴动队伍的。”

乌兰夫为了让保安队的领导直接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增强信心，决定马上由云继先和朱实夫去同傅作义取得联系。

傅作义早有把德王保安队拉过来的打算，今日乌兰夫帮助实现这个夙愿，他高兴地说：“很好！不过此举非同寻常，要做周密的安排，切不可泄露军机，贻误大事。”

接着傅作义打电话，将绥远省政府秘书长曾载厚、三十五军旅长金中和找来，责成他们二人与云继先、朱实夫研究了暴动计划，决定于1936年2月22日晚10时开始行动，由三十五军汽车队前往百灵庙附近地区接应暴动队伍下山。

四

云继先和朱实夫披星戴月，飞马驰骋，急速返回百灵庙，直接来到云蔚家。云蔚告诉他们，德王已经回苏尼特右旗，筹备成立伪蒙古军司令部。百灵庙蒙政会只留下德王的心腹、稽查处处长李凤诚主持日常工作。机不可失，这正是他们暴动的好机会。

他们马上研究部署了暴动的准备工作。具体分析了蒙政会文职人员以及教导队、新兵队的头目们对暴动可能采取的态度，确定了争取、团结和利用的对象，并预计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与问题。

在云继先他们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工作之际，乌兰夫根据各方面情报获悉，德王决定将保安队全部编入伪蒙古军，使百灵庙的形势突然变得更为紧张，有剑拔弩张之势。蒙政会稽查处处长李凤诚带领袍子队全副武装，在商业区大街上日夜巡逻。载着荷枪实弹的日寇的军车，开进了百灵庙，在街上示威。德王还决定调云继先和朱实夫到苏尼特右旗的蒙古军司令部工作。很明显，这是要拿掉他们的兵权，将他们控制起来。这一系列迹象表明，云继先和朱实夫与傅作义会晤的事，已被德王在归绥的特务发密报给德王，所以，德王马上采取了防范措施。

乌兰夫立刻派人连夜赶往百灵庙，与云继先等人

联系，决定将暴动时间提前一天，一定要抢在德王之前。

同时，乌兰夫把提前一天举行暴动的决定通报给傅作义，以便傅作义按时派部队接应。

1936年2月21日夜10时整，百灵庙暴动枪声打响了。云继先根据暴动计划，指挥暴动队伍分别开始行动。

新兵大队队长云秉璋和德王十分要好，这个人拉出新兵大队的主要障碍。因此，云继先首先带领部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新兵大队队部。云继先冲进去用手枪对准云秉璋，喊道：“不要动！”云秉璋先是一愣，继而并不以为然地说：“老云，你这是开什么玩笑？”这时几个士兵上去缴了他的枪，将他捆绑起来。然后晓以大义地说：“云大队长，现在德王已经投降日寇，我们不甘心做日寇和德王的走狗，屠杀蒙古同胞，决定暴动，将保安队拉到前山去参加抗日。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待我们举事以后，就放开你，何去何从，悉听尊便。”这时，朱实夫已在新兵队伍中联络好了。云继先一声令下，队伍很快就在大操场上集合起来，按照预定计划，先拉到了河滩待命，待打开军械库后去领武器。所有伙夫都留下，马上生火，为暴动队伍准备明晨早饭。

云蔚指挥一部分人马，秘密接近蒙政会稽查处，把主掌百灵庙大权的德王的狗腿子李凤诚击毙了。

与此同时，巴振玉和赵贵何巧用计谋，打开了军械库大门，云继先带领新兵来取枪支弹药。大家正忙着收拾枪弹之际，一个士兵在摆弄一只冲锋枪时不小心走了火，夜深人静，声音很大，又传得很远。在大庙附近站岗的袍子队哨兵，听到军械库方向响枪，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冒冒失失地照军械库方向放了一枪。在睡梦中惊醒的袍子队，都从蒙古包里跑出来。

先跑出来的几个袍子队员一齐向军械库方向开火。云继先为了防止与袍子队正面冲突，引起麻烦，灵机一动，向袍子队喊话：“别开枪！别开枪！没有情况，是哨兵走了火。”

袍子队员睡眼朦胧，骂骂咧咧地回蒙古包去了。

云蔚来到蒙政会文职官员住的福云魁商号，将他们全叫起来，集合在一起，简单扼要地向他们宣布了保安队举行武装暴动的缘由和决定，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随同暴动队伍脱离德王，参加抗日。大部分文职官员对德王勾结日寇早就不满，纷纷表示愿意脱离德王，弃暗投明，参加抗日队伍。云蔚带着几十名文职官员直奔南卡子。

德王的电台设在德王办公的大蒙古包后面的一座



百灵庙起义后《中央时报》发表的消息（1936年）

小蒙古包里，去砸电台的暴动官兵，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包里，里面却没有一个人。原来报务员早已闻讯逃之夭夭。他们一起动手，将箱箱柜柜砸了个稀巴烂。

各路人马在午夜时分便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动作快速麻利，按事先约定在南卡子集结编队。五更时分，云继先带领暴动队伍离开百灵庙，向归绥方向开去。

五

暴动队伍冒着凛冽寒风，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走到黑沙图，东方就放亮了。这时，忽然听到后面的路上有阵阵汽车声和战马的嘶叫声。原来在暴动时，派去砸电台的人慌忙之中把箱子砸坏了，收发报机却没砸。暴动队伍刚离开百灵庙；报务员又返回机房，紧急地给德王发电，报告了百灵庙发生的事。德王立即下令，命袍子队和保商团跟踪追来。云继先沉着地指挥部队，双方激战了一个小时，德王的追兵在暴动队伍伏兵的两面夹击之下，伤亡惨重，溃不成军。

德王派队伍追击暴动队伍失败了，第二天又派日本人给他的飞机，到暴动队伍驻地上空散发传单。传单煽动对傅作义仇恨，对共产党的怀疑，劝诱云继先和官兵们撤回百灵庙，重赏赏赐。如果执迷不悟，将派日

本的机械化部队，前来追剿。德王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引起暴动队伍的思想混乱。

云继先发现这些情况后，命令各部队官兵们把拾到的传单全部收缴上来烧掉。正在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等分头到部队去做工作时，二中队派人来报告说：“傅作义的部队将我们包围了！”

原来，傅作义接到百灵庙暴动提前一天举行的通报后，他立即将三十五军军长找来，命令他派一个团的兵力，带汽车队立即赶到百灵庙地区，接应暴动下山的保安队官兵，并且指示后勤部安排起义部队一千人的食宿。

三十五军四二一团接受任务后，昼夜兼程开赴百灵庙，当部队到达二份子地区时，正赶上德王派飞机撒传单。据侦察兵报告，保安队起义部队是顺利地拉出来了，由于德王用传单煽动和拉拢起义部队，官兵思想混乱，有哗变的可能。团长立刻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傅作义。傅作义立即决定，将起义部队包围起来，缴了他们的枪，保证他们安全下山，防止发生意外。并准备派人去和云继先谈判，避免出现对抗局面。

四二一团根据傅作义的命令，当即采取行动，将起义部队包围起来……

再说云、朱二人来到村外一道土梁后面，看到惨淡的月光下，果然摆满了部队、军车，黑压压的枪口对着暴动队伍住的村子。云继先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傅作义真的欺骗了我们？恰在此时，云蔚跑来说：“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四二一团派人来，让我们缴枪。缴了枪拉我们下山。”

云继先问：“他们的人在哪儿？”

“在总队部！”云蔚气喘吁吁地说。

云继先的脸阴沉沉地说：“我去和他们谈谈。”

“谈什么，干脆和他们干！”有些官兵都要和傅作义的部队拼个死活，坚决不缴枪。云继先思忖片刻说：“大家不要盲动，傅作义这样做令人不平，但是，我们还要记住老云（这里指乌兰夫）的话，处理一切问题都要讲大局，都要有利于抗日！”他知道在这种众怒难犯、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把乌兰夫抬出来才有说服力。

朱实夫说：“你是暴动总指挥，我们听你的，赶快拿主意吧。”

云继先主意已定，就说：“我主张先把枪缴给他们，坐他们的汽车下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不信傅作义会出尔反尔，把我们这支队伍吃掉！”

众人头脑也冷静下来，都表示赞成云继先的主意。

云继先还强调告诉大家：“光是你们同意了还不行，目前部队官兵的抵触情绪很大，还要向他们讲清楚

理,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我去和三十五军派来的人交涉,你们都到部队去做工作,要保证不使一个战士对傅作义的部队开枪,以免事态扩大。”

决定之后,大家回到部队去做工作。云继先回到大队部,与三十五军派来的人见了面,云继先直接了当地向对方提出两个条件:第一,部队把枪缴给你们之后,你们必须保证安全地把暴动队伍拉到前山去;第二,只缴长枪,不缴短枪。对方听后,立即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当即派车将暴动队伍拉到前山,驻扎在归绥附近的水涧沟门和三两村。

当云继先向乌兰夫报告暴动队伍被傅作义部队缴械的经过后,乌兰夫对云继先的胆识很佩服,觉得云继先的忍耐克制,深谋远虑,是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是很有远见的。并答应立即找傅作义联系,把枪械要回来……

六

1936年2月25日,云继先等通电全国,声明保安队的全体官兵脱离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参加抗日。就在这天早晨,傅作义向乌兰夫作解释说:“当时德王派飞机撒传单,煽动拉拢暴动的官兵返回百灵庙,暴动的队伍军心不稳。权衡之下,宜生唯恐生变,才命令部下采取了这项措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请先生代傅某向云继先将军解释此事,望能谅解。”

乌兰夫说:“既然如此,现在暴动队伍已全部拉到前山,将军就应下令将收缴的武器送还他们才好。”

傅作义慨然应允说:“枪的问题好办,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我需要同云继先将军当面谈谈,请你通知他近日能来省府一趟。”

乌兰夫离开省府,便到暴动队伍去找云继先,向他说明了傅作义的意思。随后,他把暴动骨干找到一起,临时碰了个头,经过详细研究,确定了几条谈判原则:

第一,我们要诚恳地郑重其事地声明,暴动队伍今后保证在傅作义将军领导下进行抗日。

第二,要求傅作义命令三十五军立刻将缴去的武器如数退还暴动队伍。

第三,要求傅作义按月给这支暴动队伍提供粮饷,补充武器弹药。

第四,改变暴动队伍的番号时,必须保持原部队的建制和蒙古族抗日队伍的性质,不能拆散。

乌兰夫解释说:“这些条件的实质,是要保证建立一支蒙古族抗日队伍。”

第二天上午,傅作义便打来电话,召见云继先和朱实夫,让他们立即到省府办公室。傅作义极其热情地同

云、朱二人一一握手说:“二位辛苦了,宜生祝贺你们的成功!”接着似带歉意地解释了派三十五军解除暴动队伍武装的特殊情况,希望得到谅解。

谈到今后的想法,云继先按事先准备的四项要求,逐条提了出来。

傅作义听了马上表示说:“你们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本人完全同意。”

并当场落实,首先宣布绥远省政府的命令,决定将百灵庙暴动部队改编为“绥境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为上校副总队长。接着便打电话把参谋长请来,命他马上通知三十五军,速将暴动队伍的武器弹药如数送还,不准少一枪一弹,违者严办。至于今后粮饷、武器、弹药,以及其它军用物资的供给问题,由蒙旗保安总队按月造册呈报,予以拨发。

云继先和朱实夫向乌兰夫汇报了这次谈判情况后,乌兰夫又专门把在部队的一些党员和进步军官找来,布置他们在暴动部队里仍要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一定要团结广大官兵,帮助云继先把这支部队巩固住,建设成为一支坚强的民族抗日武装。

七

百灵庙暴动发生后,德王非常恼火,气得捶胸顿足,大骂云、朱忘恩负义。死不甘心的德王派人秘密与潜伏在蒙旗保安总队的亲信章文锦取得联系,在暴动队伍中散布谣言,挑拨官兵与云继先的关系,更为险恶的是用大洋收买政治上不坚定的份子,秘密杀害了云继先,继而煽动哗变,带领一部分官兵又投奔德王去了。有些土默特旗的士兵也纷纷离队,跑回了老家……

正在归绥忙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乌兰夫,从流散的士兵中得知这个消息,感到震惊,也很惋惜。待他赶到蒙旗保安总队时,这里只剩下一百多名排以上干部骨干了,他们多是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员。大家的情绪十分低落、沮丧,不知所措,有的竟抱头痛哭。乌兰夫看到这种情景极为难过,他想:德王会甘心失掉这支部队吗?我怎么没考虑到,提醒云继先注意警惕呢?好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拉出来的队伍,一夜之间竟又散了架子。带着痛苦和内疚的乌兰夫,领了几个官兵埋好云继先的尸体,立即给傅作义打电话,报告保安总队发生哗变的情况。傅作义闻讯勃然大怒,立即派三十五军出动一个团的机械化部队去追击哗变部队,并下令能追回的尽量追回,对顽固抵抗者一律就地歼灭。

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在达茂旗的乌拉忽洞教包追上了哗变队伍,就地全歼。

保安队的哗变事件，无疑是对抗日斗争的损失，乌兰夫和傅作义都决心重建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

乌兰夫深入部队，对留下来的官兵说：“你们能在哗变中不动摇，坚决地留下来，说明大家的抗日决心很坚决。现在我们的排、连以上骨干多数都在，就不愁把队伍再拉起来。淘汰了那些不坚定分子，我们可以再建立一支更加纯洁、更加坚定的蒙古族抗日队伍。任何人企图阻挡我们抗日，那是办不到的！”

这时，傅作义也在筹划重建这支部队。一天下午，傅作义通知乌兰夫到省府去，说有要事相商。傅作义对乌兰夫说道：“我们决定重新组建蒙旗保安总队。并由白海风将军负责，先生对绥远地区和百灵庙下来的部队比较熟悉，我想请你助白将军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

傅作义的主张正中乌兰夫的下怀。他认为，有了傅作义的合作，实现重建蒙古族抗日武装的计划指日可待。况且由白海风来重建蒙旗保安队，也是合适人选。白海风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席过我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从苏联回国后，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在北平被国民党的宪兵逮捕。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师何应钦将他从宪兵手里要了出来，留在何的手下干事。白虽然从此脱党，但由于他从学生时期便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拥护我党的抗日政策，是一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蒙古族爱国军官。所以乌兰夫立即表示：“傅将军既然信得过我，我一定赴汤蹈火，鼎力相助。”

傅作义听了，满面悦色，让乌、白共同安排重建保安总队的具体事宜。

乌兰夫从白海风那里商议回来，把傅作义的决定传达给每个党员和在部队待命的官兵，安慰他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安排他们分头去把跑散的官兵找回来。乌兰夫也亲自到土默特旗农村去，宣传当时的国内形势和抗日主张。在大家说服动员下，那些失散回家的原暴动队伍的官兵，基本上都陆续归队。同时，乌兰夫又通过亲属、朋友，先后动员了三百多名有志抗日的蒙古族青年，参加了蒙旗保安总队。

为了保证这支队伍执行团结抗日的政治路线，乌兰夫将一批共产党员和靠近我党的进步青年都安排在营、连以上的领导岗位上。

乌兰夫在部队里建立党组织，自任党委书记。在各连队设政治指导员，负责抗日政治思想工作。蒙旗保安总队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傅作义十分高兴，特意在归绥省府举行一次宴会，为白海风和乌兰夫祝贺。席间，傅作义兴致勃勃地举杯，对乌兰夫和白海风说：“希望你们两位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把这支蒙古族部队带好，为抗击日寇出力。”

蒙旗保安总队重建后，在察素齐一带进行一个阶段的军政训练后，便投入了抗日斗争。

1937年10月12日午夜，日寇向归绥发动大规模进攻，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受命坚守归绥大黑河北岸的阵地。他们苦战两昼夜，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给日寇以大量杀伤之后，才主动向包头方向转移。10月16日，日寇进犯包头，这支部队又南渡黄河，进入伊克昭盟，凭借黄河天险抗击日伪军。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38年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驰骋在鄂尔多斯草原上，为巩固伊克昭盟抗日根据

地，保卫陕甘宁的北大门，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中国共产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5月，亲自召见了这支部队的两位领导人乌兰夫和白海风，教导他们：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你们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供给，设法扩大队伍。又提示他们说：你们是蒙古族部队，要回到伊克昭盟去开展斗争，以抗日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蒙汉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

（责任编辑 杜晋王 恂）



蒙旗保安总队开赴归绥抗日前线途中（1937年）

1940年宋子文何以赴美求援

连若雪

1940年6月，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国求援，以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与其说是蒋派宋赴美求援，莫若说是宋子文自己坚决要求去的。因为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脚踏几只船，以反共为轴心，待价而沽。而作为亲英美派的宋子文是主张抗日的，可是英、美等国的对日态度又使宋子文大失所望。

宋子文与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有矛盾；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的纵容，也使宋子文同英、美等国发生了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并没有使宋子文放弃在抗战问题上依靠英、美和把蒋介石拉上抗战道路的决心。宋子文赴美，即是为缓解这些矛盾，以实现其抗日的主张。

宋子文同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矛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上，命令张：“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判决”。所谓“国际公理判决”，就是请国联调查团调查中日战争的经过，然后作出使中日双方接受的决定。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在中国历时四个月。当1932年10月，他们把洋洋数万言的调查报告书交给国民党政府时，人们看到的是：“东北三省永远划为列国共有，而非属我国主权之土地。”①调查报告书上还说，中国因为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和学校学生反日情绪激烈，才“道以造成本案（指‘九·一八’事变——笔者注）发生之空气。”②又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绝交运动（群众自发起来，提出与日本经济绝交——笔者注），曾予以某种援助，应负责任。”“日本为该（指中国——笔者注）经济发展之必要，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府，吾人（指国联调查团——笔者注）亦不以为无理。”③

国联调查团打着“调查”的幌子，以“公允”的姿态，经过四个月的调查之后，竟然以上述话语为日本的

侵略行为进行辩解，反而把挑起中日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身上，这是什么“国际公理”？蒋介石让国人等待“国际公理判决”的结果，就是如此这般。他却利用“等待”的时机，大肆反共、“剿共”。为筹措“剿共”经费，蒋介石要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军费开支从每月1300万元增至1800万元。宋子文反对蒋介石不分轻重缓急，把财政经费用在“剿共”上。宋认为，蒋把“剿共”看得比抗日更重要，是不得人心的。宋子文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宋子文与蒋介石在抗战与否的问题上，冲突越来越尖锐。“九·一八”事变前，宋子文曾主张东北群众日益激烈的反日情绪应当有所收敛；并劝说张学良采取谈判方式同日本讲和。但“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完全改变了上述态度。当日本外相重光葵找宋子文，企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时，宋子文予以拒绝说：“在满洲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是日军有计划的行动，已经不容插手。中国已于20日向国际联盟直接申诉，此事对日方当局来说已经失误了时机。”④这同蒋介石所说的“和平未到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牺牲”的主张，成为鲜明的对照。

自此以后，宋子文就由最初（“九·一八”之前）打算劝说张学良改变对日态度，变成同情和支持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张学良退居华北后，蒋介石又把张当成个大包袱，在军费开支上多方刁难，张曾数次派人到南京政府催要军饷。正是宋子文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为张学良的东北军解决了部分军饷。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宋、蒋在对待张学良的态度上已经有了矛盾的话，那么在“一·二八”事变和对待十九路军的態度上，宋、蒋之间的裂痕加深了。宋子文曾以辞职表示对蒋的不满，并且向新闻界透露了长期积压在他心头的怨愤。宋选择辞职的日子，正是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南京政府交通部长陈铭枢辞职的日子，宋以此表示对蒋介石惩罚十九路军的抗议。在这一段时间里，宋子文严厉地抨击了蒋介石逼他筹措“剿共”军费的政策，并说蒋破坏

了他紧缩财政的计划。“财政部无法供给反共战争所需的军费。由于日本的侵略，使贸易陷于停滞，要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⑤宋子文对蒋介石无休止地让他筹措“剿共”经费的理由进行驳斥说：“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纯军事现象吗？我们能够指望那种旧式的耗费巨大的军事讨伐迅速奏效吗？”^⑥“难道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上处理不当才发展起来的吗？如果我们进行一种虽非轰轰烈烈却是有条不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治理，他们的反应不是会好一些吗？”^⑦

宋子文的上述谈话，道出他同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态度。宋子文认为抗日比“剿共”更重要这一点，无论在当时国内各阶层、各党派还是国际舆论界，都持肯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认为宋子文在热河战役之后，“对于抗战的主张亦是非常积极，并曾在抗战的过程中，增加了不少的力量。……我们相信宋先生运用了欧美路线，无时不在做着反日的工作，无时不在计划着破坏汉奸们的亲日路线。在此全国民众同仇敌忾的时候，宋先生的反日态度和反日行为，全国民众当然是极感钦佩并表示深切的同情。”^⑧“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资产阶级曾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宋子文是这一组织的积极支持者。所以当时中外舆论界称宋子文是“中国一切中央要人中最反日的一个。”^⑨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的台柱”。^⑩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把宋子文看成是国民党政府中阻碍他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侵略的绊脚石，并多次要干掉宋，但均未得逞。

宋子文虽然同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有矛盾，但是他又离不开蒋介石这个靠山。然而，受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较多的宋子文，不喜欢日本那种带着封建野蛮性的法西斯主义，从其自身的利益和影响出发，他必须依靠英、美拉住蒋介石抗战。可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美等国的对日态度，使宋子文同英、美等国也发生了矛盾。

宋子文同英、美等国的矛盾

当宋子文看到英、美等国组成的国联调查团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调查报告书后，非常气愤。他对一位外国记者愤慨地说：“中国被一个外国侵略了——满洲被侵占，上海这里也被侵犯（指“一·二八”事变——笔者注），而那个国家是国联的会员国，是谴责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凯洛克公约签字国之一，也是九国

公约的签字国。……没有向侵略者提出任何要求；无论是在侵略满洲或上海时都没有。国联、凯洛克和非战公约或九国公约中所规定设立的机构，在军事行动发生前，没有一个可以信赖，也没有一个采取行动。……国联与几个大国的袖手旁观，他们竟然让公共租界作为日军军事行动的基地。”^⑪

宋子文虽然对英、美等国和国联调查团进行了指责，但是他仍然认为能同日本抗衡的力量只有英、美等国，所以他始终没有放弃争取他们支持中国抗日的希望。1933年6月，宋子文利用到伦敦开世界经济会议的机会，继续呼吁欧美国不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坐视不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宋子文看到他所崇拜的英、美等国对日本的嚣张气焰仍然无动于衷，对日本侵略者残酷地屠杀中国人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宋子文再次被激怒了。宋也曾寄希望于“九国公约”，幻想英、美、法、意、比、葡等国出面制裁日本。但是，上述国家权衡利弊的结果，使宋子文陷入悲愤之中。“九国公约”的成员國中，有的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一般的、不疼不痒的指责；有的干脆装聋作哑。法国表示“无能为力”；英、美则表示“中立”和“不介入”。更有甚者，例如英、美还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供应军用物资给日本。对于英、美等国纵容日本侵略行为的态度，宋子文在1938年2月伦敦举行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上做了书面发言，指出：“诸君中有多数曾在银幕上或书报中略见我国与人民遭受恐怖及残暴之毁灭……。但请牢记，诸君所闻悉之事实，不过代表整个之痛苦之万分之一而已。且该痛苦之发生，乃因诸君国家中有一部分人士助纣为虐所致。日本乃一极穷之国家，其经济及财政状况极其危险，全赖对外贸易。因其缺乏原料，须由外国购买煤油、棉花及五金之类。其侵略战争之用品，几无一不由大国输入，大部分取于美国及大英帝国。日本售卖货物于贵国，而由贵国购回军用品，诸君是否甘愿为此侵略战争之徒犯？……今日中国为侵略主义的牺牲品，但贵国或将为明日之牺牲者。诸君愈无所事事，则日本及其他战争制造者将愈受其恶，而诸君愈加重对诸君自身不利之势力。”^⑫宋子文在书面发言中，要求英、美等国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并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同日本经济绝交。宋子文还提醒英、美等国，战争的危險同样威胁着他们，若不采取有效的行动制止战争，战火很可能烧到他们身上。

宋子文的此番话语果然言中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欧、美等国果然受到战争的侵害。当英、美等国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终于改变了“中立”和

“不介入”的立场，转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宋子文赴美求援前的国际形势

就在中国政府不断督促国联会员国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抗战问题上迅速表态和予以支持时，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于1939年在美国发起组织“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组织，主张彻底禁绝军用或辅助军器材输入日本。宋子文听到这个消息，自然十分欣慰。他立即与“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副会长邵力子联合打电报给史汀生表示谢意。电报上说：“先生此举，洵为创造历史之举动，先生曾创造不承认主义，领导全世界否认日本暴力在满洲所造成事实，今兹此举，如能实现与贯彻，定能削弱暴日之力量，而迅速制止其侵略行为。先生之成功，即中国之胜利，亦即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恢复也。”^①史汀生带动了一批美国人士参加“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美国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史汀生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表示，“凡威胁美国之安全的国际战争，美国亟应参加一方作战，放弃孤立政策。”史汀生提出的“放弃孤立政策，”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

这就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以史汀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意见。

但是，美国政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日本没有威胁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时，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但迫于舆论压力，又不得不对中日战争有所表态。这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来到了中国，向国民党政府说明美国国会对于日本禁运尚未决定。国会只授权总统对日本实施有限制之禁运，如废铁、汽油等军需原料以及军火与机器等。不过，美国还抱希望于美、日谈判，若谈判成功，则美国对日本不立即采取上述有限制禁运行动；若谈判不成功，则对日实施有限制禁运。毕德门的上述说明，并不能使中国方面满意，因为根本没有达到中国方面的要求。这样，国民党政府中以宋子文为首的主战派，又通过各种途径继续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宋子文主张，一定要先打通美国这条路，只要美国态度明朗了，其他国家就好办了。

1940年1月，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再次向美国呼吁对日禁运。

日本非常害怕美国对它禁运，因为它对外扩张侵略的战略物资相当部分来自美国。所以，日本要千方百计拉住美国继续供给它战略物资。1940年1月24日，是美日商约届满的日子，美国《海军周报》首先提出废止美日商约，代之以临时协定，而且军需禁用物资要继续扩大范围。日本方面则坚持续约，并以给美国货以最惠国待遇为条件。美国《纽约时报》针对此问题发表文章，提出日本必须变更对华政策，否则美日关系无法改善。日本为了威胁美国，提出美国侨民必须撤出日本占领中国的各个地方，也要撤出日本，否则它将采取行动。之后不久，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美侨被辱事件。这样一来，美日关系趋于紧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12票对6票，通过了增加美国进出口银行一万万美元案，其目的在于使美国在财政上援助中国。当时，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提出借款两千万美元。另外，美国政府还准备扩充海军，以对日本施加压力。

1940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全美发表广播讲话：“增强国防力量绝对必要，孤立主义幻想已遭粉碎。”1940年6日，美国没收了大量输入日本的机械，并开始禁止废钢铁出口日本。

英、美国等对中日战争所持的态度日趋明朗，虽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和对日本的抵制大部分还局限在口头上，但这毕竟比原来的“中立”、“不介入”前进了一步。中国人民欢迎英、美等国的这一转变。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战派，也欢迎这一转变。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蒋介石下决心依靠英、美等国抗日是极其有利的。所以宋子文决定亲自到美国去，凭他在美国人中的印象和他同美国人的关系，他要盯在美国政府身边。一定要叫美国政府拿出金钱和武器给国民党政府。宋子文此行的决心不小，他把妻子、女儿一同带到美国，这一去就是两年半。

这期间，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变化。日本侵占了英、美等国在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和殖民地，特别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海军遭到惨重损失，美国终于下了参战的决心，并在财力、物力上给了中国以支持。宋子文赴美求援的目的达到了。蒋介石也终于同英、美等国一道，转向抗日。

注释：

①②③：《上海报》1932年10月2日

④：《重光葵回忆录》69—70页

⑤⑥⑦：《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宋子文与上海银行界》

⑧：《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西安版

⑨⑩：《上海周报》4卷1期

⑪：西格雷姆（美）：《宋家王朝》363页

⑫《大公报》：1937年1月7日

⑬《大公报》1939年1月21日

（责任编辑 凌辰）



屠城 血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十年记

● 殷学成

这是一座用花岗石砌成的纪念性建筑，屹立在六朝古都已10个年头。低矮的横向切面和倾斜的石墙，构成三、四米高的墓冢外观，显得庄重而深沉。它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永远刻在中华大地上，激发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抗御外敌的民族振兴精神；同时，也撞击着许许多多外国朋友的心，使他们发出争取世界和平的呼喊……

邓小平同志为它题写了馆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今年清明时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将要到来的日子里，记者来到这座位于南京城西南5公里江东门外的纪念馆，见到一批批青少年、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陆续到这里参观凭吊。纪念馆入口处的左侧墙上挂着一幅数米长的布，“血祭”两个大字鲜红耀眼，四周签满密密麻麻的名字。一位签名者说：“这寄托着我们对死难同胞由衷的悼念。”

纪念馆的馆址，就是当年侵华日军屠杀我国同胞的“万人坑”现场。据记载，1937年12月16日，仅在江东门一处，日军将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一万多人，用轻重机枪分批射杀，致使“遗骨枕藉，盈衢塞道，蔽满附近河面。”大屠杀后，南京慈善团体收

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大土坑，被称为“万人坑”。

踏上纪念馆正面入口石阶，抬头便见迎面石壁上用中、英、日三国文字凹刻着“死难者300000”的字样。遇害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登上几级石阶，便到了资料陈列室的平顶。向南望去，只见斜坡上断垣残壁围成一个半圆形院落，地上是白灰灰的鹅卵石，犹似累累白骨；一尊巨大的母亲雕像高高站立在院落的西南角，仿佛在向荒凉的原野呼唤：“孩子，我的孩子，你在哪里？”

院墙上刻画着我国同胞遇害时惨状的一幅幅浮雕。小道两旁有13块碑刻，分别记载着我国同胞在南京汉中门、北极阁、燕子矶江滩、草鞋峡等13处集体遇害的经过。院落西南的遗骨室内，两排玻璃柜里陈列的是从“万人坑”中取出的白骨。记得10年前雨后的一天，记者来到这里了解纪念馆建设的情况时，就在这遗骨陈列室外的斜坡边上，见到一堆堆被雨水冲刷得雪白的尸骨，那都是惨死在日本侵略军屠刀下的冤魂呀！

出遗骨陈列室，登几段台阶，沿石墙折向右行，便到了陈列馆的正厅，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铁证就陈列在这里，成为世界瞩目的日本军国主义罪

行展览馆和“南京大屠杀”史料库。

铁证如山

史料陈列馆里展出的有记录侵华日军种种暴行的300多幅图片，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目睹者提供的证言，以及其它历史资料。

所有这些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杀了我无辜同胞30万人之多，被中外人士称为“现代历史上破天荒的残暴”。

大厅里，陈列在最前面的是13处集中屠杀我无辜同胞的照片、资料。由于当时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秉承日军首脑意志，下达了“杀掉一切俘虏”的密令，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便对我全城同胞开始了血腥大屠杀，其中最为凶残就是集体大屠杀。后来，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对三百一十五起诉讼案进行周密详细调查后确认，被屠杀的中国30万同胞中，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从目前调查的材料证明，其中北极阁、清凉山、汉中门外、鱼雷营，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江滩、上新河、花神庙、东郊树林等13处地方被集体屠杀的人数最多，有的一处竟达5万多人。

已经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系统揭露这一历史悲剧的专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在考证、分析了大批史料后这样写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以草鞋峡集体屠杀人数最多，尤为惨烈。”“十二月十八日夜，日军将围禁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400多人，骗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上煤油纵火焚烧，残余尸体被投入长江。”

侵华日军陆军下士栗原利一当年的日记，就记录着这些集体大屠杀的惨景：“在我的视线内……形成了三四米高的尸山”，“被我部杀死的多达一万三千五百人”。有一名英国记者在他所著的《日军暴行纪实》一书中写到：“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宛如人间地狱。”陈列的一张照片上，两名日军露着奸笑，高站圩堤上，而他们的脚下则是一片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其状惨不忍睹。”

除了当年参战日军所写的烧杀淫掠暴行的“日记”、“自白”、“反省”以及日军屠杀我无辜同胞的照片资料外，展厅里还展出了当年侵华日军杀害我无辜同胞后焚尸用的汽油桶，抢劫财物时用刺刀劈坏的木箱等实物。

陈列厅入口右边拐角处，新增设了一个大型彩色灯箱，2米多长，半人多高，灯光映示出13个造型各异的遇难同胞纪念碑的彩照。灯箱下边低矮的坡形展柜里，陈放着当年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同胞时使用的机关枪、步枪。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同胞进行集体屠杀的暴行，从文字、图表到实物罪证，都一目了然。

展厅后半部份展出的内容主要有：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对大屠杀战犯审理、判决的部份照片、文字材料；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凭吊纪念馆后回国撰写的专著、文章、报道和编印出版的书籍；向纪念馆赠送的“中日不再战”，“反对侵略战争”等誓言誓词。

展厅出口处还有一个录像放映室，从20多分钟的录像资料中，人们可以目睹当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种种倒行逆施，以及臭名昭著的战犯谷寿夫等人被判刑、处决的真实记录。

其实，在陈列馆里人们所见到的仅仅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部份罪行，纪念馆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已将目前收集到的绝大部分有关史料汇编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证词》，共100多万字。据纪念馆负责人介绍，就是这三部书也只是收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部份罪行。比如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现有近1000人，在32万字的证言证词中，仅收集了其中648人提供的材料；又比如当年在南京教堂工作的美国牧师梅奇（也有译成马杰），曾用摄像机拍下了日军许多暴行，这份珍贵资料现正在收集；还有南京大屠杀中两名日军进行杀人比赛的“百人斩军刀”，现就保存在台湾省台中县；新加坡有人保存着拍摄当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暴行的录像带，至今也还未能征集到纪念馆中来……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铁证如山，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居安思危

从去年冬天开始，电影《南京大屠杀》在南京紧锣密鼓地开拍了。执导此片的著名导演吴子牛说：“不把这部片子拍好，我就对不起南京人民，对不起咱中国人！”人们希望影片放映后，能起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社会感召作用。

围绕着这部电影的拍摄，南京等地广大军民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当57年前人类罕见的悲惨一幕展现在南京中华门、江东门、下关码头、煤炭港等地时，

附近居民几乎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围观助拍。在市区人口稠密的中华路拍摄有关镜头时，不得不实行交通管制，这给市民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从普通市民到各级党、政、军负责人都大力支持，使影片的拍摄得以顺利进行，演职人员深深感动。影片在镇江景区连续拍摄了七天七夜，牵动了半个镇江城，参加拍摄任务的有3个街道、26个居委会，还有村庄、学校、商店，参拍的群众演员达2000多人，其中扮演“特型演员”的残疾人近30人次。1937年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的杨登苏老人，尽管已年逾古稀，在参加拍摄中有一次晕倒在现场，但第二天他又上场，其情其景，令人刻骨铭心！

影片拍摄结束后，在南京江东门外留下了一个“南京大屠杀”外景基地，在这块历尽沧桑的土地上新添了一座“居安思危城”。入口处是高大的中华门城门，1937年12月，中国军队曾和侵华日军在此激战。

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现已在我无辜同胞被集体屠杀的13个场所，全部建立了纪念碑。建在河海大学院内水杉林中的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是这所大学讲师顾浩等人设计的。他对记者讲述设计意图时说：“因为遇难同胞是骇人听闻的30万，我们要让子孙后代记着这个永远难忘的数字，所以，我们设计的碑身是三棱构成，高高擎起的是一个

古代祭祀祖先用的鼎，鼎的正面写着‘居安思危’四个大字。”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惨重的灾难，它永远给活着的人们昭示着一句凝重的警言：决不能让悲剧重演！正如台湾诗人何南史博士参观纪念馆后即兴写下的一首诗中所说：

“青磷咒雨犹垂泪，
白骨堆山不掩氛，
此日东瀛传反悔，
当年痛史苦烦冤。”

共鉴既往

现任馆长朱成山对记者介绍说，十年来，前来纪念馆参观、凭吊者已有380多万人次，其中日本朋友就有14万多人。

纪念馆揭幕当天，以顾问市川诚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劳动者交流协会吊慰访问团一行3人，便作为被接待的第一批外国朋友，来到了纪念馆，在侵华日军凌辱、杀害我国同胞的一幅幅历史照片前，在遗骨陈列室的白骨旁，日本朋友不止一次地含泪鞠躬，合掌祈祷。市川诚特地从日本带来了一个1.6米高的“镇魂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景

钟”，送给纪念馆，钟座正面的底部写着“对侵华战争深表反省、谢罪，吊慰牺牲者之灵！”钟身一侧的“誓言”写道：“我们对1931、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深表反省，由衷谢罪……誓为巩固发展两国劳动者阶级世代友好，誓为确保世界和平而团结奋战。”

日本有个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团长菊池善隆曾两次率团共140多人到纪念馆凭吊、植树。访华团成员、著名电影演员中野良子双眼闪着泪光，对采访她的记者说：“我要把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更多的日本朋友，为日中友好事业做出贡献！”几年前，菊池善隆先生辞世了，但是这一植树悼念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今年3月，以林佑一先生为团长的日本第十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29人，又来到南京。团员中有位79岁高龄的丸山政十先生，他已经6次来南京植树了，其原因就是想“以此表示对那场战争的深刻反省。”10年来，仅参加这一活动的日本朋友就有几百人，在南京浦口珍珠泉公园栽下梅花、樱花、雪松等花木1.5万多株。

在馆长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一篇篇用日文书写的观后感、感谢信。第12次日本高校生友好访华团细川南嗣这样写道：“南京大屠杀使中国众多人丧失生命，那些幸存者还要长期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身体、心灵都受到了创伤。我决心同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不让此类悲剧重演。我希望同中国人民更加友好的交往相处下去。”

日本三重县久居市的山下敬子给纪念馆寄来信和摺鹤，这位善良的姑娘说，寄来的999只摺鹤都是她一个一个精心摺成的，表示她对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中国人的悼念。还有一只摺鹤，她已摺好了，等她有机会来中国时，亲手将它送来纪念馆，以凑成1000只。可见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心是相通的。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今年春天，南京市政府做出决定，实施纪念馆二期建设工程，并号召全市各界人士“人人捐一元钱，献一份爱国心”，以实际行动支持工程建设，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纪念馆二期工程竣工之日，必将



1995年4月5日清明节，南京大批青少年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时，自发挂起写有醒目的“血祭”两字的白布，并纷纷在白布签名，以怀念死难者

在对我国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and 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共鉴既往为和平”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方 隼 凌 辰)

来函更正

编辑同志：

您好！贵刊今年第5期《丁肇中的科学之路》一文中，有个不该出现的粗疏，在75页右下角赫然写着：“1975年2月1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发来了贺电……”。众所周知，美国第35位总统、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大街上遇刺身亡。继之则是林顿·约翰逊，任期为1963年—1969年；第37位总统则是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丑闻于1974年8月9日被迫下台；继任者为杰拉尔德·福特，任期为1974年—1977年，若能在1975年发贺电的美国在任总统只能是此人。

张玉珂



中国文化宝库的惨痛浩劫

记被日机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 韩真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上海，遭到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凌晨4时20分，日本飞机多架由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第三舰队航空母舰上起飞，向上海闸北一带俯冲空袭。上午10时许，日机向位于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房投弹数枚，引起猛烈爆炸，由于厂房内纸制品堆积甚多，燃烧极快，到下午5时许，全厂尽毁，焚余纸灰飞达数十里外，占地80余亩的商务印书馆数座厂房被烧成断壁残垣，变成一片瓦砾。由于处在战地，无法救火，火焰冲过宝山路，燃着四周民房。到2月1日上午8时许，蔓延到商务印书馆所属之东方图书馆，顿时火势很猛，浓烟滚滚，至傍晚，该馆的五层大厦被焚毁一空，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

商务印书馆被毁，乃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中华文化宝库的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惨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估价的、不可弥补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化灾难，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债，值得永远牢记。

商务印书馆始创于1897年，先由印刷工人夏瑞芳、高凤池和鲍咸恩、咸昌、咸亨三兄弟集资4千元，在上海江西路赁屋3间，购置印刷机数架，经营印刷事业。后不断发展、扩充。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东面购置了80余亩土地，开始大规模扩建，到1932年被毁前，商务印书馆已是一个具有四个印刷

所、一个东方图书馆、一个编译所、一所尚公小学，以及杂志社、函授学社和若干书店在内的大型印刷、文化和图书发行企业，在全国各大城市和香港都设有分馆，其资本总额从最初的40万元增至500万元。三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即以其完善的设备和雄厚的实力，誉满全国。

总厂所属四个印刷分厂，拥有当时世界先进的印刷设备，总数达1200余台，实为当时远东乃至亚洲最大的印刷和出版机构。可惜，这些机器设备全部毁于大海。

商务印书馆是集印刷与出版于一身的企业。民国以后，商务印书馆所印刷之图书，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是全国首屈一指，尤以中外名著和各类丛书、辞书的系统印行而闻名海内外。被毁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中国古籍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续藏》、《道藏》、《百纳本二十四史》等；还有艺术类的《宋人画册》、《石渠宝笈》、《宋拓淳化阁帖》等，其印刷无不精美绝伦；西方名著刊行的有《汉译世界名著》、《现代教育名著》多卷本和众多的文学作品；丛书类除了人文和自然各种丛书外，值得夸耀的是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风行全国的《万有文库》，这部丛书是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长篇巨制；辞书和工具书方面出版的如《辞源》、《学生字典》、《教育大辞书》，以及人名、地名、动植物、矿物、医学等辞典数十种；当时全国大中小学教科书，百分之七十五由该馆印刷和发行。除此之外，商

务印书馆还编辑全国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小说月报》等数种定期刊物。总计，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出版物，从开馆到被毁之前，已达八千余种，几百万册。

商务印书馆被毁，实乃当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所依托之巨厦倾倒。然而，更令人痛心疾首的还是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内藏几十万册无比珍贵的古今中外图书，全部化为灰烬。其中珍本、孤本甚多，万劫不复。

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上海著名的“涵芳楼”藏书馆，创始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张氏20余年蒐求未辍，藏书日增。为适应社会对图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在宝山路西、商务印书馆对面建设一幢五层钢筋水泥大厦，收“涵芳楼”藏书搬迁入内，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并聘学者王云五为馆长。

据统计，至1932年被毁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藏普通中文图书26.8万余册；中文善本7万余册；地方志2.6万余册；外文图书8万余册，中外杂志报章4万余册；图表、照片、古画5千余种，共计图书48万余册。

中文图书方面以善本书尤为珍贵，以旧四部各书为例，计有：

经部：354种，2973册；

史部：1117种，11820册；

子部：1000种，9555册；

集部：1274种，10735册。

以上各书就版本而言有如下表：

宋版：129种，2514册；

元版：179种，3124册；

明版：1449种，15833册；

清版：138种，3037册；

抄本：1460种，7712册；

批校本：288种，2126册；

稿本：71种，354册；

杂本：31种，383册。

以上四部各版本书合计3745种，35083册。此外，还有新购进扬州何氏藏书善本4万余册，正在整理中。这些古籍珍本，除其中5千余册寄存金城银行库中，其余全部葬身火海。地方志亦很珍贵，当时，东方图书馆所藏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志较国内任何图书馆都为完备。计有全国22省地方志2641种，25682册；其中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这些地方志中，省志全部齐备；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2018种，东方图书馆已收1753种，占应有数的百分之八十四。自1904年“涵芳楼”创

办，20余年间在战乱频仍的中国搜集如此完备的地方志书，实非易事，其价值何止连城。

外文图书方面，珍贵者有公元十五世纪前印刷的西洋古籍多卷，系馆长王云五游欧美时重金购回。

中外报章杂志所藏之完备亦是全国仅有。难得的珍本有荷兰出版的《通报》(TungPao)、美国亚细亚文会出版的学报(Journal of the Noth china Branch of Royal)、福州和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u)、香港出版的久已绝版的《中国彙报》(Chinese Re-Positony)、《哲学评论》(Edinburg Review)等，以上杂志皆为全份，国内罕见。

馆藏科学杂志甚多，其中出版已达100余年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 Annalen der chemie und pharmacie)初版全套，为远东唯一孤本，至为名贵。清朝光绪年间发行的《谕摺》、《彙存》和《京报》也藏有全份。至于清末和民国以后国内发行的报刊杂志，更是应有尽有，相当齐全。

图表、照片、古画方面，几乎全是珍品，不可胜数。其中最珍贵的有罗马教皇“凡的康官”所藏明末唐王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照片，以及宋代画轴数件。

东方图书馆于1927年正式对公众开放，到1931年，读者达6千余人。以其规模而言，东方图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远东也甚有名气。其被毁，实在令国人扼腕。

闻日本飞机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全国为之震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科、孔祥熙、李宗仁、陈友仁 and 上海市长吴铁城等联名通电全国，谓“日本对我国交通文化教育机关辄付一炬，即激同胞公愤，且失世界同情，应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正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向士兵训话时，对于文化机关被毁亦极为愤慨。上海总商会等各社会团体联名致电美国总统胡佛，请求主持公道，以强力制止暴行。蔡元培等代表中央研究院致电国联，请求国联行政院迅速采取有效方法制止此类破坏文化事业及人类进步之残暴行为。著名学者胡适、蒋梦麟、翁文灏、傅斯年、丁文江、梅贻琦、袁同礼、陶孟和、陈衡哲、任鸿隽等，以及上海英、美传教士百余人，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谴责日本的残暴行径。全国各大报刊都于头版发表评论或社论，表示愤慨。

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3月日本退兵后，对废墟详加查勘，并将全部财产损失造具清册，呈报国民政府，以求来日向日本政府交涉赔偿。

(责任编辑 丁末)

东京审判：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 王俊彦

东京审判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复杂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辩护律师公然为战犯鸣冤叫屈，又倒打一耙，把战争罪责推到中国和苏联头上。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竟说中国挑起“卢沟桥事变”，“此次突发事件的扩大，责任在中国”，又说“违反（日苏）协定的正是苏联”，竭力往自己脸上贴金，胡说“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不是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而正是为避免日、美战争。”

日本辩护律师的无耻狡辩，遭到各方严厉谴责。而美国辩护律师，则早把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身份置诸脑后，在法庭上公然为被告辩解。美国律师克宁汉对东京法庭无耻诽谤，声称东京法庭是非法组织，公开声明“东京审判的目的只是在于宣传复仇与辩解”。克宁汉的无耻行径，遭到各方面的猛烈抨击。韦勃庭长正确行使审判长职权，威严地下令解除克宁汉的辩护律师职务，将其驱逐离日。

日、美辩护律师把被告的证词写得又臭又长。东条英机的书面证词长达 285 页，在法庭上整整宣读 3 天，听起来枯燥无味，不少人发出刺耳的鼾声。他们又强调每一条罪状都要核实，都要把起诉书、辩驳书、证词、证据、宣判书译成英语、日语，这就使翻译工作量大得惊人。

随着美、苏关系紧张，更使被告战犯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万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势必重视日本的作用，战犯们或许就能无罪释放。他们发现美国人对战犯的态度越来越好，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互相串联，订立攻守同盟，在法庭上拒不认罪，死硬到底。他们节外

生枝，轮番发难，攻击法庭，要求审判长或他们指出的法官、检察官回避。他们诡计多端，无孔不入，唯恐天下不乱，必欲把法庭搞垮而后快，常使审判不得不中断。

战犯们如此猖狂，生活上却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的食谱按美军士兵伙食标准供给制定：

早餐：果汁、半熟鸡蛋两个、狮子头、土司面包抹奶油、桔子一个、咖啡；

午餐：炸猪排两个、马铃薯芹菜、桔子、苹果、樱桃、混合沙拉、土司面包、红茶；

晚餐：香肠、茄子、甜薯、白菜、土司面包、玉米、咖啡……

在巢鸭监狱第二、三栋楼房间的院子里，特别搭建了一个大散步场，地面铺上木板，战犯们可以在这里散步、聊天，还备有象棋、围棋、纸牌、麻将等娱乐品，供战犯们尽兴消遣。

有这样优裕的生活条件，战犯们一个个脸色丰润，体重增加。日本前首相小矶国昭说风凉话：“你看木户和星野，简直胖得不得了。我甚至在想，难道狱方一定要我们得脑溢血死不成？不，这是准备要杀的鸡，杀前一定要加些好饲料。”

东条英机情知他罪孽深重，必死无疑，散步时仰望长空，发出一声长叹说：“观看此万里晴空，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武藤章和佐藤贤了，认为自己只当过局长，连国务大臣也没捞上，为求活命伤透了脑筋，请求他们的日、美辩护律师救他们的命。

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正平诡计多端，他把美国法官和律师请到东京下目黑的花喜餐厅，开展醇

酒、美女攻势，美国律师没有白玩白吃，在法庭上果然更实力地包庇战犯。

日本战犯和律师认为，在东京法庭 11 国法官中，美、苏、日作用最大，美国律师已被拉下水去，苏联是敌对阵营拉不动，就专门动中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脑筋，认为中国人重感情，爱面子，就如法炮制，进行拉拢。

面对这种情况，42 岁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在当天的日记中奋笔疾书：

“这批战犯，高唱民族优越的论调来毒害日本国民，挑起远东战火，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你们之手，如今面对法庭，你们还不认罪，我当郑重执法，决不放弃警惕！”

梅汝璈、向哲浚，倪征燮等中国司法人员团结一致，多方搜集证据，与战犯做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梅汝璈回忆当时情况说：

“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功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 10 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官和被告辩护律师双方的对质辩论，接受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审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中国政府在控诉书中以确凿的证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为祸首。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沈阳事变之日起，迄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投降签字之日止，时间长达 14 年之久，日本悍然违反国际法、国际惯例及人道，不断向中国及其他盟国进攻，以致无辜人民死伤之惨重，财产损失之广大，史无前例。”

为伸张世界公理与人类正义，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国际惯例及本国法律，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 30 多名主要战犯提起公诉，在法庭上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强烈要求将这些战犯正法以谢天下，告慰被战犯们所屠杀的亿万人民在

天之灵。

中国司法官员同各国法官、检察官通力合作，在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的两年半时间里，共开庭 818 次，召开法官内部会议 131 次，请 491 位证人出庭作证，779 位证人提供述书和宣誓陈述书，受理证据 43360 份，审判纪录达 48412 页，堆起来有两层楼房高，耗资 750 万美元，数目相当可观！

1948 年 4 月 16 日，东京审判法庭庭长韦勃宣布全部审判工作结束，法庭即日休庭，“吾等将努力工作，以使诸位尽快知道审判结果。”

其后半年时间里，法官埋头起草判决书。中国法官梅汝璈勇挑重担，主动担负起撰写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的判决书的任务。

被关在巢鸭监狱的战犯，末日已为期不远了！

1948 年 11 月 4 日下午，东京审判法庭又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各被告又被从巢鸭监狱运到军事法庭，等候决定战犯们生死命运的重要宣判。

只见韦勃庭长霍然站起，以庄严的声调宣读判决书，淋漓尽致地列数被告战犯的罪行。

战犯们的滔天罪行激起旁听席上的日本和其他国家人士的强烈愤慨。战犯们则丑态百出，岛田繁太郎摸着尖尖的下巴冒冷汗；铃木贞一左顾右盼，张惶失措；广田弘毅轻闭双眼，似老僧入定；重光葵低头用铅笔在纸上画他的得意速写；东条英机听得直冒冷汗，腿脚哆嗦；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情知凶多吉少，显得格外烦躁。

1948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3 时半，东京军事审判大厅灯火辉煌。审判长韦勃威风凛凛坐在中央，11 位审判官分列两旁，法庭宪兵队长肯瓦基带国际宪兵警备森严，使法庭庄严肃穆，不怒而威。

韦勃命令国际宪兵打开被告进入法庭的门，被告们从黑暗中突然进入明亮耀眼的法庭，对强光一时不习惯，一个个不停地眨眼睛。只听韦勃庭长以威严的语调宣布科刑，被告姓名按英语译名的字母顺序排列，第一个是荒木贞夫：

“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 15 条宣布如下：

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你无期徒刑。”

第一个宣判一公布，人们对荒木贞夫没有被判处死刑很感意外，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韦勃庭长命宪兵挥舞警棍，才使法庭人员安静下来。只见荒木贞夫对庭上行个礼，退庭而去。



东京市广谷法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就在这里举行

第二个是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判处绞刑。

这是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大多数旁听者认为土肥原罪有应得。只见土肥原因为有面部神经痛病，听到宣判死刑时脸色特别难看，脸部一直抽动不止，木然使劲点了一下头，稍稍向前移动一下，对审判长鞠了个躬，跟着宪兵退出法庭。

第三个是陆军大佐桥本欣五郎，他对排在土肥原之后吓一大跳，笔直地站在那里聆听判决，听到判处无期徒刑，暗说“多亏天照大神保佑，饶我一命”，把头使劲往右一扭，逃命般往外便走。

第四个是陆军元帅畑俊六，想到自己作为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在中国的罪行，能判无期徒刑，暗暗欢喜，对庭上行两个礼而退。

第五个是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已老态龙钟，由法庭宪兵队长搀扶着进入法庭聆听判决，为保住一条老命，而向前弯腰点头，对庭上深鞠一躬，离开宪兵时不须再搀扶而退。

第六个是首相广田弘毅，他深知中国人最恨他和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必死无疑，仍按老习惯闭着双眼细听宣判，听到判他绞刑，就慢慢拿下耳机，吓得脸色苍白，呆如木鸡，后来被两个国际宪兵挟着拖出法庭。

第七个是国务大臣星野直树，他身穿一件皱皱巴巴的白衬衣，晃晃荡荡站在那里，低头侧耳细听判决，知道判他无期徒刑，突然稳稳当当站住，鞠躬而退。

第八个是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他情知欠中国人血债太多，但仍存侥幸心理，向前迈一小步，直立法庭，以不动的姿态倾听判决，得知判处绞刑，回头便走。

第九个是内大臣木户幸一，他此时颓唐懊丧，因为刚才午休时，次子木户孝彦告诉他，据外国记者得到的可靠情报，他被判绞刑。这时听法庭判他无期徒刑，心中暗喜，郑重地向法庭鞠躬，把胸前的蝴蝶结领带弄歪了也不知道。

第十个是陆军大将木村兵太郎，听到判处他绞刑，心头一阵慌乱，刹那间脸上显出阴森的诈气，摆出武士道派头死硬到底。

第十一个是前首相、陆军大将小矶国昭，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为保住性命，慌忙戴着耳机，对法庭施一礼而退。



审判团部分成员。前排中央为审判长韦伯，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第十二个是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他气焰极为嚣张，光着头，摘下眼镜，笔直地站在受审席上听候判决。当听到被处绞刑时，他吓得面如土色，站也站不住了，摇摇晃晃要倒，负责监押他的两个美国宪兵急忙上前，挟持着这个丧失武士道精神的战犯离开法庭。

第十三个是陆军大将南次郎，他曾任远东军参谋长、朝鲜总督，在中、朝两国作恶多端，死罪难逃。当他听到无期徒刑的宣判，挺胸站在法庭上几乎不敢相信。法庭宪兵队长肯瓦基看他呆若木鸡，伸手替南次郎拿下耳机。他还好奇地问：“已经完了吗？”随后跟肯瓦基走出法庭。

第十四个是陆军中将武藤章，在东北、华北杀人无数，难逃一死。当他听到判决绞刑后，说了一句“果然如此”，又装模作样地冷笑连声，显出死硬到底的劲头儿。

第十五个是海军中将冈敬纯，他认为自己只当过海军军务局长，没到前方指挥作战，罪行不大，听到无期徒刑的判决，他毫无表情地默默转身而退。

第十六个是日本驻德国大使、陆军中将岛浩，听到无期徒刑的宣判后，大踏步而退。

第十七个是陆军中将佐藤贤了，这个东条英机的帮凶、陆军省军务局长，原以为要陪东条上绞刑架，听到无期徒刑的宣判，才低下他的大头，引得旁听席上发出一片笑声。

第十八个是外相重光葵，这个多年在中国以进行外交活动为掩护，实则是日本侵华行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只判了7年徒刑。他听完英语判词，不等译成日语，就跛着残腿往外走。

第十九个是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为逃过一死，而对法庭毕恭毕敬地行礼而退。



宣读判决书

第二十个是企划院总裁、陆军中将铃木贞一，被判无期徒刑。只见他头发散乱，长脸紧绷，嘴唇紧闭，眨眨眼转身而走。

第二十一是个外相东乡茂德，他仍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仿佛来出席宴会一般。他听到监禁20年的判刑，好像很不高兴，默默低头走出法庭。

第二十二是个前首相、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他情知自己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难逃一死，就装出很悠闲的样子，倒背着双手走进法庭，听到处以绞刑的判决后，冷笑连声，点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气焰嚣张地走出法庭。

另三个被告：藏相贺屋兴宣、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因病住院缺席判决，判处无期徒刑，由辩护律师站起来代听。

先后长达3年之久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审判，只用35分钟就宣判完毕，审判长韦勒卸下千斤重担，轻轻吐口气宣布：

“到此为止，所有审判工作全部圆满完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告闭庭。”

东京法庭的判决引起战犯们截然不同的反应，又演出了颇具讽刺意义的活剧。

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战犯，又被押回巢鸭监狱，大都为能保住老命喜形于色，边走边向旁听席上的亲友报以欣喜的微笑。矮小的世袭贵族木户幸一，更是大喜过望，本来从儿子那里得到的消息是绞刑，现在能“有幸陪伴天皇陛下，多亏天照大神保佑。”他皱纹纵横的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可怜巴巴的笑容，昔日不可一世的贵族重臣风度已荡然无存。他怀着无限感慨和侥幸的心情，最后看一眼东条英机等7名死囚，又有股免死狐悲的哀伤情绪袭上心头。

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绞刑的囚犯，对被判死刑怨

气冲天，困兽犹斗，气鼓鼓地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广田弘毅抵触情绪最大，又摆出“玄洋社”黑社会头子的姿态，以讥讽语调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本人曲曲一介文官，根本不上阵冲锋杀人，竟会被处以绞刑！”

松井石根阴阳怪气地问他：“此时此刻，阁下感觉如何？”

广田弘毅气冲冲地说：“这就好像被雷击中一般！”

松井石根明知故问：“此话怎讲？”

广田弘毅大放厥词：“这次审判真像老天爷打雷，打雷是没有办法预测时间和地点的，东京审判就是‘无法无天’的审判，那么判谁有罪，根本就无法据理推测，完全跟打雷的天灾相同！”

广田弘毅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又反戈一击问道：“松井君现在有何感想？”

松井石根对判他绞刑恨之入骨，咬牙切齿说反话道：“我觉得我的寿命太长了！”

东条英机对松井石根的话可不敢苟同，他还想多活几年，就对他的军务局长武藤章煽风点火说：“你完全是被株连，真值得同情，我根本没想到你也会被判死刑！”

武藤章见有人替他鸣冤叫屈，作为昔日杀人如麻的屠夫，竟恬不知耻地谈起母爱来：“我从苏门答腊的师团长时代起，就常常想到儿时慈母的爱。其后，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缅甸，以至于来到巢鸭监狱，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慈母。我并不是在说什么宗教性的灵魂问题，不过，我但愿在死后的瞬间，就能回到慈母的怀抱。我直到小学读书时，还在吃我母亲的奶。”

谋略家土肥原贤二，完全明白东条英机的用心，不紧不慢地挑逗说：“我们都有母爱，谁也不想死，要活！”

木村兵太郎气咻咻地说：“我们都是待杀的老虎，还能求生？”

土肥原贤二将胸脯一挺，道出东条英机的计谋：“怎么不能？我们要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反对判我们死刑！”“对，我们要上诉！”7个战犯大声吼叫不停。

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绞刑的战犯，从东京法庭休息室，被押到隔壁的食堂里，一人一个单间严加看管，等候施行绞刑。

武藤章来到关他的囚室，见这房子好长时间没住人了，到处是灰尘，就脱下袜子当抹布，擦床上的尘土，再把被子铺好，卷起大衣当枕头，躺下蒙头便睡。

突然，窗外响起美国宪兵严厉的吼声：“喂，武藤章，不能那样睡！”

武藤章没好气地问：“请问阁下，该怎样睡？”

美国宪兵指着自己的脖子说：“被子只能盖到肩头，脖子要露给我们看！”

武藤章明白美国宪兵是害怕战犯蒙头自杀，便大声回答：“我才不想死呢，我要活，我要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

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串通他们的日、美辩护律师，越过国际法庭，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还鼓动印度法官巴尔公开抨击东京法庭不应判日本战犯死刑。有些别有用心日本人更大肆活动，妄图推翻东京法庭对7名战犯处以绞刑的判决。

日、美律师代表拜会麦克阿瑟，强烈要求废弃死刑判决。麦克阿瑟便请11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议。1948年11月22日上午，11国团长应邀来到日本生命大楼六楼的麦克阿瑟办公室，麦克阿瑟说：“现在有人对东京法庭判决提出反对意见，现在特意征求各国代表的意见，看是否需要修正判决。”

美国代表W·希包尔斯特、中国代表商震、菲律宾代表B·阿佛卡卡、苏联代表德勒比扬科、英国兼纽西兰代表A·葛斯昆、加拿大代表E·H·诺曼6人，表示不必修正东京法庭的公正判决。澳大利亚代表P·萧乌要求减刑，荷兰代表L·凡阿加德提出具体减刑要求：把梅津美治郎和畑俊六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从7年减为两年半，东乡茂德从20年减为10年，广田弘毅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印度代表B·查拉巴，要求把死刑都改作无期徒刑。

麦克阿瑟为延缓执行判决，很快把日本甲级战犯的申辩转到美国最高法院，该法院竟以5票对4票的多数，通过了受理上诉。



东条英机被判处以绞刑

中国法官梅汝璈立即发表声明说，如果代表11个国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庄重通过的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判决，要受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不管它是怎么样高的法院）重审的话，那么很有理由使人产生这样的忧虑，就是任何一个国际性的决定或行为，都可遭到某一国的推翻和改变，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在中国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重新审议”。1948年12月20日，以6票对1票的多数，否定了重审东京法庭审判结果的决定。

1948年12月22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深夜，在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和驻日盟国委员会各国代表的监督下，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押上巢鸭监狱内的绞架，执行了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对被告做出公正而严厉的判决，其功绩不可磨灭。

战后50年来，日本有部分右翼分子一直在卖力地否定东京审判，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曾因此而被罢官的奥野诚亮、水野茂门之流，最近又拼凑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正确传达历史的议员联盟”，起劲地举行为侵略翻案的“二战战死者追悼大会”，叫嚷否定侵略战争“将使日本永远被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等于认同战后被歪曲了的历史认识”。这说明，歪曲历史、为侵略翻案的政客和右翼分子，还企图把日本引入歧途，这是违背中国、亚洲以至世界各国人民心愿的。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的今天，人们更加坚信：“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责任编辑 丁 末）



被告席上的日本首要战犯

鸡蛋坨也有五壮士



文治虎

狼牙山五壮士由于各种媒介的广泛传播，几乎尽人皆知，而在距狼牙山200余里的涞水县鸡蛋坨，也曾有过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五壮士，至今却鲜为人知。

1942年12月27日深夜，驻在曹坝岗的我晋察冀军区十一分区七团团部，接到内线紧急情报：日寇从宛平、怀来、房山等县据点，纠集三千多鬼子兵和伪军，由大队长小松率领，向我平西根据地进犯。敌人从宛平县杜家庄出发，沿庄里、罗古台正向曹坝岗逼进。敌人的企图是想一口吃掉我七团，进而穿越东大岭，打开通往福山口的大门，消灭驻在福山口的我军分区司令部、平西地委、专署和县委机关。我七团团长陈坊仁、政委李水清和参谋长吕展，立即研究部署战斗，决定由二连先守住曹坝岗西北面的制高点——鸡蛋坨，掩护团部撤退到南面的佛洞塔山口，以守住东大岭通往福山口的大门，并通知附近群众立即坚壁转移。

驻在紫石村的二连全体指战员，奉命集合到曹坝岗，接受战斗任务。连长张玉亮、指导员李文举和副指导员王恩眷，带领全连战士立即趁黑夜奔向鸡蛋坨。当二连赶到山脚下时，他们隐约发现敌人也在河滩里正朝鸡蛋坨方向蠕动，连长立即命令机枪手抢先开火。顷刻间，敌人倒下一大片。少时，敌人又从北面斜坡向鸡蛋坨爬来。这时，我部战士趁敌人退缩之机，抢先登上了鸡蛋坨山顶，占据了制高点。按原部署，一排长勾成来带领部队占据左侧一号山头，三排由一排副排长李连山带领，占据右面三号山头，连部居中在二号山头指挥，二排跟着连部行动，作为预备队。

天将拂晓，一排就发现鬼子和伪军已爬到半山腰，他们立即开火射击，将敌人打下山去，并抢修工事，准备打退敌人的再次冲锋。逃下山去的敌人发现山上我军的阵地部署，就用八二迫击炮向山顶猛轰，霎时，鸡蛋坨上土石飞扬，硝烟弥漫，我军战士有的光荣牺牲了。迫击炮一停，鬼子发起了冲锋。连长当即命令炮手用上次战斗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八二迫击炮向敌群开炮，可惜，仅有的三发炮弹只有一发爆炸了。这时敌人已接近我阵地，一排的战士从左侧向敌人投出一排手榴弹，守卫在右面三号山头的三排战士也同时向敌人开火，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敌人又一次向山下退去。就这样，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山坡上、沟坎边到处都躺满了敌人的尸体。

中午时分，连部接到团里的命令：“边打边撤”。连长、指导员和副指导员研究决定，留下李连山带八班战士和一挺轻机枪，共18个人，坚守鸡蛋坨阵地，完成掩护任务后再相机撤出战斗归队。

李连山是新从八班长提升为一排副排长的，他和

八班战士感情深厚,相互了解。他坚定而又愉快地接受了连部的命令,随即带领战士检查弹药,抢修工事,准备同敌人展开一场更加激烈的生死搏斗。

中午过后,敌人又开始疯狂地向山上冲锋,鬼子队长利用督战队端着刺刀,强逼鬼子兵蜂拥而上,前面的被打倒,后面的又冲上来。李连山沉着指挥八班战士,用一排排手榴弹向敌人砸去,枪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打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地又一次退下山去。此时,我方部队正通过东大岭向蓬头方向转移。李连山和战士们突然发现,敌人正从后面佛洞塔山梁向我方阵地迂回包抄过来,前面是一个穿皮袄的汉奸带路。我机枪手又是一阵扫射,将敌人打了下去。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机枪子弹打完了。这时要撤还来得及,李连山见一部份群众还没转移完,如果这时撤下去,敌人就会尾追我部,从而使阻击战前功尽弃。于是,他果断决定,死守阵地,让部队和群众争取更多的时间转移,誓死完成阻击任务。他命令机枪手刘班长带机枪归队,向连首长报告阵地的情况和死守的决心。

机枪一停,敌人又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抢占了后面的佛洞塔山头,形成对孤守在鸡蛋坨上的八班战士的夹击。这时,八班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用完了,

退路已被切断。战士们在副排长李连山的沉着指挥下,拆掉工事,用石头向敌人砸去。在敌人的枪弹声中,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连山等五个人了,最小的王文兴刚刚18岁。在敌众我寡、弹药用完的情况下,敌人终于冲上了鸡蛋坨,我五位勇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越来越多,李连山边和敌人搏斗,边鼓励战士们和敌人拼,誓死不当俘虏,不行了就跳崖。但李连山还未及跳崖就中弹牺牲了。其余四名战士刘荣奎、宋聚奎、邢贵满、王文兴,遵从副排长的遗志,分别和敌人撕打、扭抢着跳下或滚下了70多米高的绝壁,全部壮烈牺牲。这一空前惨烈的场面,是在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掩埋烈士遗体时才发现的。

1943年1月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副司令员萧克发出通令,嘉奖五位烈士:“副排长李连山及战士四人,宁死不当俘虏,英勇顽强,精神可佩,特通令嘉奖。”(见《晋察冀日报》1943年6月7日)

如今的鸡蛋坨在滦水县野山坡风景旅游区内,北京每天还有开往野山坡的专列,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这一史实。在绵延的太行山脉,又多了一处对当代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责任编辑 焯然)



“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戎冠秀(1896—1989),河北省平山县下盘松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村妇女救国会会长、伤兵转运站站长。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率领当地妇女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许多八路军伤员在她精心护理下,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44年2月19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等领导机关,共同决定授予她“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母亲”的光荣称号。

我作为随军记者,1942年曾采访过她,在她家住了一段时间,而且有幸拍下了这幅题为《黎明钟声》的珍贵照片。戎妈妈当年组织村民下地生产、集合游击队员出征承敌的钟声,似乎仍然响在我们耳边,激励我们在新的征途上前进。

江波 摄影

舍子忘死护众生

——地道战中的两位伟大母亲

● 宫洁民

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时候，我想起在冀中广为传颂的一件动人故事。任邱县培里村“堡垒户”卢洛为大伯家的卢大娘，为了八路军、众乡亲以及国际友人的生命安全，在日本鬼子百般毒打下，誓死不说；冀中九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妻子、剧社演员肖哲，为了保全地道里所有人的生命，舍去自己怀抱 4 个月的男婴。

故事发生在 1945 年年初。当时，冀中的抗战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日寇好多炮楼、据点都被我军拔掉。1943 年和 1944 年，晋察冀军区两次把被日军击落在我冀中根据地的美军飞行员，经延安转送给驻中国的盟军总部，我广大敌后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引起了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重视。他提出派美军观察组，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作战地区考察。

经中央军委同意，美军观察组的人员全部到了延安，随后又分别派往各敌后根据地。不久，美军观察组派出二人来到晋察冀军区。遵照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军区立即成立了联络处，处长由军区副参谋长耿彪兼任。观察组到后，一位叫布鲁克·杜伦的美军上尉被派到冀中，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接见了。杜伦先到七、八军分区，最后转到九军分区。他对九军分区的地道十分好奇，急迫地要去参观。陪同杜伦的有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石少华、冀中军区作战科长高存信（现在任北京黄埔同学会会长）以及翻译、警卫人员。为了保密，石少华等全部化装成老乡，坐上乡下迎亲的花篷子马车，当天下午赶到军分区驻地任邱县的培里村。当时，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接见了美军上尉杜伦，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地道情况。他说，村里有两条骨干地道，四通八

达，分上下两层，有小型会议室，靠近通气孔处有简易便所，还有既能掩护又能出击的“翻眼地道”。能通风，能防水，也能防毒。从村里到村外，有好多出口，通过每户的锅台、马棚、磨盘、墙角或夹壁墙，就能进入村外的柳林、坟地、庙台背后以及干枯了的水井。介绍完情况，就安排他们住在堡垒户卢洛为大伯家。他家的夹壁墙就有地道出口。

大约拂晓时分，肖哲正给婴儿喂奶，突然听到外面枪响。魏洪亮赶紧起来，召集机关人员（主力部队已去前方执行任务），组成混合战斗小组，作战斗准备。枪声越来越近。魏洪亮感到情况严重，看样子敌人已经观察到美军上尉的行踪。石少华、高存信等也被惊醒，都出来观察情况。为了杜伦的安全，魏洪亮让警卫员督促他们随同老乡向地道转移。杜伦本来是参观地道，听说有敌情，吓得发抖，说什么也不钻地道。情况紧急，不容拖延，经石少华一再解释，几个人才把他拖进地道。这时天已大亮。日寇的骑兵反复围着村子打转，步兵也冲入街中心，激烈的战斗先从房上打响了。司令部住的北房夹壁墙内就有地道口，魏洪亮和作战科雷溪研究情况，忽然一颗子弹，打碎一面镜子。随后，有十几个鬼子已经上了东厢房的房顶。雷溪和几个警卫员就地抗击。警卫员张建华等都是白洋淀雁翎队打野鸭子的神枪手，他们用马枪和驳壳枪从窗眼瞄准房上的鬼子，“咕咕咕”几个连发，站在房上的几个鬼子连人带枪从房檐上滚了下来。没有被击中的鬼子仓惶逃跑。趁敌人慌乱的时机，警卫连几个战士快步钻进东厢房，组成交叉火网，互相掩护着向敌人射击。街上的鬼子顺着枪声，一窝蜂似地冲到院里，寻找地道口，让汉奸特务到

处挖掘，当他们用铁镐敲打地道口木盖时，魏洪亮指挥大家迅速钻入第二条地道。同时派人转告肖哲，尽量防止孩子哭声，不然，上边敌人听见，就要暴露目标。

地道战继续进行着。魏洪亮要大家沉着气，只要鬼子在洞口一探头，就开枪射击。突然间，从东厢房又传来枪声，只听鬼子哇哇乱叫。这是由东厢房进入地道口的同志从“翻眼地道”的射击孔向外打枪。鬼子一见，急忙冲向东厢房，他们刚一发现洞口，北房的同志又转向“翻眼地道”口向敌人射击，鬼子只听到枪声，可是不知枪声在什么方向，看不到一个八路军的影子。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

过了一会，附近一个地道口被鬼子扒开。魏洪亮让警卫员张建华等在地道隐蔽监视。这时，鬼子吆喝伪军下洞。王景方对准黑影“当”一枪，伪军被击毙。接着，鬼子把卢洛为大伯抓来，在他身上拴了绳子，强逼下洞。卢大伯走一步，喊一声，故意提高嗓门。大伙一听，慢慢扶他下来，给他解下绳子。鬼子在洞口团团转，诡计失败，只拉回一条绳子。

鬼子无计可施，最后使出破坏国际公法的毒辣手段，向地道施放毒气。就在这个时候，肖哲怀抱的婴儿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人们都捏着一把汗。当时，

肖哲的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为了大伙，尤其还有一位美军上尉，她狠了狠心，使劲用乳头堵住婴儿的小嘴。在这一瞬间，婴儿的哭啼声停止了。人们都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一时间，地道里充满肃穆的气氛。

鬼子继续施放毒气。正在紧急时刻，伏在地道口的警卫员陈晓增猛扑上去，抱起刚刚燃烧的瓦斯瓶冲到洞口，飞快地扔出老远。当他迅速返回地道时，大伙发现卢洛为大伯被毒气熏倒，急忙抢救，把老人家抬到通风孔，当卢大伯甦醒过来，附近的美军上尉杜伦又焦急起来。他对石少华说，下地道时，由于太慌张，他随身的三样东西：照相机、皮箱、手提包都拉在卢大娘家炕上。石少华听了十分着急。他想鬼子一旦发现照相机，肯定不会放过卢大娘，老人家将面临一场灾祸。

果然，卢大娘遭到鬼子的毒打，鬼子冲到院里，四下搜查，发现了照相机等，就抓住大娘逼问：“谁的照相机？家里藏了哪些人？地道口在哪里？”鬼子一次又一次逼问，大娘就是不说。惨无人道的鬼子，一连砍断大娘四个手指。大娘几次昏倒，浑身是血，苏醒过来，仍然怒目视敌。

后来，九地委书记陈鹏得知培里发生地道战，马上派四十二区队（相当团），从四十多里外跑步增援，将敌人大部歼灭。鬼子一见来了大部队，惊慌失措，扔掉轻重武器，丢下伤兵，向河间据点逃窜。

一场激烈的地道战胜利结束了。当人们从地道走出，看到肖哲怀里照样抱着自己的婴儿，可这时，再也听不到小生命的哭声，他永远沉睡在母亲的怀里了。人们的心里不禁涌起对这位年轻母亲的无限崇敬。美军朋友杜伦深受感动。他连声说：“了不起，真了不起！”石少华陪同杜伦返回堡垒户卢洛为大伯家时，分区卫生所的医务人员已为卢大娘包好伤口。杜伦知道自己连累了老人家，他在大娘面前连连鞠躬，极为感动地说：“伟大！卢大娘太伟大！”

冀中培里地道战中动人的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听说，1991年过清明节，正好是卢大娘的百年诞辰。当地几位教师组织红领巾编织了好多个花篮，供放在卢大娘的坟头上，以祭奠这位宁死不屈的冀中巾帼英雄。当年那位为众人舍子的年轻母亲肖哲，现居河北保定，如今已是年过7旬的离休老人，她丈夫魏洪亮已经作古。肖哲按照丈夫生前嘱托，把培里地道战这段历史，做为向后辈儿孙进行传统教育的家庭档案。

去年春天，我到新华社看望友人石少华同志时，他还深情地谈起这段历史珍闻。

（责任编辑 孙 申）



美军上尉杜伦在冀中培里地道战中（石少华摄）

近日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单臂驰骋五十春》一书，是作者张晋（原北京军区后勤部装备部部长）革命生涯的回忆录。到底张晋是何时、何地、何故成了“单臂”的？在这之后，张晋仍能“驰骋五十春”又得益于谁？请看——

张晋遇险 与 勒石铭恩

●黎莹 贾存周



张晋同志 摄于七十年代末

1942年5月，刚从抗大第七期毕业的张晋同志，来到了涉县城关的清凉村，和从延安及华北局党校来的一大批学员共200多人，组成干部大队——临时命名为干部团三营，由冀南军区一个主力团负责掩护，待机通过平汉路，回到山东各地。

6月5日，敌人对南太行的“扫荡”开始了。当晚，张晋同志随部队突围。千余人的队伍，接近两夜一天不停地行军打仗，已经非常疲惫，最糟糕的是，他们的行踪又被敌人发现并又合围，团部决定朝东部后山突围。不料部队进入一条越走越窄的山沟，而且没有通路。此刻追上来的敌人已占领右侧高地，居高临下，向拥挤在死谷的人群猛射，造成部队很大伤亡。唯一出路是不惜一切代价抢占左侧高山。当时张晋同志硬是凭仗一身神力，抓住荆棘爬过了六七十度的陡

壁，达到山顶。

为了缩小目标，减少伤亡，团部决定趁夜幕让部队和学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张晋同志和老红军丁钢、小唐、胡钧策及李悦峰，结成一个小组，他们分析了一下形势，决定向北突围，跳过敌人已经“扫荡”过的长涉公路。因为既无地图，又无向导，只能凭借北斗星，攀山越沟，从涉县跨入平顺县的和峪大岭，而这里正是敌人合击的中心，靠近一二九师司令部临时驻地不远的大石磨脑。

这条山沟的碎石，已被日军的铁蹄踏得发白。五人决定顺沟西行，张晋同志走在最前头，后面依次是丁钢、小唐，殿后的是胡钧策和李悦峰。走到一个狭窄山沟的急转弯处，和迎面而来的鬼子遭遇了。张晋同志大喊一声：“敌人来了！”随着喊声，张晋同志和丁钢、

小唐几乎同时被敌人击中。

张晋同志右臂负伤，肘关节被打碎。他丢下身上的背包，轻装朝背向敌人的方向奔跑。当跑到一块梯田的一棵柳树下时，一颗掷弹筒弹打来，随着一声巨响，张晋同志被掀翻在地，再也无力站起来。敌人冲上来，残暴的鬼子将气息尚存的老丁和小唐用石头活活砸死。

张晋决心为战友复仇，与敌人同归于尽，他忍着剧痛，顺手掏出别在腰里的晋造重磅手榴弹（发给学员自卫的唯一武器），用尚能动弹的左手将咬在嘴里的拉火环拉着后，手榴弹在离敌人只有二、三米的地方爆炸了。作恶的鬼子死了，张晋的左手臂又增加了一处伤痕。

停留在沟下的数百敌人被张晋同志身边发生的一切震动了。他们哇啦了一阵后，上来两个鬼子，一个走到沟坎上用枪瞄准他，一个

端着刺刀走到他身边。张晋同志用握在左手的一块石头，猛地朝鬼子甩去，不知是砸着还是没砸着，却引发了鬼子不用刺刀而用石头还击张晋的念头。这个20来岁，腰带上串着两盒子子弹的鬼子兵，把枪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竟也弯腰搬石，朝张晋的头部砸下来。张晋本能地用受伤的左手抓起断骨的右臂迎击，他的颅骨被砸伤了，但没有开裂；又一块石头被张晋同志的左臂一挡，砸偏在他的左耳上。鲜血立刻喷染了满脸，流遍了全身。以后的事情，张晋全然不知道了。

直到张晋同志苏醒过来，鬼子早已走掉了。留在他身边的是被敌人撕碎的介绍信和他心爱的几本小册子。

张晋同志成了一个血人。在烈日的曝晒下，伤痛难支，口干舌燥，成群的绿头蝇闻着血腥味儿围了上来，难以驱走。

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张晋同志开始了自救。当务之急是包扎止血。唯一可用的是打在腿上裹腿，他一只手艰难地将裹腿解下，卷起，尔后再慢慢地将伤势最重要的右臂、头部和前脑包扎起来……

要活下去，必须找到水喝。他想站起来，但是伤口太多、伤势太重了，颅骨被砸伤，右肘被打断，左腕、左胸臂膀全是伤口。经血染日晒的衣服，也变得牛皮似的僵硬，他哪里还有站起来的力气呢？几度挣扎，几次昏厥，最后还是屏气咬牙，抓着身旁的树丛的枝条坐了起来。忍着伤口的剧痛，朝着记忆中的负伤前喝过的那潭积水的方向爬去。一点点、一寸寸朝前移动，几乎是一夜的工夫，只挪动了半里多路。

拂晓，张晋同志忽听见前方有如山洪爆发的呼啸声。满天星斗哪会来山洪呢？这明明是敌人部队在

山沟中行军的回声。张晋同志躲在右侧绝壁下的一片阴影中，急于寻路的三百多日军也没发现这个蹲在他们眼皮底下的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

敌人走过后不久，天就亮了。张晋发现右侧山坡上有个小窝铺。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挪蹭了过去，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救命的半盆水。水很脏，飘浮在水上的树叶已经腐烂，水里游动着许多蚊子的幼虫。他不顾这些，一气喝了一个饱。缓解了一昼夜没有进水的口干舌燥之苦。

刹那的痛快竟引来了血管破裂，肚子剧痛。痛到他难以忍受的时候，就咬紧嘴唇，屏着呼吸，头脚顶着窝铺的前后墙，抵抗这撕心裂肺的绞痛。为了堵住流淌不止的血管，他撕了窗户纸，揉成纸团，压迫伤口，硬是顶过了大约两个多小时。那股疼劲才熬过。就这样痛后再喝，喝后又痛，直到第二天……伤口剧痛，连续的高烧，苍蝇在伤口滋生蛆虫造成的奇痒，使张晋同志在饱尝“度日如年”的痛苦中度过了6月10日的24小时。

6月11日上午，窝铺里仅剩最后一点儿水，也被张晋喝光了，可以充饥的东西又没有，他处于绝望的境地了。

6月12日，是反“扫荡”作战的第七天，也是张晋重伤后的第五天。连日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和人马的嘶叫声都听不见了。几天未见的山雀，天刚亮又成群飞翔在林间。一切迹象表明，“扫荡”的敌人撤走了。他翘首四望，北面的山腰有条羊肠小道，他猜想这个山的背面可能是以前住过的涉县地界，那里有我们的驻军，也有我们的医院。他决心最后一搏，尽管伤势越来越重，体力也越来越弱，还是要死里求生，决心爬向这新的征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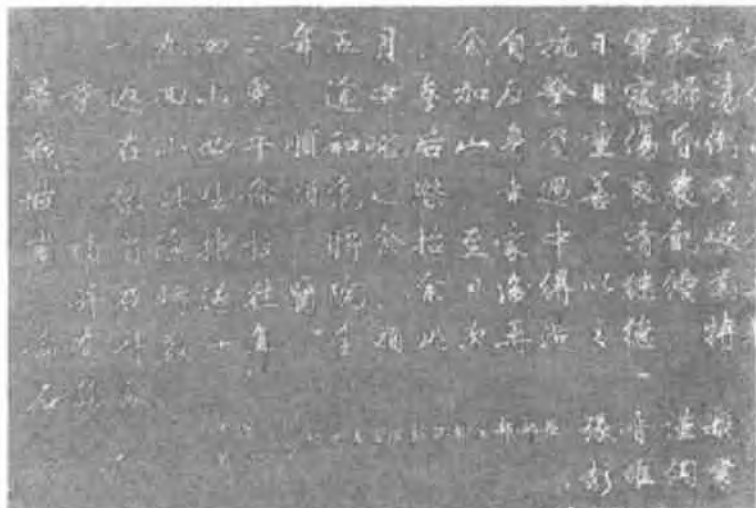
搭救张晋的李甫桢

爬，爬，一寸又一寸、一尺又一尺地移向前方。太阳划过了半个天空，张晋回头望望，离开窝铺还不过几百米。

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刻，奇迹般地巧遇一位躲避“扫荡”的中年老乡。他叫李甫桢，就住在这不远的云平乡李家河村。他一见张晋同志的惨状，听了张晋同志的身世，赶忙到附近一家老乡家找来一碗面汤，并安慰张晋同志：“你受苦了，我一定尽力救你”。待张晋喝下面汤，他又匆匆把张晋作了安置，便到附近住过八路军的林庄寻医找药去了。

当晚，张晋在高烧的痛苦中耐心等待，李甫桢翻山越岭，跑遍就近的村庄，好容易找到一家药铺，不是没人，就是没药。最后在和峪村找到了新一旅打扫战场抢救伤员的一位军医，他将两包灰猛氧和两卷纱布交给李甫桢，让他给张晋同志消毒包扎。

天亮，李甫桢拖着奔波一夜的疲倦身体，气喘吁吁但很高兴地回到张晋同志身边，像通晓医道似地先弄了一锅花椒水，小心翼翼地搽下牛皮似的裹腿布，浸洗张晋同志的所有伤口，才用灰猛氧水合面消



碑文

成了独臂的特等残废。

张晋同志身残志坚，决心再上战场杀敌。他当过参谋、连长，带“区干队”深入敌后之敌后，与日本鬼子周旋，成为名副其实的“李向阳式”的人物；解放战争中，他曾任独立营长、副团长，纵马挥刀，身先士卒，辗转战斗在豫北；全国解放后，他改作后勤工作，任过仓库主任、分部参谋长、军区装备部长，



1988年，张晋夫妇（左一、二）为李甫桢扫墓后，与李甫桢长子（因病而坐者）、儿媳（右二）合影

毒，包上纱布。

李甫桢又忙着找木椅寻木棍，绑扎担架，他决计用最快的速度把张晋送到医院去。正当他为找帮手犯愁时，从远处走来两个人，那就是张晋同志一行五人中的另两位幸存者：李悦峰和胡钧策。他们是为寻找伤员、掩埋战友尸体而来的。三人见面不由得热泪盈眶。

李悦峰和胡钧策先去掩埋了丁钢和小唐的遗体，然后和李甫桢一起，抬着张晋翻越陡峭的北山险路，赶到了李甫桢家中，这时已经天黑了。

张晋像回到了自己的家。李甫桢的妈妈和妻子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为张晋同志烧汤喂食，端屎端尿，无微不至。八天来，张晋第一次吃到了白面条。当时在敌后山区多不容易啊！

1942年6月14日，李甫桢组织乡亲们把张晋送到了涉县照义村的分区医院。

遗憾的是，由于张晋同志伤势严重，右臂骨膜发炎，并继续朝肩部发展，如不尽快采取断然措施——截肢，将有生命危险。不得已，张晋接受了切除右臂的手术，从此

为部队物资供应和装备技术保障而竭尽全力。

在张晋同志看来，1942年反“扫荡”遇险，得以保全生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几十年，李甫桢夫妇的搭救之恩重如再造，所以他一直把李甫桢夫妇当成胜似亲生父母的至亲。1946年春，张晋和新婚的爱人彭淑珍，带着一匹白布，去看望李甫桢一家。解放后，张晋在北京工作，李甫桢的儿子李香亭、孙女李菊文的孩子都曾来北京治病，住在张晋家里，张晋夫妇为他们寻医找药，关怀备至。

战争年代，人们常常把军民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张晋更有着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切身体会。为表达这一真挚而崇高的情感，1978年5月，张晋特为对他有搭救之恩的李甫桢墓前树碑；1988年4月23日，张晋夫妇又亲临涉县李家河村村南李家老坟，祭扫李甫桢夫妇墓，并在墓前与李甫桢的儿子和儿媳合影留念。

（责任编辑 洛松）

发动庐山兵谏的邓演达

● 罗昌洪

人们只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年底发动过“西安事变”，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0年前的北伐战争时期，就有一批少壮派将领曾兵谏蒋介石，逼他枪口朝北，完成北伐大业。

事情得从1924年说起。那时候，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创建黄埔军校，任命年仅37岁的蒋介石为校长。

这位进过保定军官学堂的蒋介石，曾留学日本，与孙中山结识，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深为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所感动，于是来到上海，投靠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滩上倒也混出了一些名气。南方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之后，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来到广州的孙中山，重新树起了讨袁的旗帜，更加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单身赴粤，面见孙中山，慷慨陈词，说了很多自己的见解。正当用人之际，孙中山见他很有些“军事才干”，就派他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就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凭借黄埔军校这块阵地，拼命培植自己的势力，削尖脑袋钻营。至1925年孙中山在北上途中逝世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实力派。到出师北伐时，他已是执掌兵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

1926年7月12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分三路从广州出发。当时正值盛夏，炎炎烈日，大地如火，北伐军将士们的斗志也象这盛夏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其中的第一路军，仅个把月时间就扫荡了湖南全境，继而进入湖北，一鼓作气攻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派重兵把守的咸宁汀泗桥和贺胜桥，于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5周年那天拿

下了武昌。紧接着，由广东韶关进入江西的北伐军第二路军，也于此后不久占领了南昌。

按照广州出发时许下的“饮马长江，会师九江”的诺言，两支北伐军队伍（第三路军由福建进入浙江）在分别占领武汉和南昌后，本应乘胜北举，突破长江防线，齐头并进，但是，心中早已另有图谋的蒋介石，却把他的大本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按兵不动了。

这一天，已随北伐军第一路军从广州到达武汉的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南昌发出急电，要蒋介石马上赶来武汉参加会议，讨论继续北伐事宜。可是电报发出去好几天了，既不见蒋介石的人影，也不见他的回音。算算会议日期已近，看看前来报到的会议代表仍寥寥无几，于是赶紧派朱培德骑快马去南昌召请。

朱培德到了南昌一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自以为羽毛已经丰满的蒋介石，早已不把武汉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对汪精卫的什么电报，当然不屑一顾，连看都没看一眼，就丢进了废纸篓。他正在着手准备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以他为核心，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早已下令把一批国民政府要员扣留在南昌，一个也不允许去武汉。

原来当初从广州出发时，兵分三路。党政机构随第一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辖四军，军长张发奎；七军，军长李宗仁；八军，军长唐生智兼）由湖南进入湖北，到达武汉。军事机构和民众、社会团体，则随第二路军由韶关入赣。第二路军虽然也有总指挥，但由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紧随其后，实际上，这路军的指挥权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北伐军进入南昌后，蒋介石加以钳制，不但不往九江发兵，还把随军到达南昌的大

批党国要员扣留，不让他们投向武汉国民政府。

蒋介石的这种行径，曾遭到普遍反对。孙中山当初以三民主义作为建国大纲时，明确提出：军队只是完成民国大业的一项工具，政府才是政权的唯一象征。所以，除了被扣的几十位党政要员个个忧心如焚，愤懑不已外，军队上下也议论纷纷，有的牢骚满腹，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则要求面见蒋介石。

在这批人员当中，要数邓演达的火气最盛。邓演达也毕业于保定军官学堂，与蒋介石算是同学。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邓演达任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北伐途中，他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位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向来对抱有野心的“校长”不够尊重。到了南昌后，亲眼看到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业，专营个人私利，想想北伐事业弄不好要被蒋介石断送，心里又气又急。但一时又苦于没有办法，就写了封信，把蒋介石的一些作法告诉给他的另一位同学，当时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唐生智。

唐生智虽然不愿看到这一事实，但还是大骂蒋介石“匹夫”。当下，他又把信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了信后，这才明白蒋介石为何迟迟不出席会议，于是立即宣布会议如期举行，并建议开除蒋介石的中央委员资格，撤消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不很难，但要夺他的兵权谈何容易？蒋介石培植了大批亲信，安插在军队各个要害部门，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撤消他的总司令职务，至少目前只能是纸上谈兵。

有人出主意，先把江西的地盘抢过来，把江西的地方权夺过来，孤立蒋介石。于是，武汉方面急速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并派李宗仁率七军从湖北阳新方向直逼江西，名义上是进攻孙传芳的部队，实际上是以占领和控制赣北和九江为目的。

蒋介石看到武汉方面有些“动作”，也立即作出反应，赶紧任命老牌国民党员、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率先打出讨袁旗帜的李烈钧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江西一省同时出现两个主席，蒋、汪之间的斗争表面化了。

看到国民党内出现这种内讧，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调解。他邀请蒋介石和汪精卫一齐上庐山，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为了安全起见，双方约定，只带几名高级将领和一个营的兵力作警卫。这样，邓演达、唐生智都上了庐山。

在山上邓演达说服唐生智，决定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蒋介石捉起来，实行兵谏，逼他枪口朝北。

这天晚上，仙岩客寓（现解放军五一疗养院内）一片宁静，除了巡逻队和哨兵外，很少有声音。突然门外走来两名身挎驳壳枪的军人，说明有秘密情况要报告。哨兵刚刚将门打开，埋伏在外的大批军人蜂拥而入，哨兵还没来得及鸣枪报警，就被缴了械。带队的邓演达、唐生智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把这位“总司令”从床上赶了下来。

蒋介石一见面前的北伐军将士个个面带怒气，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了不失总司令的身份，他故作镇定，把大家让进客厅，叫大家有话慢慢说，不要做出有损党国的事情来。被激情冲动起来的北伐军将士们，哪吃他这一套，当时就有人高叫：“把他捆起来！”

蒋介石气鼓鼓的，他恨鲍罗廷，猜想这次行动准是他出的主意。他盘算着：只要自己平安度过这一关，头一件事就是把这位与中共打得火热的苏联布尔什维克驱逐出去。

其实，鲍罗廷压根就不知道今晚的事。凭心而论，召集两方上庐山恳谈，是他出的主意，但完全是出于不使国民党内部分裂这样一种良好愿望，岂料事情的发展会变得这般突然和严重？

当晚，鲍罗廷得到消息后，连忙召集两方人员商讨解决办法，并提出了妥善处理这次事件的几点意见：

一、山上的两方兵力立即隔开，中间地段为安全带。

二、蒋总司令立即恢复自由。但这次行动系部下自发性的，日后不应追究。

三、武汉方面的人员从山北下山，南昌方面的人员从山南下山，天亮后各自行动。

四、立即着手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以增强党性，达到党内团结。

由于这次事件来得突然，不但很多人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就连汪精卫、蒋介石都觉得束手无策，只好照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的安排，天亮后各自下了山。

庐山兵谏，蒋介石虽然没有吃多少苦头，但他对发动这次兵谏的老同学邓演达却耿耿于怀，不久就宣布撤消邓演达的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邓演达见自己在国内已很难立足，就以出洋考察为名，流亡欧洲。

在国外，邓演达继续进行反蒋活动，他曾和宋庆龄一起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工农民主党的前身），发表反蒋宣言。1931年8月回到上海时被蒋介石逮捕，秘密杀害于南京。

（责任编辑 丁末）

《清宫秘史》 作者姚克不平凡的一生

● 高梁



姚克先生（摄于1977年）

在美国西部旧金山的邻海郊外，有一座著名的“天边绿茵公墓”。一位生前眷恋祖国故土的可敬的老人，安详地长眠在这里。他的墓碑面向着太平洋。这是他在临终前遗言给他相依为命的妻子，把他安葬在邻海边的丘阜上，好让他“在落日的光环中俯瞰重洋彼岸的祖国”。

他就是蜚名中外的姚克先生，现代中国的文学家、翻译家、剧作家兼编导，较早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事业卓有成效的学者，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亲密伙伴，鲁迅先生所信赖的朋友，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中一名活跃的积极分子。

老人的身躯静卧在绿草坪下，墓碑上刻着他最好喜的小女儿姚湘为他写的一首悼诗，诗中，她把这座墓比作她父亲生前用来读书写作的书房——“坐忘斋”。

“安眠在宁静的‘坐忘斋’里，
崇高的精神连着爱的大地。

越过太平洋，一个灵魂走在回家的路上，

留下了他坚贞倔强的伴侣
来点亮他的文学遗著——
他一生的回忆，一首现代的史诗。”

这位老人离开人间是在1991年的冬季，他的亲人们正要为他庆祝87寿辰的时刻。至此，他离开祖国、飘泊异乡已有四十多个春秋了。在漫长人生的风风雨雨里，沧海桑田，他热爱祖国的那颗赤子之心，却从来未变。

他日夜魂牵梦萦地思念着祖国，渴望有一天能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飞回祖国，“重返故巢”。

就在临终前的几个星期，他还百般兴奋地做着返回祖国的准备。他一心想回来看看家乡的变化和众多的乡亲们；还打算把他在国外多年研究和写作的成果，带回国内加以整理和出版。然而，他却未能实现他的这一终身愿望，一场突发的感冒夺走了他的生命，留下了永世的遗憾。……

他走了，留下他挚情热爱着的

妻子和五个儿女，留下他大量优秀的文学创作和一百多万字待整理的遗稿，留下他在“坐忘斋”里埋头写作的身影和朗诵诗句的声音，留下他一颗永葆青春的眷恋祖国的赤子之心。……

1994年9月，正值旧金山的金秋季节，我和我的妻子乘飞机来到这里，专程看望这位老人的遗孀——他的热情贤惠的妻子姚吴曼夫人，和他真挚娴雅的女儿姚湘女士。在她们母女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他的墓地，瞻仰先吊，一束鲜花，表达我们从北京带来的深切悼念和敬意。

我们伫立碑前，倾听她们母女谈着姚克先生生前的情景，这时，仿佛姚克先生的身影和他那光辉而坎坷的一生，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一位被称作“洋才子”的人，却痴迷于中国传统戏剧和文化，并为其传播而辛勤耕耘

他，原名志伊，字莘农，原籍安徽歙县，1905年1月24日生于福建厦门。他出身在一个官宦名士之家，诞生不久就随家庭移居福州，后到江苏苏州居住。由于家庭的教养，他很小就能背诵中国诗词。中学毕业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文科，是个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他英语学得谙熟精通，经常用英文写稿投给报刊，被称为“洋才子”；但他更专心攻读和痴迷于中国文学和戏剧。他喜爱唱昆曲，业余时间主持“东吴剧社”，是著名戏曲家吴梅先生的高足。

1931年夏，他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先在上海世界书局和明星电影公司任职，后在由孙中山文化教育促进会开办的中国第一家英



在鲁迅追悼会上，站在宋庆龄左边举手者为担任司仪的姚克

文杂志《天下月刊》任编辑。负责编辑这家刊物的，还有温源宁、林语堂等四位著名文化人士，他们不是英国牛津、剑桥就是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国的，唯独他一人是在国内本土生长的“洋状元”。

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写作，不仅为《天下月刊》写稿，还经常给颇有影响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密勒斯评论报》投稿，向西方人介绍东方的传统文化。他还经常通过黄源主编的刊物《译文》和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把西文文学名著和西方文化传播给中国读者。他是60年前第一位把中国京剧《打渔杀家》译成英文介绍到海外去的人。实际上，他以他谙熟的英语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中外读者之间架设了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他是开创这一艰巨事业中的一个佼佼者。

（二）因帮助斯诺编译鲁迅著作，他结识了鲁迅，

成为鲁迅的挚友，并参加左翼作家的活动；鲁迅葬礼上他任司仪，是12个抬棺者之一

三十年代前期，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使全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灾难沉重的境地；也使青年姚克苦恼沉思，探索着民族的出路。1932年，住在上海的美国记者斯诺为了把中国的苦难情况和革命文艺介绍给西方，打算把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于是结识了姚克，两人共同合作，把这篇小说译出。为了取得版权和弄清文中难懂之处，他们常请教鲁迅，从此同鲁迅建立了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若干年后，当斯诺谈到鲁迅对他的影响时，曾这样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当提到姚克时，他这样说：“当时我不怎么懂中文，但我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合作者——姚莘农。他是一位

有才能的青年评论家、剧作家和散文家。”(注1)

由于两人志同道合,他们计划编译出版鲁迅短篇小说集英文版;而鲁迅建议他们选译一些其他老作家和新出现的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出版,他们接受了建议,决定编译出版《活的中国》一书。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鲁迅的5篇小说和两篇杂文,由姚克翻译;第二部分包括郭沫若、茅盾、丁玲、张天翼、萧军、萧乾等人写的17篇短篇小说,由萧乾、杨刚翻译。姚克翻译的鲁迅作品是《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风筝》、《论他妈的》等7篇,并帮助斯诺撰写了《鲁迅评传》一文,纳入书中的第一部分。翻译过程中,他们又得到鲁迅的许多指教和鼓励,从而使英文《活的中国》蕴含着强大的魅力和生命力,使西方世界广大读者阅读后,“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注2)

1933年冬,鲁迅应外国左翼作家谭丽德女士之请,搜集了中国左翼艺术家的大量木刻版画作品,送到巴黎展出。展品的目录和内容、有关展览的来往信件,都是鲁迅委托姚克翻译的。同年,美国黑人作家休士来华同中国左翼作家座谈,也是由姚克担任翻译。他还把休士的一些作品首次译成中文,向中国读者介绍。

鲁迅还通过书信来往和面谈,鼓励姚克多译外国优秀作品。英国著名文化大师肖伯纳所著的《魔鬼的门徒》,就是在鲁迅的提议下由姚克翻译,并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的。鲁迅还赞成姚克写小说,在给他的信中指出:“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

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注3)鲁迅还建议他以娴熟的英语多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糊……”,“写英文的必要,决不下于写汉文,我想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边,都有益处的。”(注4)鲁迅的鼓励,不仅是姚克在这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动力,也是对后人的启迪。

鲁迅还主动热情地介绍姚克同许多左翼作家和剧作家相识,如夏衍、田汉、曹禺、欧阳予倩等。他同左翼作家们团结互助,相濡以沫。他曾把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译成英文向外国介绍,从此两人结成文学知交;欧阳予倩曾根据姚克所写的一个数百字的故事梗概,编写成电影剧本《清明时节》,上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1934年6月15日,他曾同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萧乾、萧军等17人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姚克是鲁迅晚年时来往密切的作家之一。根据《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计算,1932年至1936年,姚克写给鲁迅的信有52封,鲁迅复姚克的信33封,两人晤面约22次。

1936年的10月19日,姚克惊闻鲁迅逝去的噩耗,“惘然了半晌”,立即同欧阳予倩等赶赴鲁迅家中,把鲁迅的遗容拍摄下来以留纪念。并立即同从陕北采访回到西安的斯诺联系,两人共同为鲁迅敬送一幅挽联: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挽联上款为“鲁迅先生不死”,

落款为“姚莘农、斯诺敬挽”。10月22日举行的鲁迅追悼会上,姚克担任司仪。还是12名抬灵柩者之一。在悼念鲁迅的日子里,他怀着极悲痛的心情,连续写了三篇回忆文章:《最初和最后的会面》、《鲁迅先生遗像的故事》和《痛悼鲁迅先生》。1937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蔡元培和宋庆龄分别担任正、副主席,成员有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六七十人,斯诺、姚克也在其中。姚克同鲁迅的深挚友谊,在艰苦斗争的年代里放射着永恒的光辉。

(三) 抗战爆发,他为保卫中国奔走呼号,寻求国际支持,并在上海孤岛执笔战斗,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永向中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日的炮声响了。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中国文化界、戏剧界的抗日热潮更是激荡沸腾。7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应大会号召,姚克和夏衍、阿英、崔嵬、宋之的等16人一起,在5天内集体创作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由赵丹、陈波儿、金焰、周璇等名演员在上海上演,引起同胞们的强烈共鸣。

8月,姚克代表中国戏剧界赴莫斯科出席第五届苏联艺术节。那时他才32岁,在莫斯科会见到高尔基等。他介绍了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赢得苏联文化界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呼和支持。

不久,日本侵略者接着占领了上海、南京,到处烧杀劫掠,惨绝人寰。祖国的受难像巨石撞击着姚克。他急于回国参加抗战,但道路阻隔,无法实现。这时,他接到国

内电报，要他去英国伦敦活动，争取得到英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在伦敦，他向英国各界人士阐明中国抗战的形势。他以屈拉法尔迪广场作讲坛，向广大公众宣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实况。他含着热泪呼吁：战争是文明的死敌，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相互支援，拯救人类的文明！他应邀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播映机前，向英国广大观众宣传中国抗战。

不久，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给他资助，邀他到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深造。他从师于一些美国戏剧名家，担任学生的导演，并潜心研究西方戏剧的理论和技巧，前后达两年。但，祖国正在受难，烽火遍野，他对祖国的无限关切和思念，驱使他终于在1940年8月返回上海。

当时上海被日军严密统治着，而外国租界像“孤岛”一样，尚未被占领。爱国进步力量在那里开展着抗日斗争。姚克这时重握起笔杆，毅然参加戏剧界的抗日活动。他同戏剧家黄佐临、吴仞之等创办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主持了“金星训练班”和各种有关戏剧艺术的座谈会，吸引和团结了许多抗日爱国的青年。他还兼任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在此期间，除导演了由苏联、英国剧作家写的一些话剧外，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编写中国历史剧。他先后编写和编导上演的戏剧有《清宫怨》、《楚霸王》、《七重天》、《双喜临门》、《美人计》和《银海沧桑》等。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上海外国租界后，姚克仍在艰苦的环境下，与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等联系，举办了戏剧座谈会一类的活动。他在敌占区的峥嵘岁月先后五

年。这是他精力充沛、爱国心切、艰苦奋斗的五年，也是他勤奋创作而获得丰收的五年。

(四) 在香港，他施展才华，专心创作和研究戏剧理论，成为剧坛的一枝奇葩，并在创作观点上有独到见地

1947年5月，姚克同南通一位著名实业家的女儿吴雯结成伉俪。吴雯是位聪慧娴雅、富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对姚克的戏剧事业全力支持。次年，他们全家迁居香港，以便姚克能有一个更适合的工作和创作环境。

姚克在港历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他创办“南国出版社”，又担任“永华影业公司”编剧。他把他所著的四幕史剧《清宫怨》改编为电影剧本《清宫秘史》。这部电影上映时，轰动了香港。

他还编写了另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剧：《西施》和《秦始皇帝》。写《西施》剧时，他苦于构思，细于琢磨，在确定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之后，立即着手写作，一部十多万字的五幕话剧，在17天之内一气呵成，并由他亲自导演。上演时，观众受到强烈的感染，不时发出掌声。

他还为儿童观众着想，把意大利科洛迪所著的有名的《木偶奇遇记》，改编成四幕儿童剧《快乐国》。

他还深入到基层群众，到贫民窟去体验生活，观察社会问题，写成了话剧《陋巷》，被认为是他以现实生活为主题的成功之作。

丰富的创作，以及舞台导演的实践，使他感到有必要把他的经验和观点加以总结，因此，他在1957

年出版了他的重要理论著作：《怎样演出戏剧》。

姚克是专长于研究西方戏剧艺术的，然而他的理论却是极力主张创作“中国的”新戏剧。他这样写道：

“中国的新戏剧向以欧美戏剧为楷模。……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学习、模仿，中国的新戏剧应该挣脱西洋形式的束缚，而开始真正的创造。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欧美有相当的距离，人情、风俗更有绝大的不同。合于欧美人的不一定合适中国观众。我们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新形式。”

“现代西洋戏剧的倾向似乎对于形式和技术过于偏重。……这是现代西洋戏剧不可否认的弱点。戏剧属于文学的分野；如果忽略了它的质素和辞藻，仅注意它的形式和技术，那就是舍本逐末，不足为训了。”“戏剧不应该脱离大众，固然是一句老生常谈，但自有颠扑不破之至理。一般人能欣赏的戏剧不一定庸俗，极少数人能懂得的也未必一定高明。质胜于文易陷于粗鄙，文胜于质易失诸纤巧。我个人的私见以为须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那么雅俗共赏才合理想的规范。”

“要创造‘中国的’新戏剧，我们必须先将西洋戏剧同中国固有的戏剧冶为一炉，然后铸成一种新的戏剧……”

“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它独特的文艺风格。……中国的新戏剧自然也应该具有中国的风格。建立这种独特的中国风格，为的是要满足中国观众的需要，……只有‘中国的’新戏剧，中国观众才易于接受和欣赏。”（注5）

约在40年前他提出这样深刻的戏剧理论和观点，现在读起来，仍令人感到有它的现实意义。

可是，正当他踌躇满志、意气

风发、潜心写作而屡见成就的时刻，一场无妄之灾，却像晴天霹雳一样，落在他的身上。

（五）从1950年到1967年，江青始终把攻击矛头对着他，把“反动文人”的帽子戴给他，使他无地容身，飘泊异国

早在1950年3月，新中国建立伊始，由姚克原著《清宫怨》改编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映。影片及原著取材于清朝末年，描写了清廷内部改良派和反改良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深刻揭露和鞭笞了以慈禧为首的腐朽、反动的顽固派，对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给予同情和赞扬。像这样题材的影片，自然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而受到欢迎。然而，当时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一再上纲上线，多次提出要批判这部影片，甚至扬言她不怕“光荣的孤立”。只是她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和支持。

1954年9月，在全国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同时，又一度指出应对“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进行批判。虽然这次对它的批判未能展开，在1964年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批判之后，《清宫秘史》也未列入再批判的十部影片之内，但已有文章开始指责它“美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是“对中国历史的诬蔑”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这次《清宫秘史》是在劫难逃了。

1967年4月1日清晨，北京大街上突然喧声四起，一队队红卫兵挥舞着拳头，喊着口号，列队游行，欢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当天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大批判

文章，题目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把五十年代要批判《清宫秘史》的老帐翻腾出来。其中写道：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注6）

江青等“四人帮”一再翻出《清宫秘史》老帐，其目的很显然，就是要用“卖国主义”的罪名，彻底整垮刘少奇等同志，以实现其夺权篡权的阴谋。此时《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虽寓居香港，却被株连，成为“顺理成章”的“卖国文人”。

当时，香港也受到大陆“文革”的冲击和影响。蒙受“无妄之灾”的姚克，迁居异国。

（六）在美国，他传播中国文化，教授毛主席诗



姚克先生和夫人吴雯女士（1978年）

词，潜心研究李贺诗集；他毫无怨言，心向祖国，情系中华

1969年春，64岁的姚克携带妻子儿女，离开香港，前往夏威夷，从此开始他在美国的飘泊生涯。

步入老年的他，家有三男二女，为生活奔波，受尽艰辛。

姚克先就取于夏威夷大学，后到旧金山，在太平洋大学任教。这所大学创建于1851年，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大学，教学中重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姚克在此大学卡利逊学院专门教授东方文化，从文学艺术到戏剧，从东方哲学到中国历史，他以他的博学广识和深刻独到的见解，赢得广大师生的敬仰和爱戴。

无论在课堂，或在社交场合，他恂恂儒雅，举止大方，他身穿中国长衫，从来不着西装，被誉为“东方哲人”。为了教学和追随时代进步，他苦读不倦，嗜书若命，阅

读大量中外文书籍报刊。他原用打字机从事写作和编写教材，后来，又让小女儿姚湘教会他使用电脑写作。

教学中，他曾以中国庄子的哲学思想，构思、编写话剧《蝴蝶梦》，他自任导演，由学生演出。通过戏剧形式，使广大师生了解了中国古代哲人思想之深邃和久远。

他不忘发掘和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他把美国著名的话剧《推销员之死》译成中文，由他的学生用中文演出。

他专门开设了毛泽东诗词的课程，使学生们通过这些诗词，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和情怀，以及东方民族的宏伟气魄。为了教课，他自己把毛主席的诗词译成英文。他的激情朗颂和铿锵的诗词韵律，充溢在他的课堂里。在美国，他成了第一个开设毛泽东诗词讲座的人。

待他从大学退休，年已近八旬。然而他仍不废学，孜孜不倦地从事唐朝诗人李贺诗词的研究。

在他还健康时，他由妻子女儿陪伴，环游了欧洲世界。他走访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圣地，还特地在英国瞻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

然而，无论他身在哪里，走在何处，他的心，始终同大洋彼岸的祖国连在一起，绵绵情丝，难断难离。有时，他极想同大陆的亲朋好友联系；有时又有片疑云蒙在心头，使他踟躇不前。他曾写信给大陆友人问道：“我因《清宫》一副惹了无妄之灾，避祸海外，不知当局是否可以让我回来？亟盼‘飞入寻常百姓家’之燕，王谢堂上能容其重返故巢乎？”（注7）

他日夜盼望着春回大地，期待着春的信息。……

（七）一声春雷，为他平反雪冤，然而他在临终

前三、四周才迟迟获悉；他渴望回国而终未实现

1976年10月，中国大地响起春雷，“四人帮”彻底垮台。

接着，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拨乱反正，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在1978年、1979年的多次讲话中提出，在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中，“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他指出，“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注8）

胡耀邦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以极大的魄力，在各个战线上纠正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给蒙受侮辱打击的人一个个地予以平反。

1979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驳斥戚本禹混淆黑白，指出《清宫秘史》虽有缺点，但大致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注9）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公开听到的肯定这部影片的声音。

接着，中央组织部收到姚克亲友从苏州发来的信，要求给姚克平反。经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认真研究，于1980年3月联名发信给中共苏州市委，批准给姚克平反并为其亲属落实政策。据亲友们回忆，信的内容大意为：姚克在三十年代有进步倾向，在中外进步文化交流方面出过力，没有反动表现。解放后，我们对他的评价有失公允。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升级。虽然姚克现在在国外，也需要给他平反。（注10）

但由于他身在国外，音讯阻隔，他迟迟未能获得他已被平反的

确切信息。直至1991年他在大陆的六弟志曾再次函告他这一消息后，他立即兴奋地回信表示，（1992年）春天返回大陆，从事写作和出版他的著作。他在信中说：“我自退休以来，潜心于李长吉（贺）诗之研究。长吉诗最晦涩难解，自来注家多不能识其庐山面目。十余年来，长吉难解之诗谜（钱钟书语），我居然能通解百分之九十九。近已将卷帙浩繁的札记删汰，第一卷明春可缮清，约25万字，思于上海排印。”（注11）

1991年12月初，他的六弟又写信给他，邀他返乡。正当他在大陆的亲友准备迎接游子返回故里之际，六弟志曾突然接到了嫂嫂吴雯发自旧金山的一封电报，唁告：“你的哥哥于三星期前收到来信，获悉他的政治名誉和文学声望，在国内得以恢复和澄清。当时他的反应强烈，情绪高度激动和兴奋，决定明春返国一行。不幸的是，前不久他忽患流行性感胃，医治无效，突然弃世。他走的那样安详，没有任何痛苦。葬礼已于12月29日在‘天边绿茵公墓’举行。遵照他的遗愿，安葬在一座围绕碧树的丘阜上，墓地面向西方，在落日的光环中俯瞰重洋彼岸的祖国。”（注12）

他走了，在他准备就要回祖国故土之前不久离开人世了。众多的朋友前来参加了他的葬礼。他葬在美国土地上，活在众多的崇敬爱戴他的友人们心中。

旧金山和美国的主要的报刊几乎都登载了他的小传和纪念他的文章。许多报刊都承认，他是“世界著名的剧作家”，“是掌握本世纪东西方文化的大师”，“他尤其以他深悉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戏剧、文学而著名”。一些与他同事的教授发表谈话缅怀他，说“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典型的中国君子”，“他为

在美国的华人争荣。”

（八）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妻子女儿回到北京访问，她们时时感到，他的灵魂也同她们一起回来了

1992年7月2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等团体在北京举行“纪念埃德加·斯诺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讲坛上，一位端庄娴雅、穿着黑服的年轻华裔女士在发言，题目是：《两种文化，一个世界——埃德加·斯诺与我父亲姚莘农的友谊》。她就是姚克的小女儿姚湘女士。讲坛下坐着一位慈祥温馨、气质彬雅，约有70多岁的夫人，精神贯注地听着讲话，并不时地点点头，她就是姚克的妻子吴雯女士。

她们母女借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机会，回到中国访问。她们是遵照姚克的遗愿，带着姚克对祖国故土的思念回来的。正如姚湘在讲话中谈的：“这也是我的双亲重返祖国之行”，“我母亲和我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灵魂也和我们一起回到了这里。”

姚湘在讲话中，介绍了她的父亲生前同斯诺、鲁迅的真挚友谊，指出这种友谊“沟通了两种文化，造成了一个友好融洽、相互尊重的世界的桥梁。”她还回忆了她父亲生前对自己家乡、祖国的深情挚爱，说：“无论在海外取得何等成功，父亲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永远向着中华，”说她的父母“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总是教导子女不可丢弃我们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的传统和美德，以及中国人一往向前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

在她讲话之后，全场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许多人走前来，同她和她的母亲亲切地握手并致问候。

在场的老作家萧乾，是同姚克一起翻译《活的中国》的好友。他特别感慨，见到她们，就像当年见到姚克那样地亲熟；白鬓苍苍的奥地利友人魏骥诗也走上前来，她深情地告诉她们：“1935年陪我去见鲁迅的，便是姚克，那是史沫特莱嘱托的。”（注13）

1993年4月，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姚氏母子又来北京，专程看望了姚克生前熟悉的老友夏衍、冰心、萧乾、魏骥诗，以及中国作协的其他负责人，并到他们家中作客。她们还访问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黄华、副会长爱泼斯坦等。黄华聘请姚湘女士为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名誉理事，爱泼斯坦把自己刚刚出版的英文《宋庆龄传》一书赠送给姚湘，以缅怀她父亲同宋庆龄之间的友谊。

1995年1月24日我接到姚湘女士来信，信中说：“今天是父亲诞辰90周年，我们在他的墓前举行了纪念；晚上，在我哥哥罗伯特的新家里，举行了祭祖的晚餐。我们都向父亲说：‘祝您90生日快乐’。当我们吹熄了蛋糕上的烛光时，旧金山已是深夜，而在我写此

信给你时，亚洲已是生机勃勃的白昼了。”

注释

①：前句引自萧乾的文章《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期；后段论引自斯诺为出版《活的中国》而写的序言。

②：引自斯诺所写的《〈活的中国〉编者序言》。

③：见1934年1月鲁迅致姚克的书信。

④：分别见于1934年2月20日、3月6日鲁迅致姚克的信。

⑤：以上均引自姚克所著《西施》剧本的《前言》部分。

⑥：见叶永烈所著《胡乔木传》。引语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系指刘少奇同志，胡××系指胡乔木同志。

⑦：见姚克好友舒湮所写文章《悼姚克》，载1992年5月10日香港《大众报》。

⑧：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2页和18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⑨：该文作者为杨东梁、王俊义。

⑩：见舒湮文章：《悼姚克》。

⑪⑫⑬：均见姚锡佩所著《幸会姚克亲人》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

（作者高粱现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 洛松）



1993年4月，本文作者高粱陪同姚克夫人及其女儿姚湘瞻仰埃德加·斯诺墓

从君主立宪派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话说杨度

● 杨第甫

君宪之路

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薛华立路的寓所里，57岁的杨度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溘然长逝。临终前，他极其郑重地向妹妹少姬口授了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书生意气

杨度，字哲子，号虎公，湖南省湘潭县姜畲乡石塘村人，1874年农历十二月八日，诞生在一户种田兼当吹鼓手的农民家庭，是这家的长子。

杨度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加之读书刻苦，20岁就中了举人。杨度中举的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他出自爱国豪情，毅然弃读书仕进，上书清廷请缨杀敌，但未获批准。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定，震撼了他的心灵，他愤懑填膺，谋求救国图存之路。他回到了家乡，投师于著名学者王闿运门下，治帝王之学，希望将来能辅佐圣主明君，既可拯救国家，又可一展爱国的抱负。当时他书生气十足，王闿运老师常疼爱地骂他：“书痴自谓不痴”；胡汉民也说他：“读书甚勤”。杨度深知老师的儒家观点，但他总是当面大谈新学，甚至和老师造成分歧。

1903年春，湖南派出第二批留学生赴日。杨度在欢送会上即席演说，申述他的反帝救国主张，他谆谆告诫大家：“夫西人何爱中国而保全之？中国而听其保全也，则命悬于西人之手矣”！

1903年，他怀着忧心国事的强烈感情，抒写了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次年作《黄河歌》。前者对激励全国，尤其是湖南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起了积极作用；后者于民国初年谱为歌曲，在学校中教唱，激起了一代青年的爱国豪情，至今一些老人犹能诵唱。

杨度在青年时期鄙视邪恶，追求正义的言行，显示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异彩。

维新思潮的兴起，激发了杨度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他广泛阅读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书，产生了民主政治思想，并成为梁启超的好友。但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使他又一次警醒，开始意识到靠和平手段不能促使清政府改革现行制度，必须使大众觉醒才能救国。

1902年，他曾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希望以此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当时杨度的思想十分活跃，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涉及各个领域：在军事方面，他号召“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文学方面，他提倡写近于口语的“小说文学”；政治方面，他指出：“阻碍国家进步者莫过如家族制度”，要求“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他猛烈抨击清朝的专制制度，主张通过“骚动”来争取国家和社会进步。可是，当他同黄兴、陈天华等交往中，却认为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会造成天下大乱，给列强以可乘之机。加之他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以来，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感到中国可以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将君主制度变革为君主立宪。孙中山到日本同他反复谈论革命的必要性时，他说：“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已疲弱，不堪服猛药，以召速亡。英、日都以君主立宪而强，满族虽不足有为，倘待有为者出，则事半功倍矣”。因此，他虽然痛骂清王朝昏庸腐朽，顽固保守，却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逼迫下，只要清王朝认真实行立宪，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的抱负，因此不必推翻它。

1903年，杨度回国应试经济特科，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但因在试卷中大谈新学，遭到清廷通缉，再度出走日本，一住五年。他广交风云人物，在东京阪田町的寓所经常高朋满座，孙中山、黄兴、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和熊希龄等立宪派人士都是座



杨度

上客，宋教仁、刘揆一、杨笃生、蔡锷等湖南同乡更是经常集于此。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杨度激昂的爱国热情和洋溢的才华，赢得了广大中国留日学生的尊敬。1904年，他当选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旋被推举为出席国内护路运动的总代表；次年又当选为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即会长）。

此时，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明确的分离了，但对孙中山、黄兴的主张并不反对。1905年，他对孙中山说：“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不防碍各行其道，将来无论打通哪一条路线，对前途都是有利的”。可是当孙中山力劝他加入同盟会时，他不肯参加，却将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

1906年11月，孙中山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的演讲，成为同盟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12月，杨度创办的《中国新报》上连续刊载他自己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他的金铁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能与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他认为富民是强国的基础，工商立国是富民的具体途径。他认识到经济战是帝国主

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金铁主义就是以此立论的。

他一面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一面热衷振兴实业，于1909年在长沙与同县梁焕奎创办了民族资本的华昌冶炼公司。后来杨度遭通缉时，他的股金为谭延凯等人吞没。公司在美国的经销人李国钦，以不正当手段将中国的公司财产变为他私人财产，在美国创办了华昌贸易公司，发展成国际性的炼钨大财团。

杨度认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现已由瓜分领土的政策变为保全领土的“机会均等”政策，不仅各国以此为图我之一重要政策，即吾国亦当以此为自存之一重要国是，以此维持现状，姑保其国，乘此之时，急谋自立。否则“国内分立，必召领土瓜分之果”。“故吾谓今日之中国国形不可变，国体不可变，唯政体可变”，“即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是也”。他没有把满族统治者清王朝的权贵们与满族人民区分开。当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人民工具的时候，必然与全国人民为敌，欲使中国民富国强，非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不可。杨度在观察满族统治者掌握的清政权与全国人民包括满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时，陷入了极大错误之中，走到君主立宪歧途上去了。

1907年，杨度回国。由于他在1905年应熊希龄的邀请，为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代撰了“宪政考察报告”，受到张之洞、袁世凯的赞赏。1908年，他们两人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杨度被清廷以四品京堂擢用，参与立宪活动。不久，杨度参加起草所谓《钦定宪法大纲》，力主限制君主权力，受到参劾，被罢官。他依靠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的设想失败了。

帝制祸首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使杨度希望清朝实现君主立宪的想法成为泡影；而袁世凯的崛起，又使他看到新的海市蜃楼。早在杨度从日本回国之初，野心勃勃而又惯于网罗人才的袁世凯就拉他入幕，奉为上宾。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在杨度眼中成了能以铁腕把持局面，进而实现中国富强的理想人物。袁世凯对杨度也倍加赏识，亲笔赠杨度“旷代逸才”匾。杨度感到平生所学有了用武之地。却没有意识到中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没有意识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现状正是因为袁世凯等军阀倒行逆施所造成。相反，他认为这是没有君主统治下强大的中央集权所致，想通过恢复帝制来维持统一。这种见解，恰好被袁世凯称帝的私欲所利用。1915年8月，杨

度发起“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

然而，历史车轮岂容逆转，洪宪帝制仅维持83天就土崩瓦解了。新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明令通辑帝制祸首，其中头一名就是杨度。他只得逃往租界避祸。

洪宪帝制的短命，使杨度开始认真思考君宪救国的道路是否可行。1917年，张勋复辟，顷刻间成了过街老鼠，陷于人人喊打的境地。这一事实，促使杨度猛醒：君主的幽灵不允许再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于是，他通电反对复辟，要张勋和康有为“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此后，他对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政治主张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江亭词序》中写道：“予浪迹东西，飘零江海，中经特科之举，台谏之劾，名捕之讨，虽避地于日本，见国之益危，乃昌君宪论……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主义忠矣，可以止矣”。下定了同君主立宪主张一刀两断的决心。

走向光明

杨度曾在学佛的过程中，全面总结了十多年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悟出了一些救国救民的真谛。他的自我改造进入了较高的境界，决心“淡化个人得失毁誉之心”，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做有益的工作。他冷静地观察和分析了形势，得出“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经是废话，无我法门的成全大我论也是空话，现在是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他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同胡鄂公等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交往，从中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1922年，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陈炯明乘虚发动政变，孙中山请杨度帮助他解脱困境。杨度利用曹锟不愿吴佩孚坐大的心理，通过同学夏寿田的关系，说服曹锟作出“不可援助以下犯上之小人”的决定，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黎元洪也因此不敢任命陈炯明了。孙中山感激地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然而当孙中山邀请杨度参加国民党，说：“以哲子的才气纵横，学识渊博，在我党党内当然要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时，却遭到杨度谢绝。杨度说：“我不要做北洋军阀的官，也不做国民党的官，让我以普通平民的身份做些革命工作吧”。杨度为什么不愿加入国民党呢？他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挫折之后，不愿再轻率地接受一种政见，参加一个组织，他觉得三民主义还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种救国救民的真理，国民党也不是自己强烈向往的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治组织。何处才是自

己的政治归宿呢？他还要继续求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使杨度感触很深。日本明治维新后侵略中国，俄国革命胜利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对比之下，他开始考虑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俄国人的道路。1922年，杨度在上海孙中山的家里结识了李大钊，经过长谈，李大钊重新认识了杨度，杨度也进一步了解到有关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1924年，他在《系统进化哲学》序中说：“阶级社会是‘尚在兽道主义之时代，而未进入人道主义之时代。自今以往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他认识到凡是‘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庶几平等共食之社会，始能出现于世界，而人道主义之道德、政治、法律、教育亦必随之而生。’他特别指出：“欲救今日中国，亦无逾于此义”，他深信这是“物理之必然”，“人事之当然”，又有“谁能阻我”。经过曲折的道路，杨度的思想产生了飞跃，终



杨度墨迹

于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写出“尚疑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的诗句，豪情满怀地走上了光明之路。

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并暗中反对北洋军阀。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串通帝国主义要逮捕李大钊，杨度闻讯后立即告诉了北平的中共党组织；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利用他与北洋军阀过去的关系，多方设法搭救，但因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使李大钊等21位中共党员被张作霖绞杀了。杨度又为了抚恤烈士遗属等筹措经费，卖掉了自己的房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从李大钊等人的死，使杨度对蒋介石国民党更看穿了。为了全力从事革命工作，他把母亲和妻子送到湖南和苏州，自己则根据党的意图迁居上海。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以援助受难的革命同志及其家属。不久，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见到了周恩来，并聆听了周恩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谈话，使他茅塞顿开，对比自己曾经接触过的各类政治主张，觉得这才真正是能使中国避免动乱和分裂，走向富强的道路。于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杨度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思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近十年的思想准备，到此实现了认识过程中的飞跃，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此后，他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他以“帝制余孽”和杜月笙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出入龙潭虎穴，搜集情报，多次将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用火漆打印的大信封装好，要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他还同柳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起义。

盖棺论定

杨度是近代史上一位卓尔不群的政治人物。由于他前半生经历坎坷曲折，晚年埋头为党工作，不计个人毁誉，以致他生前和死后很长一段时间，被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客，好事却晦而不彰。十年动乱期间，他的遗孀和子女被抄家批斗，罪名是“反动官僚的家属”，一些书籍称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余孽”。

其实，党的领导人是非常称许和关怀杨度的。1948年，章士钊到西柏坡见毛泽东主席，在谈话中，章士钊轻视中共没有大知识分子。毛对章说：“杨度算不算大知识分子？”章说：“杨是‘旷代逸才’，当然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说：“你的好友杨度，就是共产党员。”1949年，杨度的女儿杨云慧从海外归国探亲，周恩来

总理接见她时，兴奋地叫人拿来葡萄酒，热情洋溢地同她碰杯说：“向杨老先生在天之灵致敬！”1976年，周总理逝世前几个月，特地派秘书关照王冶秋，要他告诉《辞海》编辑部，在杨度的词目下要写上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可惜这些事实一直被封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阳光照到了九泉之下。王冶秋、夏衍等同志纷纷撰文，据实写出了杨度为党工作的事迹。他的功绩得以公开，心迹得以剖白。逐渐得到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毋庸讳言，杨度一生中犯过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但瑕不掩瑜，他的风范更是典型足式。首先，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从反满到鼓吹君主立宪，到拥戴袁世凯称帝，到帮助孙中山，到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个大的转折，但无论在哪个阶段，持何种政见，他思想上始终贯穿着一条为了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主线，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也是他后来之所以能接受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其次，他具有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的高尚精神。他1928年入党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不顾杀头、灭族的危险，毅然入党。他利用和杜月笙的关系做地下工作，奔走于大流氓门下，连女儿都很不齿于他，但他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向家人和其他人暴露过真实身份。他没有固定收入，有时不得不靠卖书画维持用度，但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毫不吝惜地解囊输将，甚至“毁家纾难”。其三，他追寻真理孜孜不倦，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由于历史的局限，杨度式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发现真理、掌握真理的。可贵的是，他一生都执着地追求，不达彼岸，决不罢休。其四，他襟怀坦荡，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日本宏文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攻击中国国内民主革命时，他当时是学生，但不顾同学劝阻，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进行辩论。即使在拥戴袁世凯当皇帝时，他也一定要在写给袁看的《君宪救国论》上指出：“实行君主必须真立宪，万勿再蹈清末假立宪之覆辙。对宪政必须诚实，不可欺民”。

像杨度这样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参加革命，如果不是胸怀爱国主义，向往某种理想，就不可能做到不辞艰险，置生死于度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崇高气节，才有终身为真理奋斗不息的坚韧精神，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毫无私自利之心的共产党人。

（责任编辑 王 恂）

洪深： 一身侠胆的中国“易卜生”

● 李振家

洪深是我国杰出的戏剧、电影艺术家、教育家，他与田汉、欧阳予倩并称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

洪深早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是我国第一位专攻戏剧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曾自励做一个关注社会问题的中国“易卜生”。他一生创作话剧、电影剧本八十多部，由他导演和参演的话剧、电影计九十多部。这些话剧和电影大都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矛盾，困惑和痛苦，追求和奋斗，从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此外，他还翻译、编述各类艺术论著达二百余万字。曹禹先生曾誉他为“能编、能写、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敢说、敢写、敢做，是吾人的模范”。

曹禹先生的精确评价基本上概括了这位中国“易卜生”的一生，若说他“能编、能导、能演”显示了他多才多艺，超群才华，那么，本文记叙的有关他“敢说、敢写、敢做”的故事，则显示了他那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鲜明性格。

拍案而起 怒斥影片《不怕死》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帝国主义利用租界特权，大肆进行腐朽的文化渗透。1930年春天，由美国人经营的大光明电影院上映一部由好莱坞电影明星罗克主演的影片

《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影片中，中国人被描绘成尽干吸毒、盗窃、殴斗等丑事，而洋人则成了锄暴安良的大英雄。当时，洪深在复旦大学执教(兼任上海戏剧协社排演主任)，有一天，他同友人看了这部侮辱中国人的影片，顿觉怒火中烧，立即跑到“南国社”找挚友田汉商量，准备独自前去电影院提出强烈抗议。有一些人担心此一行动会招致巡捕房出面干涉，搞不好会有不测之祸。而洪深却是面而无惧色，重重地拍着桌子说：“这部影片既然叫《不怕死》，那我定要跟它斗一斗，让洋人们看看，到底谁是真正‘不怕死’！”田汉支持洪深的正义行动，但为了保护洪深安全，当即委派音乐家张曙、电影演员金焰、青年记者廖沫沙一同前去为洪深保驾。

当影片《不怕死》放映到洋人拳打脚踢，把一些面目可憎的中国人打得东歪西倒时，洪深再也按捺不住，当场站起来对观众发表愤慨激昂的演说，大意是：(一)影片无中生有，侮辱中国人是盗贼流氓，那是为帝国主义反华侵华制造舆论。(二)影片中的洋人所作所为，完全是长帝国主义威风，灭中华民族志气。因此，我们应向电影院经理提出抗议，这部影片要立即停止放映！在场的观众听洪深一说，纷

纷纷站起来要求电影院经理退票，有的人还将手中的饮料瓶往银幕上掷去。此时，电影院美国老板带着印度巡捕闻讯赶来，不由分说地扭住洪深殴打，并强行将他架出场外，送往巡捕房拘审。

到了巡捕房，洪深先是一言不发，待一个“三道头”巡捕找他问话时，他突然双目一瞪，用英语大声吼：“滚开！我是复旦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有话叫你们上司出来跟我谈！”那个神气活现的“三道头”见洪深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一时萎了脸色，连忙喏喏连声地退走了。而此时，为洪深保驾未成的张曙、金焰、廖沫沙三人，已跑回“南国社”向田汉作了汇报，田汉顿觉事态严重，立即一面找律师去巡捕房交涉放人，一面联络“南国社”同仁一齐去巡捕房外面进行声援。巡捕房为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将洪深放了出来。

当洪深回到“南国社”，田汉向他慰问说：“洪深兄侠胆过人，只是让你在巡捕房蹲了十个小时，受苦了。”可洪深却是微微一笑说：“这算什么苦，我只觉得乐，长了中国人志气，那是得民心，我洪深何乐而不为呢！”随着又愤然地表示：“这件事情并未了结，我要上告法院，非要这部辱华影片拉下马来不可！”

过不久，洪深向上海特区法院

正式提出诉讼，上海的“南国社”、艺术剧社、复旦剧社等十余个戏剧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支持，许多著名律师也纷纷表示愿作洪深的义务律师。在公众强大压力下，特区法院判洪深胜诉，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被迫收回辱华影片《不怕死》，而主演该影片的电影明星罗克也在报纸上向中国观众表示公开道歉，从而使洪深的斗争以胜利而告终。

仗义执言 呈文辟谣护胡蝶

1931年9月间，洪深带着胡蝶等一批电影演员，去北平拍摄影片《啼笑姻缘》。此时恰适“九·一八事变”爆发，而东北少帅张学良正以陆军海防副司令身份驻节北平，胡蝶等人到达后，一些小报记者无中生有地制造张学良不顾东北沦陷之耻，花天酒地，与胡蝶跳舞的新闻，一时引起舆论大哗。其中有个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轻信谣传，愤而在《上海时报》写了两首暗含“不爱江山爱美人”之意的讽刺诗。胡蝶见报后十分委屈，意志有些消沉，洪深得知此事后忿然地代打不平，立即在上海《申报》上写了一篇为胡蝶辟谣的启事，由于他是以有力的见证人的身份澄清事实真相，使那些捕风捉影的谣传顿时一扫而空。胡蝶十分感激洪深的侠义行为，事隔数十年后，她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时，还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当张学良与胡蝶跳舞的谣传平息后，其间又发生一件牵涉张学良的事。那时，胡蝶走红影坛，北平有不少“胡蝶迷”要求与胡蝶应酬。洪深为了保护胡蝶的艺术人格，也为使拍摄影片不受干扰，因此一概挡驾拒绝。但是影迷中有个



1942年于桂林排演《再会吧，香港》时合影。前排自左至右：夏衍、欧阳予倩；后排自左至右：田汉、洪深

姓吴的公子哥儿，为了追求胡蝶，竟效学唐伯虎“卖身为奴”的伎俩，乔妆改扮混入摄制组充当杂差。过不久，洪深发现此人对胡蝶怀有不良图谋，便毫不客气地将他逐出摄制组。吴某恼羞成怒，临走扔下一句气焰嚣张的话语：“听着点，我可是张少帅的义子，你们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叫干爹派人来把你们统统赶出北平！”

吴某的威胁性言论，一时唬住了胡蝶和摄制组人员。洪深见众人惶恐万状，便挺身而出说：“别怕，我立即写张状子呈报张学良，将吴某的恶劣行径统统捅出来！”摄制组内许多人认为这是冒险之举，状告张学良义子非同小可，万一惹恼了张少帅，真的下达驱逐令，在北平的拍摄计划就得全部落空了。胡蝶更是忧心忡忡，只怕得罪了吴某，将大家都牵连进去。但是，洪深力排众议，激愤地说：“女演员可不是供好色之徒玩弄的花瓶，吴某若真是张少帅义子，就更应该告他

一状，也好让少帅严加管教，免得有辱这位副总司令在社会上的颜面。”随即，他四处奔走，特意找了一位颇具声望的律师，写了一篇义正词严而又十分得体的呈文，直闯张学良的司令部驻地。

司令部值班室秘书略略看了下呈文，不屑地扔还给洪深说：“此等电影明星的桃色新闻，不值得张少帅一阅。”洪深耐着性子，软中有硬地回敬说：“此事牵涉到副总司令的义子，有关副总司令在社会上的声誉，若是不向他呈报，待事情闹大了，搞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到时候怕谁也负不了责任吧！”秘书听了此话，顿觉事情非小，便不声不响地将呈文收了下来。

隔了数天，张学良的司令部终于发来了一纸批文，文中声明张学良从未收过义子，并声称要着力追查吴某，一俟缉获必将究办云云。这时，胡蝶和摄制组人员才算松了一口气，大家都称赞洪深真可谓侠胆包天，要是没有他甘冒风险写状

子呈报张学良，姓吴的不知会给摄制组制造多少麻烦哩！

勇蹈火海 不畏艰险赈灾民

1938年11月长沙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火之后，洪深和郭沫若等人率领抗日救亡演剧队刚从长沙撤退到衡阳，不久便接到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了坚持抗战，打击国民党内顽固派，粉碎汉奸投降派阴谋，命令洪深带领几支演剧队立即赶赴长沙赈济灾民。

在洪深奉命出发前，友人们向他叮嘱：“此去长沙一定得倍加小心，一要防止大火烧身伤及生命，二要防止灾民中的不法之徒哄抢赈灾款。”

洪深则以一种“壮士断腕”般的气概回答说：“我洪深既然委身于抗战，凡是有益于抗战的事情我都要勇往直前地干去，不管前途有多么艰险，我也是义无反顾了。”

长沙的大火整整烧了三天。当洪深等人乘卡车进入市区时，但见未烬的余火尚在到处燃烧，一具具被烧焦的尸体横陈街头，令人惨不忍睹。洪深果断地指挥工作人员将尸体一一运走埋掉，将呼号挣扎的受伤灾民安顿在一处作紧急救护，然后又来回奔波，将灾民分别集合在四、五个广场内，一面扯着因过度疲劳而嘶哑的嗓子，向灾民们作情真意切的宣慰，一面让工作人员将赈灾款送到每一位灾民手中。有的灾民泪流满面地说：“同样是国民党，一个是放火造孽，一个是赈灾救人，真有天地之别啊！”（注：洪深是以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的名义前去长沙赈灾的）

由于洪深组织得力，工作细密，致使在赈灾过程中，未发生一

件哄抢赈灾款的事件。周恩来同志为洪深出色完成任务给予高度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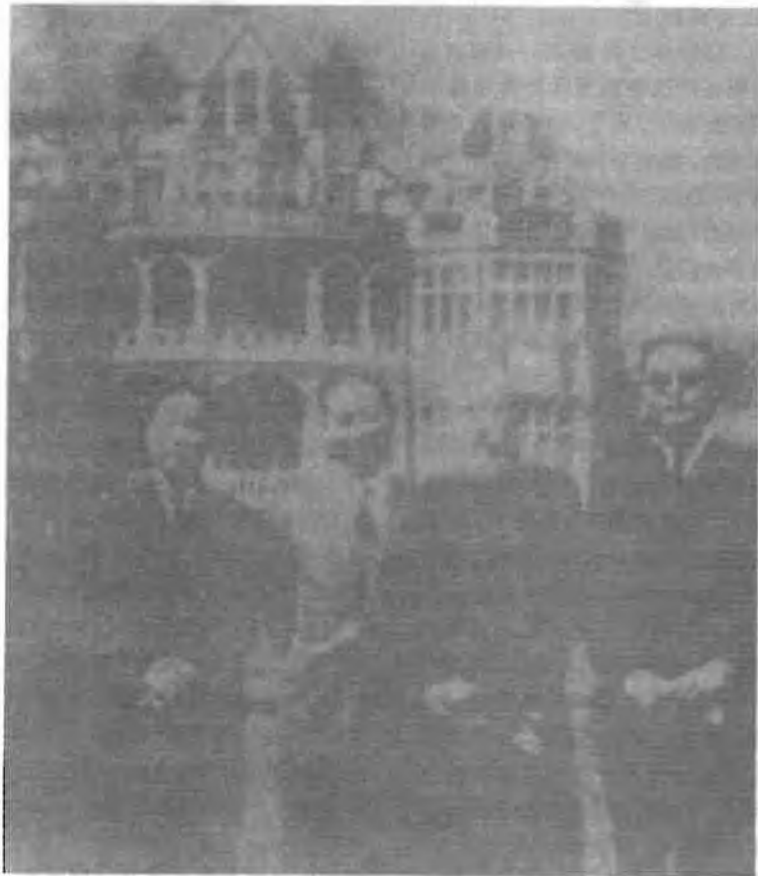
敢赴刀丛 面斗市长吴国桢

1946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上海青年学生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掀起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有一次，国民党大批军警借口搜查“赤色分子”，将复旦大学团团包围，学生们筑垒抵抗，坚持不让。此时，在该校任教的洪深闻讯赶来，与国民党军警进行交涉。这些国民党军警不仅不把洪深放在眼里，还唆使一些特务学生向他进行谩骂和围攻。

洪深忍无可忍，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市政府。他要直接找市长吴国桢论理。

当时，吴国桢正被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秘书又说洪深在市政府门外求见，急忙摇头拒绝接见，可正当他要起身回避，洪深却已冲破警察阻拦，大步跑了进来。吴国桢碍于洪深在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先是打着哈哈客套一番，随后推说有事要走。洪深却是毫不客气地双手拦住说：“吴市长，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军警，在复旦大学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你作为一市之长，可不能熟视无睹啊！”

吴国桢见不得脱身，便打起官腔：“这件事情嘛，我得与警备司令部商议一下才行。”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合影。自左至右：周信芳、梅兰芳、沈钧儒、洪深

洪深急了，大声地吼着：“还商量什么，你应该立即去现场命令军警全部撤下来！”

吴国桢仍是不紧不慢地跟洪深软磨：“不要性急嘛，学生扰乱了社会秩序，出动军警弹压亦是出于无奈，解决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洪深再也忍不住了，目光直逼吴国桢：“吴市长，当今局势是官逼民反，你若不及时妥善处置，发生了流血事件，你这个市长可得负全部责任！”说完甩袖便走。

吴国桢被洪深一顿斥责，心中也着实害怕，万一发生流血事件，全市学生、工人一齐闹将起来，他这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市长更不堪

设想了。于是便假惺惺地拉住洪深，答应一起坐车去复旦大学，调处军警和学生们的冲突。

汽车驶出市政府，狡猾的吴国桢深知洪深在学生中有很高威望，唯恐到了现场经他的言语煽动，学生们闹将起来更难以收场，因此就玩了个花招，让汽车改途开到江湾警察局，把洪深软禁起来，自己则另外换车驶往复旦大学去了。

此时，洪深独闻市政府一事已在复旦大学内外传开，学生们和一些教授纷纷向来到现场的吴国桢提出质问。吴国桢迫于广大群众的压力，也害怕学生借此作导火线，使事端进一步扩大，只得一面命令

数百名军警撤走，一面派人去江湾警察局把洪深送回家中。

洪深的勇敢行动缓解了一场流血冲突，但是国民党自此将他视作眼中钉，先是派特务监视他的家，继而勒令复旦大学校方将洪深无端解雇。虽然这使洪深一家的生活陷入几乎断炊的困境，但是他却对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无怨无悔。

洪深“敢说、敢写、敢做”的故事充分显示了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和爱国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风采。从这一点说，这位中国“易卜生”较之那位著有名著《玩偶之家》的易卜生更胜一筹。

(责任编辑 凌辰)

(上接第19页)

1993年2月20日，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京九铁路领导小组在京成立。随后，铁道部成立了京九办，负责全线的统一指挥，吹响了“决战三年，全线铺通”的进军号角。邹家华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京九铁路从原来五年时间提前到三年时间完成，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

在此前不久，韩抒滨已代表铁道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1995年铺通全线！接着，铁道部发出了“打破常规，决战三年，铺通全线”的紧急动员令。几十万铁路建设大军迅速在京九铁路沿线工地集结，形成了“千军万马战犹酣”的大会战的宏伟场面！

1993年5月9日，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加快京九铁路建设的报告。国务院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确保‘三年铺通，一年配套，边配套，边分流’总体目标的实现。”

原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去世前两个月，在重病中，还就京九铁路问题亲笔致信铁道部；江泽民总书记在太原铁路分局考察时，就京九铁路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他还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审查、观看了北京西客站模型；李鹏总理亲自为京九铁路的龙头北京西客站奠基；李瑞环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京九铁路建设；胡锦涛同志出席京九铁路吉安至定南段开工典礼；邹家华同志为黄河大桥、五指山隧道开工剪彩。

同样，京九铁路也牵动着中国亿万老百姓的心。沿线几千里的工地上，到处都是战争年代人民支援前线那样的催人泪下的场面。

在我们的文章问世时，京九铁路，这一几代人的夙愿，这一伟大的构想，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决策过程后，即将在神州大地上变成伟大的现实。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从历史上那条带有屈辱烙印的“京九”铁路，到现今体现中华

民族团结奋进的京九铁路，沧海桑田的百年间，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两幅迥异的画面。从这一侧面，我们可以透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

“新旧社会两重天”，这句令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醍醐灌顶的话，现今人们已渐渐淡忘了。但是，去掉这句话在当时所包含的某种政治色彩，它比列宁那句人们熟知的“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的话更为直观，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在中共中央提倡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主旋律”的今天，我们与其高喊“让过去走进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诚不如换一个说法“让今天无愧于历史，让未来更超越今天。”

这不仅是因为历史的延续性使得今天成为历史与未来的契合点，还因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有鉴于此，从“京九”到京九的话题，或可为人们留下一点感悟……

(责任编辑 洛松)

为华人增光的曼哈顿建筑师李名仪

● 艺舟陈浜



美国著名华人建筑师李名仪

纽约李名仪/廷丘勒建筑事务所的主人李名仪先生，今年58岁了。他比贝聿铭先生、梁思成先生，整整年轻一辈。人们认为，在贝聿铭先生之外，他可能是美籍华人建筑师中迄今最有实际成就的一位了。三十年来，李先生为曼哈顿设计的IBM大厦、列克辛顿599号大厦以及亚洲协会等等，光彩出众。他在美国其他地方和亚、澳设计的联邦司法大楼、达拉斯艺术博物馆、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几十个建筑，也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和赞誉。

从“小伙计”到事务所主人

1959年，李名仪于美国恩姆赫斯特学院美术系毕业之后，他又“半路出家”，改行到耶鲁大学学习建筑，1963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学位。随即，他受雇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威廉·麦特卡夫建筑

事务所，从最低职的设计师做起，是个“小伙计”。

1967年，三十而立的李名仪到纽约求职，有三家建筑事务所同意录用他，他最后选择了实力雄厚的巴恩斯建筑事务所。

巴恩斯事务所主人巴恩斯先生(Mr. Edward Larrabee Barnes)，与贝聿铭及著名的非立普·约翰逊先生(Mr. Philip Johnson)齐名。他们是哈佛大学同学，都师从现代派建筑宗师W·格罗皮乌斯，也同为现代派建筑的第二代领袖人物。

进了巴恩斯事务所以后，巴恩斯先生这才真正看见了李名仪的才干和为人，对他日益器重和关照，长幼两代，配合默契。上班一年出头，巴恩斯就破格提升李名仪为助理，还把他谢绝的工资增加款存了起来，多年以后资助他购买房屋。巴恩斯如此知遇，李名仪深感幸运。他敬重巴恩斯先生，在事务所里尽心尽力，一干到底，再也没

有另换地方。

但如何设计项目，巴恩斯先生对李名仪一概不管也不帮，只抓最后审批。因此，业务上从萌生思路起，一切全靠李名仪自己摸索和努力。

1967年，李名仪上班不久，美国著名的从叫卖圣诞卡起家的大礼品卡公司——霍尔马克公司（Hallmark），委托巴恩斯事务所设计它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皇冠中心”办公楼群。李名仪面对第一个大型楼群设计，他以为巴恩斯先生会有所指教，却未料到自始至终什么也没说。只在设计完成了，准备由巴恩斯先生亲自向业主陈述的时候，他才交待李名仪，可以用妇女的裙边材料做设计模型的假树。他真是莫名其妙，只好进出纽约市大商店的妇女用品部去找合适的裙边用料，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李名仪设计的这幢不高的办公楼，环绕着一处喷泉，散建在斜坡上，彼此独立又分层连为一体，业主十分满意。因此，若干年后，霍尔马克公司又请李名仪规划了这个中心的总体。

正是凭借他三十年如一日的个人钻研和埋头工作，李名仪的职务，才步步上升，从最初的设计师，到助理，到主设计师。1980年，事务所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授予的“最佳建筑设计企业”的荣誉。这是极为难得的大奖，名望所关，巴恩斯十分高兴。第二年，他提升李名仪和另二人为事务所的合伙人。1987年，李名仪便成了巴恩斯的平等合伙人，事务所的全名也改称“巴恩斯/李名仪建筑事务所”，位居全纽约市一、二千家建筑事务所中的前十名。1993年6月，巴恩斯先生高龄退休。李名仪完全继承了他的事业和班底，成为新一代事务所——李名仪/廷丘勒建筑事务所

的所有者。事务所联系了一批土木、机械和水电设计企业，同时进行着十来个大小项目的建筑设计，忙碌而高效率。

为华人增光的建筑

三十年来，不管李名仪自己如何挑剔，他完成的40多个建筑，事实上象是一颗颗珍珠，撒到了美国和亚、澳各地。他为华人增光的建筑何其之多！但这里只能略述几例代表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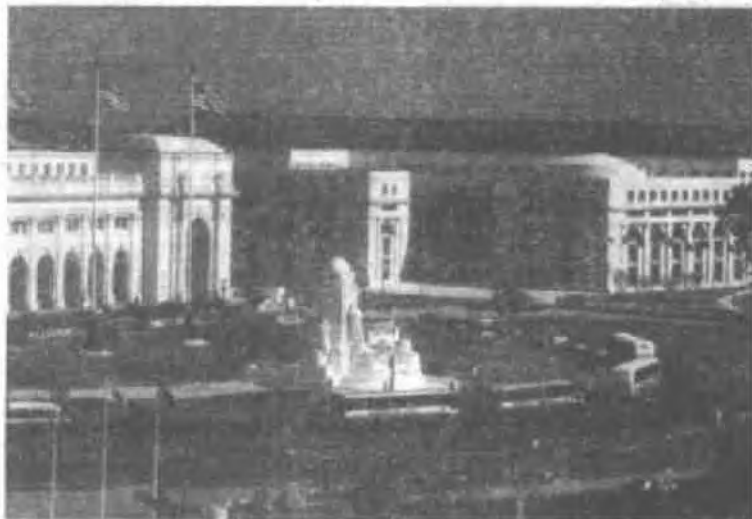
IBM大厦是一幢超高层建筑。从纽约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上可以看见这座深绿色、9万多平方米面积、43层高的大厦，屹立于巍巍楼群之中。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作为世界信息产业的霸主，中国人熟知其名。但它的纽约总部大厦是华人李名仪设计的，知道者恐不多了。

如何巧妙和艺术地处理公司商务和公众过往的矛盾，是李名仪设计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几经研究，他和巴恩斯把IBM总部建筑分成了两部分：大厦主体和公共竹

园。主体只占场地东北部不及一半，平地高楼把办公区送到了天上。东北朝街的大门内凹，行人可以穿行到楼后。内厅通往的地下层间为科学艺术画廊，也向公众开放。楼后的一多半场地盖起了闻名纽约的“IBM竹园”，竹园也是公共通道，用网架和玻璃围成了室内庭院，高大宽敞，充满文化气息，园内有长椅、矮桌、短凳，以及11丛青绿挺秀的茂竹和若干盆错落有致花草。园内老老少少，静坐、进餐、闲谈、读写，进进出出，互不相扰。竹园主门外有五边形石雕，平躺在稍大的水池之中，别有意境。

建成的IBM大厦成了一个引人驻足的去处，竹园是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它用一角的素雅与宁静，多少冲淡了一点世俗和繁忙。大厦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被赞为80年代高层建筑中的名作。1984年，纽约州建筑师协会和纽约城市俱乐部，分别把不超过10个名额的“优秀设计奖”颁给了这幢建筑。

李名仪先生于1985年设计的纽约列克辛顿大道599号商用大



华盛顿国会联邦司法大楼

厦，难得是他表示比较满意的一个建筑。他为599号设计了分层切角的造型和绿色幕墙的外表，表现了对已有建筑的尊重，又突显出自己的异彩。599号的底部是五面形状，然后在不同层高、不同方向，比照周围楼房分别减少一角。最上部是三面形的楼顶，昂首在蓝天白云之下。这种造型，上下变化，四处都能见到斜位矗立的立面，新颖醒目，独具魅力。而且，因为切角恰到好处，还缓解了楼群之间的拥挤，提供了采光的便利。大楼不仅没有减少使用面积，反而提高了出租率。

浅绿色玻璃和铝板做成了幕墙墙面，使这座47层高的楼大厦看似大型碧玉雕塑。10万平方米的599号大厦，为城中楼群增添了新的景观。行人来到列克辛顿大道的这一段，都不免要流连小憩，欣赏这稍觉宽余的悦目街景。权威刊物《建筑纪要》刊载图文，称赞599号大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既独具个性，又融合四邻，“卓绝不凡”。

1990年，李名仪在招标中取胜，首都华盛顿特区主持政府基建的国会山总建筑师怀特先生，采用了他的联邦司法大楼设计。

司法大楼的位置在国会山北麓。1902年，建筑师坦尼尔·勃纳为北麓规划了三幢建筑，他完成了其二，一幢是花岗岩建造的联合车站，另一幢是如同车站西翼的联邦邮政总局。宏伟的大厅，穹顶的门廊，耸立的圆柱，以及外墙上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和檐线，使二者成为一对古典美的建筑。它们的前面是立有哥伦布像的广场。可惜，还有一幢建筑勃纳未及建成，因而车站东侧80年来一直空荡荡的。现在，司法大楼要弥补这一遗憾。

司法大楼设计承袭传统又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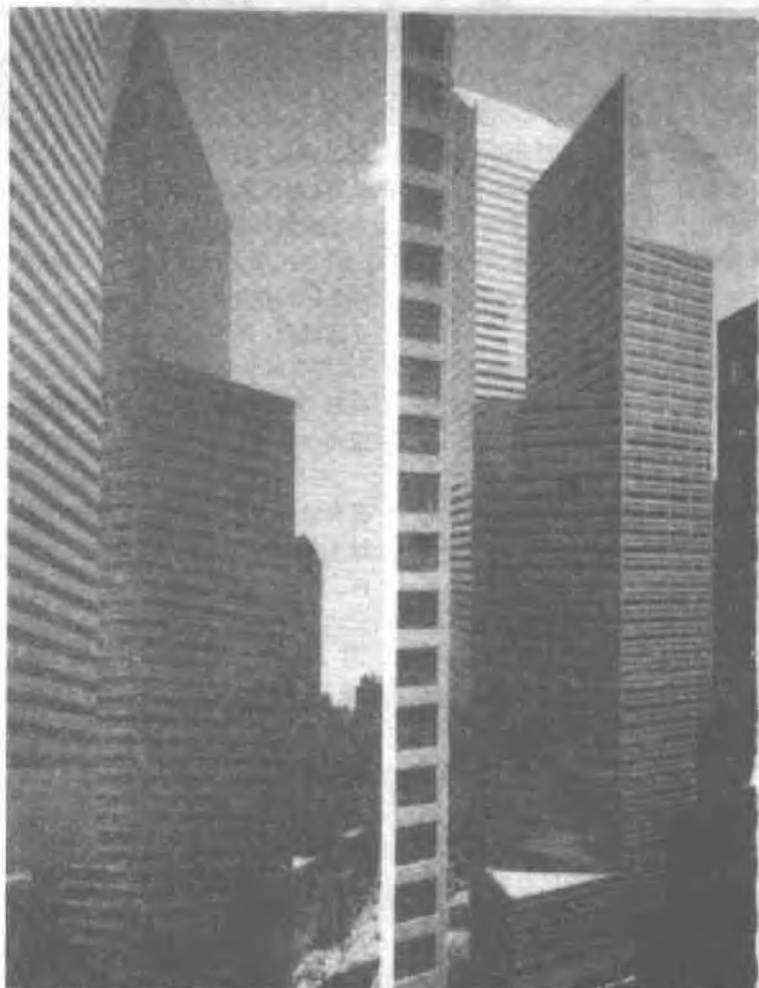
映时代，做到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大楼鸟瞰仿照邮政总局，呈“C”形，开口即正门也面对广场。楼高看齐车站，象是它的东翼。整个楼体外墙，用颜色、质感同车站一样的花岗岩片材包饰，正门和顺东展开的大楼立面，也模仿车站的外形美，但要简练朴素得多。大楼的侧背立面则比较接近现代风格，目的是方便往后的建筑接续。

正门和中庭，李名仪做了精心安排。他没用地政府建筑常用的高台重门，而是门里门外一样平，用了

与楼等高的八块大玻璃做门扇。门里的楼心位置恰好成一个玻璃中庭，高大宽敞。明亮的阳光照进中庭，里面又是几丛修竹。公众从门外可以直见楼里，缩短了同它的心理距离。

这幢被美誉为“联邦风格”的大楼于1992年落成。1994年，它获得了美国建筑合同商协会的“优秀建筑奖”。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占地5英亩，选址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高楼林立的闹市边沿。楼体平展，正



列克辛顿599号大厦全景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

门上高高凸起一个筒形拱顶。大块石灰岩砌筑的外墙，砌线深奥，一片洁白。人们到此，顿感尘寰远去。李名仪用这简炼的色、线、形表现了他对巴恩斯先生建筑艺术的尊敬。

巴恩斯对设计的唯一提示，是要便利出入。因为达拉斯艺术博物馆要向大量公众开放，公众在李名仪心目中位置很重，自來是他设计中的主旨之一。因此，他为博物馆安排了三个出入口，一条室内主道连贯它们，通向馆内各处。各处的展览和活动可统可分，固定的藏品分三层展出，其布置相互衔接又各成系统。观众可以顺序参观，也可自行选看。地面层的画廊外，有一方天井，里面紫藤临池，分外清幽。馆的一角，辟为露天花园，展出各种雕塑。

馆内空间，李名仪的设计，可说曲折连续如流水，封闭又不隔绝外界。大自然的景致，不时被借入室内，调节情趣。天光也加调度，或从高处的小窗射下，或经敞亮的边门涌入，增加了空间流程的变幻和

魅力。人们在馆内参观展览，宽余从容。一位建筑专家说：“如同在一条宁静的河道上航行”。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在李名仪先生的创作生涯中地位很高。1984年建成后，深受欢迎，公众誉之为“楼房森林中的宁静绿洲”。专家评价它，是美国近二十年建造的许多幢美术馆中较成功的作品之一。纽约州建筑师协会和石材建筑研究会先后授予“优秀设计奖”，事过十年，巴黎的专刊还在著文赞许。

情系神州，为中国筹建大厦

李名仪先生祖籍宁波，1937年出生上海，1976年入籍美国。因为父亲在香港办实业，幼年的他在港读书，打下了中华文化的基础。

58岁的他，有50年生活在西方。他夫人是位英国女士，两人在华盛顿特区工作时结成了姻缘。两个孩子现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一家人离居长岛，生活幸福。

但他仍眷恋着中国。他的心愿之一，是为中国广建大厦，用他的说法：“为中国盖大楼”。他设计中屡有竹丛出现，或许是有意表达他的乡思，也或许是他无意流露出潜在的传统。

李名仪先生近年来曾多次回国开展业务，投标上海、广州的建筑设计。散居各地的李姓族人，在祖居宁波的小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兴建一座纪念亭——乾坤亭，由李名仪的二兄李名信先生主持，以李名仪为主同李名觉先生（李名仪的堂兄，美国著名舞台设计大师）一道，共同设计。预计今后逢年过节，海外亲朋或可齐集这座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小亭上，瞻拜先祖，观赏河景。

可以预期，随着李名仪先生和故土联系的逐步增进，他为故国效力的心愿一定会逐渐实现。他设计的大小建筑一定会在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一定会象诗圣杜甫梦想的那样，“大庇天下”，万众欢颜！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凌辰）

本社启事

近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社发行部邮购，每月一期单价3.20元，免收邮费。本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802 电话：6076801 联系人：杜习。

孙中山、毛泽东 海宁观潮

编者按 被誉为天下奇观的海宁潮(又称钱塘潮),是我国钱塘江上的一大盛景。相传唐以前就成为吸引游人争睹奇观的胜地,中国近代两大伟人孙中山、毛泽东也曾先后到这里观赏。

孙中山、毛泽东赴海宁观潮,当时报章杂志未作过详尽报道。最近本刊收到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陈伯良、中共海宁市委宣传科科长项伟寄来的两篇文章,详细追记了两位伟人当年观潮的经过,弥补了这两件重要史料之不足。现本刊特将这两篇文章摘要刊登如后,以飨读者。

孙中山海宁观潮纪实

● 陈伯良

1916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曾专程到海宁观赏了号称“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涌潮。

据当时接待孙先生的同盟会会员许行彬(祖谦)在四十年代所撰写的文章回忆,这天上午,孙先生偕同夫人宋庆龄,暨蒋介石、朱执信、张静江、叶楚傖、任凤冈、吴文耀、孙棣三等人,乘沪杭线头班快车,到达海宁周王庙车站。下车后,由许行彬等人陪同,坐事先囑

托代办的肩輿(轿子)十乘,到达海宁县城。

午饭后,宾主一道步出南门,沿钱塘江边观潮亭(又名大观亭)、占鳌塔(又名镇海塔)、登新落成的三到亭。其时正是中午,大家一边浏览江上风景,一边等候潮来。

约一小时余,潮来如万马奔腾,排山倒海。孙中山先生叹为奇观,赞赏不已。潮水过后,即在亭上摄影,在场的人员都合影留念,唯宋庆龄谢绝参加。临下亭时,许

行彬代表地方上请孙中山先生题词留念,孙先生含笑应允。

这天,当地民众听说孙中山先生来到海宁,倾城而出。孙中山行踪所至之处,一路上人如潮涌,以争睹伟人风采为快。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都曾作了报导。

孙中山先生回沪后,随即给许行彬等人寄来一信,全文如下:

行彬、鸿逵、步青、怀新、林三、稼云、仰之、思莹、伯璜诸同志均鉴:

文以屡历艰难,再履坦途。日前与三五友人漫游贵属,得与诸同志把酒话旧,历叙契阔之情,缠绵意致,匪可言宣;又得陪观浙潮,洗涤怀抱。旋以事冗,未及与诸同志畅叙,深以为憾。别后于是日十时返沪寓。燕处超然,鸥盟仍在,用

倚寸楮，藉表谢忱。敬颂

公安，诸维

朗照不宣

孙文启 九月二十日

孙中山先生还亲笔书写了“猛进如潮”四个字，交蒋介石寄来，信里并说：“奉孙先生命悬于观潮之新亭”，以勉励国人。

“猛进如潮”四字每字径约十二公分。刚收到时，由许行彬交当时城区自治委员朱宝璋，委托他制成匾额，结果匾额尚未制成而朱病故。

不久，张人杰（静江）主持浙江，要这题词，竟无着落。仅由闾幼甫到许行彬家，从两帧观潮照片中出一帧（此帧照片现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另一帧由许保存。据当地许多人回忆，题词曾经悬挂在“商校”（后改名为中山中学）的礼堂前。孙中山先生这幅手迹在湮没了多年之后到抗战胜利时，才知道还保存在曾任海宁县长的顾达一手里。1949年以后，曾有人在许行

彬家中见到过，嗣后许病故，复经十年浩劫，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遂不知所终。

抗战期间，许行彬流落沪上，忆及前情，无限感慨，特撰写两篇同名文章《观潮盛事忆当年》，分别载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一日的《海宁导报》和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海宁特刊》。孙中山先生书信手迹藏海宁博物馆，曾公开展出。有些人以为孙先生当年观潮在“中山亭”，误。另有一种说法，说孙中山先生给海宁题写的是“世界潮

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这几句话。

根据现有资料记载，孙先生这则题词是写给他的同乡、同盟会会员黄文中的。当时黄文中在东京明治大学专攻法律，他翻译的《日本民权发达史》孙中山先生极为赞赏，便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世界潮流……”这几句话，至于是否在海宁观潮时再次题写了这则题词，或有否其他言论，直到目前尚无确证。

毛泽东观潮追记

● 项伟

毛泽东观潮，这是民间传闻已久的话题，由于缺少翔实的史料，直到36年后（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才被揭秘披露。

1993年海宁观潮节，是难得的

国庆、中秋和观潮三节相遇，盛况空前，盐官镇浓妆打扮，欢迎海内外嘉宾。观潮节内容之一，有“江南独步”之誉的海神庙大殿修复开放仪式上，盐官镇（海宁市所在地）镇



孙中山（中立执帽者）海宁观潮纪念留影

志编写组的同志赠送刚出版的《盐官镇志》。书上刊载的一幅由画家张谷良绘画的“毛泽东在海宁观潮”照片，引发了对这一史实的争议。参加仪式的市委宣传部长和笔者萌发了考证史实的愿望。经多方打听，确认退休干部李炳松是毛泽东盐官观潮的主要陪同人，于是上门寻找，终于在他女儿家找到了李炳松同志。他当年是三星乡副书记。说起毛泽东来盐官观潮的情景，记忆犹新。

李炳松说：那是1957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十八），那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乡里留下他值班。午饭时分，毛泽东同志从杭州来盐官观潮，因逢传统的观潮节，游客甚多，故选择了镇郊三星乡七里庙（现属盐官镇）。毛泽东及随行人员乘三辆黑色轿车，轻车简从到七里庙，令李炳松和七里庙联兴村书记张利丰作陪，登上与长城、大运河齐名的古代三大工程的钱塘江鱼鳞石塘。那天天气晴热，身着一套烟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很随便地在塘上简易棚里休息，饮用随身带的水与食品。不多时涌潮似万马奔腾而来，气象万千。主席专注眺望，到涌潮西去消失，主席仍聚精会神，直到江面恢复平静，前后近2小时。李炳松为荣幸见到伟人一面，至今仍激动不已，尤其对主席平易近人、不惊动地方政府的作风深表钦佩。

岁月流逝几十年，毛泽东盐官观潮早已成为

历史，但毛泽东同志《七绝·观潮》诗的公开发表，为这段史实提供了完整的史料。这首七绝诗是这样写的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王光宗回忆：

1957年的一天，上午9时，我们警卫人员先赶到海宁七里庙。过了段时间，主席和几位领导同志乘车来了。主席走到临时搭起的小帐篷边，看到我们就说：“看到潮水没有？”

“大潮还在后面呢，等着你们来看。”我答道。

“那好啊！我们今天得好好看看天下奇观。”主席大声笑着，朝大家说。

主席和省委领导坐下来，边喝茶边谈话。主席显得有点激动，他不时地看表，又问大潮什么时间过来。省委领导说，要到12点半。主席又看了看表，说：“还有20分钟啊”。这时，主席接过望远镜看了

看。他站了起来，手搭凉篷望着潮水过来的方向。

12时20分，潮水奔涌而来，借着风势，发出隆隆的沉闷的巨响。主席双目凝视着潮头，好象在思考着什么。巨大的涌潮映衬着主席魁梧的身躯，他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翻天覆地的岁月。

主席观赏着大潮，微笑着拍手，大家也跟着他一道鼓掌。这时，主席发现我一直跟在他身后，马上移动了一下位置让我观潮，还笑着说：“小王，我不会掉下去的，放心吧”。

潮水过后，主席坐在椅子上休息。他问我们潮水是怎样形成的，又将月球潮汐的道理向我们解释了一遍。他说：“南宋的时候，钱塘江潮可直到杭州，那时我们可以站在吴山上观看。现在钱塘江入海口因为泥沙堆积变小了，所以就要跑到海宁观潮。再过几百年，海宁也要看不到潮了”。大家都佩服主席渊博的知识。

尔后，他转身面对钱塘江壮美的景色，思绪万千，留连忘返。……

（责任编辑 方 隽 焕 然）



厉慧良五次为毛泽东演戏

● 刘连群

1945年8月中，山城重庆沉浸在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喜悦之中。此时，又传出新的佳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进行寻求和平的国共谈判，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和欢迎。

就是这次中国近代史上两位最高领袖的历史性会面，给年轻的厉慧良带来了同时拥有两位不同寻常的观众的机会。

那天，厉家班忽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复兴关有戏。复兴关是重庆的一个地名，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党校



厉慧良十四、五岁时，在《长坂坡》中饰赵云

的所在地。校内有一座礼堂。厉慧良从1944年第一次为蒋介石演戏，先后十几次都是在那里演的。

这天开演以前，听后台的警卫人员念叨：今天晚上是蒋先生招待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看戏。接着传来鼓掌的声音，说是毛泽东来了！厉慧良忙跑到台上，撩开幕布往下看，只见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人，身材很高，留着挺长的分头，稳步走到第一排左侧的一个三人沙发前，坐下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台下的人很多，光线也暗，看不清楚面容，只是觉得毛泽东比较瘦。

接着，蒋介石夫妇入场。厉慧良注意到，毛泽东并没有随众人一同站起来，等到蒋介石从右往左，边走边与人们握手，快走到他坐的沙发跟前了，毛泽东才起身和蒋介石握手，两个人好像寒暄了几句。然后，蒋介石转身走向中间的座位坐下，众人随之落座，就开戏了。

在演出过程中，厉慧良顾不上往台下张望，也看不清毛泽东和观众的反应。散戏以后，当时不讲究谢幕，也没有人讲话，演员们就都忙着卸妆了。过了两天，张治中将军又招待毛泽东看厉家班的戏，厉慧敏主演的《十三妹》，这次不是包场，厉慧良要坚持剧场的日常业务演出，没有参加。晚上回来，听妻子薛慧萍（老旦演员，在《十三妹》中反串安公子）说：毛泽东在开戏前发表了讲话，他问讲的什么？妻子说：是关于希望和平、国家统一的内容。还说：毛泽东咳嗽得挺厉害，讲几句话就要咳一阵。就这样，他知道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形。

复兴关的那场演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应该说是段千载难逢的经历，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位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人物，几乎对立、斗争了一辈子，有几次能够相聚和坐在一起看戏呢！厉慧良同时拥有这样的两位观众，实在是太难得了。

直到五十年代，在一次国宴上遇见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在重庆谈判期间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问厉慧良还记得那对在复兴关演的什么戏吗？厉慧良说不记得了。徐冰告诉他是《林冲夜奔》。过后回到重庆，和班里的师兄弟们提起来，他们又说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他演前鲁肃，后关羽。到底

演的是哪一出呢？如今连厉慧良本人也不敢肯定了。

二

多年来，厉慧良博采众长，反复锤炼，使他的武戏和文戏均已开始走向成熟，特别是武戏，形成了富于个性的一批拿手剧目，构成了他雄浑、飘逸、帅美的多姿多彩的表演风格。

厉慧良第二次为毛泽东演戏，是相隔12年以后的事了。1956年，厉慧良与杨宝森共同领衔组成了天津市京剧团。转年的4月，他正在率团在内蒙古、河北巡回演出，接到了文化部调他进京演出的电报，他们全体60余人兴冲冲地开进了北京。到了文化部才知道，原来只调厉慧良一个人，我们党和政府要招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要看京剧《野猪林》，因饰演林冲的李少春嗓音失润，调他来顶替。一个人引来一个团，文化部只好采取应急措施，把剧团安排在中和戏院演出。

《野猪林》的排练很顺利，除厉慧良外，演员全是原中国京剧院的原班人马，袁世海饰鲁智深，杜近芳饰林娘子。几天后在政协礼堂彩排，周恩来总理审查完了到后台接见演员，表示“不错，可以演出了”。当时，周总理还兴致很高地问厉慧良：“听说，你的赵云也演得不错？”厉慧良忙谦逊地回答：“不行，一般……”周恩来接着感慨地说：“现在，能演好赵云的演员不多了！”还说：“赵云要是活到现在，一定是个优秀共产党员，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啊！”在场的人们听着都笑了。

5月2日晚上，《野猪林》在政协礼堂正式演出。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厉慧良的林冲基本上和李少春的路子一样。只是在气质和某些技巧的运用上有些不同，经过排练，与同台者的合作已经非常默契，演出很成功。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上台接见演员，当毛主席走到厉慧良跟前握手时，厉慧良发现他比在重庆时胖了，头发也剪短了，他对厉慧良还说了一句话，可惜带有很浓的湖南口音，没能听清。全体合影时，厉慧良只顾往后边站，毛泽东伸出那只大手，把他拉到了前面，与毛泽东分站在伏老的两边，就这样留下了一张富于纪念意义的照片。

三

两年多以后，即1959年9月下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毛泽东到天津视察，第三次看了厉慧良的戏。

那天下午，厉慧良正在人民礼堂（现为科技会堂）排练十年大庆的献礼剧目。剧团的书记找到他，兴奋地

说：“毛主席来了，要看你的戏！”他马上问：“看什么戏？在哪儿演？”书记说：“主席要看《挑滑车》，今天晚上在干部俱乐部（现天津俱乐部）演出。这件事暂时保密，只你我两个人知道。”排完戏，书记把车找来，就和他提前去了。

厉慧良那年36岁，风华正茂，身体强健，精力十足。《挑滑车》是他经常上演的拿手戏，塑造了高宠这个勇猛无畏的民族英雄和孤胆英雄。他曾以此戏为例，强调“只有在练功时能练它两遍三遍不休息，舞台表演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才能更好地用程式来塑造人物。”当年梅兰芳看过以后，曾表示好多年没有看过这样精彩的《挑滑车》了！

给毛泽东演的这场，他演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既从容不迫，而又冲勇火爆，高潮迭起，他认为自己艺术鼎盛时期的一次成功之作。台下的反应很热烈，不断响起掌声。毛泽东也和大家一起拍手，演出结束谢幕时，他起身再次鼓掌，显然对戏很满意。事后，天津的李耕涛市长告诉厉慧良，毛主席看戏时询问了你的情况，很关心你。李市长勉励他在思想和业务上继续努力，还纳闷地说：“你的动作有时跟别人一样，怎么就这么好看呢？得好好研究一下。”

四

1961年春天，厉慧良带队去北京进行业务演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先伤后病，虽然经过及时医治，但体质在短时间内却很难完全恢复，一些带有高难动作的武戏就暂时不能演了。正在这期间，一天剧团的一位干部告诉他：“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了，主席又要看你的戏。”他说：“好哇，看什么戏？”那干部讲：“主席没有点戏，征求剧团的意见演什么好。我想了想，主席看过你的《挑滑车》，就说那还演《挑滑车》吧！”厉慧良一听着起急来，问道：“你不是知道我现在身体状况吗？最近一直没演《挑滑车》了，体力不行。主席过去看过我这出戏，如果这次演的不如上次，他会怎么想？眼下又正在‘节粮度荒’时期，主席发现我的体力不如以前了，难免想到：你看，吃不饱饭，把厉慧良饿坏了，这不是会增加他的思想负担吗？……赶紧跟主席办公室再通个电话，讲明原因，换一出戏，《长坂坡·汉津口》、《艳阳楼》、《钟馗嫁妹》、《一箭仇》，都行！……”

那位干部听了面露难色，一直不肯答应，就是不去打电话。

这样一来，厉慧良就没退路了，只能硬撑着上。前几场戏还能应付下来，演到《挑滑车》就觉得力不从心，

勉为其难，也就不精彩，距正常水平相差甚远。到结尾处，高庞是别着两腿，仰面倒在地上。刚拉大幕的时候，台下还有掌声，等到别人把他搀起来，掌声就听不见了，他也就没有让人再把大幕拉开。

回到后台，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懊悔，一通埋怨，发火——可又有什么用呢？

五

这次不成功的演出，如果问题仅限于此，倒也无关紧要，因为舞台上也没有常胜将军。然而，这终究是一场性质较为特殊的演出，所留下的后果也随之很不寻常。具体到厉慧良来讲，影响到两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时隔不久，外面就有了传言，说他给毛主席演戏“泡汤”，不卖力气，还公然不肯谢幕云云。这在当时足以构成政治问题，但起先只是传言而已，转过年来，即1962年夏天，厉慧良又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演出了《长坂坡·汉津口》，这是毛泽东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他的戏。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运动接踵而至，直到“文革”席卷神州，厉慧良被打成“反革命”。其中一条罪名就是给伟大领袖演戏“不卖力气”，“不谢幕”。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当作“反动”的铁证。

其二，那场不成功的演出，对正当盛年的厉慧良不曾迎头一击，刺激实在是太深了，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政治上的后遗症。而是对自己的艺术生涯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一代武生宗师杨小楼，50多岁还能演《挑滑车》，照样光彩照人，自己才30几岁就演不动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演不了《挑滑车》这样的戏，还算什么大武生？那些天他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不久，剧团离开北京，赴山东巡回演出。厉慧良整天想的都是《挑滑车》，反复琢磨，苦思对策。于茫然中忽然有所发现，自己的表演有许多重复、繁琐的地方，有许多附加的动作，是不是非得这样？效果是不是好？他到一块空地上比划，边走边身段，边从观众的角度设想观赏效果，渐渐觉出一味追求繁难，动作安排得满满，有时反而令人眼花缭乱，留不下清晰、深刻的印象，费力不讨好。关键在于安排得恰当、适度、巧妙。这一发现，使他豁然开朗，于是着手重新梳理整出戏的身段、技巧，剪去多余的、重复的枝蔓，在艺术处理上力求简洁明快，突出重点，高潮的地方则进一步加以充实、丰富，放手渲染，把劲用在刀刃上。整理过后，他再从头练一遍，丝毫没有疲劳的感觉，一时好不兴奋！

回到天津，重贴《挑滑车》，按照新的路数演，剧场效果比以前更好了。有些不知道内情的朋友看了，高



厉慧良（中）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左）、景荣庆（右）合影（1993年11月）

兴地向他祝贺：“慧良，你这出戏又行啦！”

经受住了舞台的检验，他坚定了信心，开始对其它的戏特别是自己的代表剧目，按照同一思路进行取舍加工，戏变得越来越严谨、越紧凑、越精彩了。删繁就简，由博而约，实际上是艺术创造的一个新的飞跃，表演艺术的进一步升华。他在年近七旬时，仍能上演《挑滑车》、《艳阳楼》、《战宛城》、《长坂坡·汉津口》等重头戏，并且保持精神饱满、气力充沛的风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一场演出，祸福双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正是他的不寻常之处吧！

作者附记：

此稿写成于1994年12月初。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仅隔不到三个月，厉慧良先生就因心脏病猝然发作而去世。那是1995年2月27日，他刚在上海参加了元宵佳节的“东方雅韵”名家荟萃演出回来不久，津门春寒料峭、风雪交加的清晨。

伤惜之际，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与厉慧良先生结识多年，很早就看他的戏，写过他的戏评，只是从未长谈过，直至去年秋天才抽出时间谈了三个半天，较为详细地了解他的艺术生涯，也才有这篇文章，多少减轻了些许遗憾！

以为祭。

1995年4月3日又及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孙心申）

写给抗日名将的挽联

● 吴海发 辑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爱国军队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旗帜下，为反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强盗，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狠狠打击侵略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许多抗日将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气壮山河。缅怀抗日阵亡将领的英雄业绩，国家领袖人物、军队高级领导人、社会贤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写下挽联，呈献在烈士灵前，寄托民族的哀思。

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人民是永远怀念的。北京民族文化宫前有佟麟阁路，白塔寺东侧有条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保卫卢沟桥牺牲的佟、赵两将军。佟麟阁于1937年7月28日牺牲在北平南苑大红门战场。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年仅46岁。同日在大红门牺牲的还有赵登禹将军，他是遭敌人伏击而身亡的，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赵登禹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最先为国捐躯的将军。冯玉祥发表了悼诗《吊佟赵》，并敬献挽联：

报国敢云天职尽，
立身当与古人争。

既是对部将佟、赵两将军竭尽爱国军人天职的肯定，也是在勉励生者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彻底打败侵略者。

1938年3月12日，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了郝梦龄等人为国牺牲的精神。他指出：“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中国以崇高伟大的模范”。这里说的饶国华将军，是受命率军在安徽广德十字铺组织反攻时，被日寇包围，拒不投降，写下绝命书

后，于1937年12月1日举枪自戕，以死报国。时任第七战区一四五师中将师长。蒋介石为重庆公祭饶国华撰写的挽联是：

虏骑正披猖，闻鼓鼙而思良将；
上都资捍卫，冒锋镝以建奇勋。

上联写日寇气焰嚣张，战鼓激荡沙场，渴望良将之心情；下联则赞扬饶将军捍卫首都的功劳，肯定了他挥戈广德，建立奇功的壮举。

1938年山东台儿庄战役，围歼了日寇板垣、矶谷两个机械化师团大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震惊中外。在台儿庄战场上牺牲的抗日将领有王铭章将军，时任第一二二师师长。在滕县火车站电灯厂附近与敌军遭遇，身中数弹，临终，他挣扎着厉声对随从说：“你们去吧，继续和敌人拚命。中华民族万岁！”李宗仁闻知后指出：“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王铭章灵柩于1938年5月9日运抵武汉，各界迎灵设祭。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名义联合敬献的挽联是：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名字含有筑路先锋之意的范筑先将军，1938年11月牺牲在鲁西北聊城战场上，时任山东第六战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聊城县长。范将军岁在花甲，仍每战必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带头冲锋杀敌。他在聊城东门壮烈殉国后，在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董必武、吴玉章联合敬献的挽联是：

三友见精神：松体通，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高气苍，直到岁寒全晚节；

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卫民，子女都称勇士，顽廉懦立，共纾国难绍遗风。

朱德的挽联是：

战事方酣，忍看多士没元，惟其志勇；
吾辈尚存，誓必长期抗战，还我河山。

董、吴的挽联赞扬范筑先将军有松、竹、梅三友的风格与正气，能在国家危难时保持晚节。而且他家一门忠义，次子在济南抗战中殉国，其余一子三女都参加了抗日队伍。范将军的爱国精神使顽者廉洁，懦者自立，去共同解除国难，继承发扬其爱国精神。朱德的挽联强调范将军的忠诚勇敢，发出了“还我河山”的钢铁誓言。

曾率部在卢沟桥英勇还击日寇的张自忠将军，1940年5月在湖北枣宜会战中阵亡。时任兵团总指挥兼集团军总司令，年39岁。周恩来特撰写了《追念张总上将》一文，毛泽东题挽词：“尽忠报国”。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张自忠将军大会。大会上的挽联有：

一杯之奠，岂止泪洒同情；
万众之心，实欲驱除暴日。
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
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

山西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也是艰苦卓绝的。1941年，担任陆军第十二师师长的寸性奇将军在水谷朵高地负重伤，不愿被俘受辱，用手枪短剑自戕，壮烈殉国。在同一战场举枪自戕的还有唐淮源师长。

蒋介石为这两位将领敬献挽联：

百战殊勋著河上，
双忠大节壮中原。

龙云敬赠的挽联是：

国士古无双，溯频年迹迈长征，气壮山河，六诏笃生双国士；

将军志不二，有此日开会追悼，各垂竹帛，千秋同仰二将军。

龙云称赞二将军，如此杰出人材历史上难找，云南（古称六诏）却诞生了他二人。寸、唐两将军必定名垂史典。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1942年5月24日，在率部掩护总部机关转移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噩耗传出后，延安各界同声哀悼。朱德总司令献换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死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出生在安徽乡下养鸭为生的贫寒人家，曾在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安徽公学读书。1942年5月26日不幸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时年38岁。英年逝世，国人痛悼。

毛泽东特写挽诗祭他：“沙场竞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的挽联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粹。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甸，国人无处不哀思。

张治中的挽联是：

国外播雄威，万里尸归魂壮烈；
军中草露布，千秋言在气清刚。

千秋言在，指戴将军常以岳飞、文天祥的精神激励部属官兵，他谱写战歌《战场行》让战士高唱。

威震敌胆，活跃在冀中平原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其母殉国后，他在追悼大会上，号召全体军民，化悲痛为力量，为所有受难者报仇。1944年2月7日，马本斋因患急性肺炎病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送了挽联，朱德的挽联是：

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
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944年9月11日，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率领部队在河南县八里庄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7岁。1945年2月，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敬献的挽联是：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重祖国；
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陈毅赋诗云：

吾党匡天下，得君一俊才；
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

本文搜集的挽联仅为一小部分。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读这些挽联，仍使我们从中得到感悟，受到教育。

（责任编辑 丁末）

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刘耿生

清末自咸丰至光绪年间，曾发生四起轰动社会的案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沧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和“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

这“四大奇案”，因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尤其案情本身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作为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本文根据清代档案及有关史料，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真实史实作一介绍。

葛品连因病死亡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浙江省余杭县人。其父早死，寡母毕王氏因生活贫穷，于同治二年（1863）携毕生姑再嫁本县城粮差喻敬天，改称喻王氏。因毕生姑喜穿件绿色上衣，腰间系条白色围裙，人又长得清秀，邻居们都叫她“小白菜”。此时喻敬天租住木匠沈体仁的房屋，毕生姑之母喻王氏和沈体仁之妻沈喻氏在聊闲天时说定，等毕生姑长大成人，就许给沈喻氏与前夫葛夙来所生之子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也是余杭县人。后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军队打到这里，他参加了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葛品连逃回余杭，在一家豆腐店帮伙，因多夜间工作，故时宿店中。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毕生姑十七岁，与葛品连完婚，改称“葛毕氏”。四月，夫妻租住杨乃武房屋，两家同院居住。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祖父杨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杨乃武娶妻詹氏，生一子，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

同治十一年七、八月间，葛品连多次见到葛毕氏与杨乃武同坐共食，疑有奸私，几次在夜晚自豆腐店潜回家，在门外、檐下窃听，仅闻杨乃武在教葛毕氏读经书识字，未发现奸情。葛品连将怀疑告诉母亲沈喻氏，沈喻氏趁葛品连上工时，前来察看，也看见葛毕氏和杨乃武正在同坐共食，遂加深怀疑，并向外人谈论，巷间遍传。杨乃武听到流言蜚语，以增加房租为名，希望葛品连搬走，沈喻氏等也劝儿子速迁避嫌。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葛品连夫妇移住喻敬天表弟王心培院内，王心培留心察看，杨乃武从未来过葛家，也未发现与葛毕氏有过任何接触。



杨乃武在教葛毕氏读书识字（王晓薇 绘）

这年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将她责打，葛毕氏悲愤交加，自将头发剪落，扬言要出家为尼。葛毕氏生母喻王氏和婆婆沈喻氏闻讯赶来，葛品连说：“为杨乃武前事，借此出气”等语，此后，葛品连病势加重。

葛品连左腿患丹毒，俗称“流火”，十分疼痛。十月初七日发烧，葛毕氏劝他不要上工，他因贫穷，仍坚持上工两天。初九早晨，他由豆腐店回家，沈体仁在大桥茶店碰见他，见他面色发青，浑身发抖，忽打寒战；地保王林在点心店前见葛品连买食粉团，食后即吐，勉强走回家，见到王心培妻子，她喊下葛毕氏扶他回屋休息。

葛品连进屋即睡，时欲呕吐，发烧畏寒，嘱葛毕氏托喻敬天买来东洋参、桂圆煎汤服用。服后病势立刻加重，喉中痰响，口吐白沫，不能言语。葛毕氏托王心培叫来沈喻氏、喻王氏等人，又请来余杭名医严雅州，诊为“痧症”，用万年青、莱服子（萝卜子）灌救，已经无效，申时死亡。沈喻氏为之换衣，留心查看尸身，并无可疑迹象。

葛品连身体虚胖，虽死于秋末冬初，但南方气温较高，至初十日夜晚，尸身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沈喻氏在人挑唆下，本来就对儿媳不满，盘问她，她坚称是“病死”。但沈喻氏仍请地保王林代写呈词，仅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验尸”，并未涉及任何人，也未说系何因死亡。十一日黎明，王林携同沈喻氏将状纸投递于余杭县衙。

错验尸铸成冤狱

余杭知县刘锡彤，看了沈喻氏的呈词后，正欲前往验尸，可巧有个秀才陈湖到县衙给人看病，向刘锡彤提到葛毕氏与杨乃武有私，今葛品连很可能是被他们谋毒。刘锡彤又叫门丁沈彩泉出去打听，回称：外人颇多议论，和陈湖讲的一样，刘锡彤深信不疑。

当天中午，刘锡彤带领门丁沈彩泉、学习仵作（验尸员）沈祥，到葛家验尸。沈祥首次独立验尸，水平太低，将尸体口鼻流淡血水，认作“七窍流血”。用银针探入咽喉，拔出后本应用皂角水反复擦拭，若银针上青黑不去，则可断定系服毒身死；可沈祥毕竟是个新手，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只见银针上有黑色粘液，即说：“服毒身死”。

刘锡彤在县衙听了陈湖之言，已认定葛毕氏与杨乃武奸杀亲夫；现在又经仵作验尸，确认不疑。遂将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刑逼供，葛毕氏在酷刑下招供：与杨乃武因“恋奸情热”，于十月初五日杨给她一包砒霜，初九日下午，她将砒霜掺入桂圆汤内，毒死丈夫，后来婆婆看出服毒形状，自己承认毒死丈夫。葛毕氏的供词已与沈喻氏的呈词不符，刘锡彤也不想想：既然葛毕氏已向婆婆承认了毒死丈夫，沈喻氏的呈词为何不提此事，仅说：“死因不明”？

刘锡彤立即传讯杨乃武到堂，出示葛毕氏供词，杨乃武拒不承认，因他是新科举人，不能动刑。十月十二日，刘锡彤向上司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不等批文下来（十二月初七日才下圣旨，同意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刘锡彤即用酷刑逼供杨乃武，并令与葛毕氏对质，葛毕氏惧怕再动刑，仍照前供，但杨乃武拒不承认。

奉上级令，刘锡彤将二犯及人证押往杭州府，他在案卷中作了篡改，如沈喻氏呈词称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验尸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丝毫不提动刑之事。十月二十日，除犯人，还有沈喻氏、王林、王心培等，一同解到杭州府。

酷刑下冤上加冤

杭州知府陈鲁，让刑名师爷简要念了案卷后，故意一拳击在案卷上，说：“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立即传审杨乃武，根本不许杨乃武分辩，即施“跪火练”酷刑，

杨乃武双膝被烧焦，只得招供：自己与葛毕氏同院居住，后“调戏成奸”，八月二十四日二人在葛家“房内玩笑”，被葛品连撞见，自己逃走。九月二十日，见到葛毕氏，她说被丈夫责打，自己“恋奸情热，起意把葛品连毒死”。十月初五日，将砒霜“密交葛毕氏收藏，嘱她乘便下手”，初九日，葛毕氏把砒霜和入桂圆汤内，毒死葛品连。

陈鲁追问砒霜自何而来？杨乃武想起从余杭到杭州，经过东乡仓前镇，曾见有一家药铺门口挂着“钱记爱仁堂”的招牌，随口供认：“因有事去杭州，十月初三日路过仓前镇，在爱仁堂捏称毒鼠，用钱四十文，买得砒末一包”。陈鲁又问药店老板叫什么名字？杨乃武胡说“钱宝生”。

陈鲁又审问葛毕氏，她惧怕再受刑，所供同前。接着传证人。先传沈喻氏，她听到杨乃武和葛毕氏的供词后，也顾不得考虑是真是假，只是满腔仇恨，要为儿子报仇，因而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初九那天下午，我给儿子换衣服，见七窍流血，浑身发黑，盘问媳妇，她承认是杨乃武给她砒霜，毒死我儿子，十一日我便报官”。陈鲁也不想，初九就知道自己儿子被毒死了，何以十一日才报官？再传王林和王心培，他们心里明白：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责打妻子，杨乃武并未去葛家；葛品连死前发烧，确有病情，但他俩见杨乃武和葛毕氏都已承认，何必再为他们申辩？遂也信口雌黄，作了伪证。

十月二十七日，陈鲁令刘锡彤传讯“钱宝生”，实则他叫钱坦，根本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让陈湖和沈彩泉威逼利诱，钱坦只得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此时，自刘锡彤以下，大家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是冤枉的，但各自出于个人目的，不仅无一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且都竭力作伪证。

陈鲁接到钱宝生的伪证后，草草定案，根据《大清律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濬。

杨昌濬审此案时，为慎重起见，派黄岩县候补知县郑锡淦到余杭县微服私访。刘锡彤事先得消息，盛宴款待，重重贿赂，二人竟联名回复杨昌濬，称“案情确凿，无冤无滥”。杨昌濬也没留意怎么调查者和被查者共同写“密访”结论，就上报刑部。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杭州府三堂会审

刑部接到案卷后，正在复核。同治十三年（1874）

四月，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供辩”，详细揭露了葛毕氏受刑后攀诬自己，自己亦在酷刑下屈打成招的经过，并设法将这份“供辩”送到自己姐姐叶杨氏（杨菊贞）手中。叶杨氏让家中佣工王阿木和其堂弟王和尚，携杨乃武的“供辩”到京师都察院呈递。京师都察院按例行公事，将此“供辩”发还杨昌濬复查此案。

杨乃武在“供辩”中主要控告陈鲁严刑逼供，但杨昌濬却令陈鲁复审此案。陈鲁复审时，根本不许杨乃武分辨，只是用重刑威吓，杨乃武知道，寄希望于陈鲁平反此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免再受皮肉之苦，只得再次招认。葛毕氏更不敢翻供。陈鲁仍照原审结果，上报杨昌濬。

这年九月，杨乃武再次写了呈词，妻詹氏托人上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上告。这一次步军统领衙门上奏朝廷，慈禧太后第一次知道这案子，降旨：“交杨昌濬司亲提严讯”。杨昌濬发现事情闹大，决定请湖州知府锡光代为复审，因为杨昌濬知道慈禧太后对他们这批汉人封疆大吏不信任，希望由一位满人官员复审，取得慈禧信任，也为了万一发现复审有问题，以开脱自己责任。

锡光正要复审，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国有大丧，一切政务均要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设奠哭灵。直到第二年二月十二日才能继续复审，这次复审即为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三堂会审”。

这次审讯，没有动刑，杨乃武、葛毕氏双双翻供，讲出历次严刑逼供之事；“钱宝生”（钱坦）也讲出刘锡彤如何威逼他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之经过。锡光也不知如何是好，请示杨昌濬。杨心想：以前历次上报朝廷，都坚称案情确切，若这次否定了，等于否定了自己以前所为，会影响前程，因而以“未能审出结果”的话搪塞朝廷。

胡瑞澂奉旨复审

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上奏再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指出此案可疑之处。慈禧太后派浙江省提督学政胡瑞澂复审此案。胡瑞澂与杨昌濬私交甚厚，他到杭州后，和杨昌濬密谋，决定维持原判。胡瑞澂虽知道杨乃武是冤枉，却不能让他伸冤，办法是从他的供辩中找出破绽，堵住他的口。

杨乃武在供辩中急于洗刷自己，有两处不实，一是他胡说八月二十四日是余杭县衙役何春芳在葛家与葛毕氏通奸，被葛品连撞见，传来葛毕氏与何春芳，二人



杭州知府陈鲁刑讯逼供杨乃武 (王晓董 绘)

皆否认此事；另一处是杨乃武诬称葛品连死后，余杭县衙役们在葛家“私议两日”，借以勒索他，经审，亦无此事。

胡瑞澍又审葛毕氏，令葛毕氏务必说清“葛品连如非中毒，到底因何死亡”？葛毕氏不知道，胡瑞澍以刑相吓，葛毕氏只得胡说丈夫因负债过多，无力偿还，而自尽。胡瑞澍又问她：欠谁的债？以何方式自尽？葛毕氏无言以对，只得承认是胡说。

胡瑞澍抓住了杨乃武与葛毕氏在无关紧要问题上的不实之词，小题大作，并咬定其它事上也是假话，用跪火砖等酷刑对他俩日夜不间断地“熬审”，迫使他俩不敢再翻供，也是替杨昌濬打击报复。最后一堂，杨乃武双腿被夹断，用铜丝穿入葛毕氏乳头，二人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文艺作品写杨乃武将姓名写成：“屈打成招”四字，查无此事。而是杨乃武失去知觉，差役抓他手按个手印。

老奸巨滑的胡瑞澍，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一方面肯定了以前审讯的结果，另外又想借主持科举考试一走了之，以免节外生枝。杨乃武已经彻底绝望，在狱

中作联自挽：

“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胡瑞澍）充刑台，乃武归天”。

翁同龢伸张正义

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与翁同龢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为毓庆宫授读。夏同善丁忧（父母去世守丧为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著名的中药店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为夏同善饯行，胡雪岩席间提到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后相机进言。

翁同龢在咸丰六年（1856）中状元以前，曾在刑部当差，他在任光绪帝老师之前，还曾任过刑部右侍郎。正在此间，发生了杨乃武与葛毕氏案。慈禧太后见了胡瑞澍的奏折后，传谕：“著刑部建议具奏”，翁同龢接到上谕第二天，即向刑部浙江司索取杨昌濬、胡瑞澍的奏折及附的《供招册》，细核了杨乃武、葛毕氏的“招供”与“翻供”，发现几处可疑，都有标签标出，出示给刑部尚书桑春荣看。桑胆小怕事，且杨昌濬每年都重金贿赂他，他也不想得罪杨昌濬，主张维持原判。

翁同龢采取的策略是，先联合其它有关官员，如与翁同龢同值毓庆宫的张家襄、广寿，刑部左侍郎绍祺，刑部浙江司主稿林拱枢（林则徐第五子）等，大家一致同意平反此案。然后，一起和桑春荣展开了长时间辩论，桑只好让步，同意发文给胡瑞澍，让他将可疑之处再审。翁同龢的换贴弟兄荣禄，此时正任步军统领，翁请荣禄抄写杨乃武两次“供辨”原文，进行研究，发现杨乃武提出的可疑之处，胡瑞澍上奏时极力回避，已经是欺君罔上。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翁同龢联合了刑部尚书崇实、桑春荣，礼部尚书灵桂，刑部左侍郎绍祺、黄钰，右侍郎载崇、钱宝廉，联名给慈禧太后上奏折，对胡瑞澍的复审提出四点疑问：第一，（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到底去葛家否？第二，杨乃武在钱宝生的药铺买砒霜否？第三，（证人）王心培发现过杨乃武来葛家否？第四，刘锡彤之子参与此案否？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当天就降旨，令胡瑞澍将上述四个疑问审理清楚，“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

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知道慈禧太后的上谕后，十八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重申“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去葛家”，刘锡彤逼迫“钱宝生”写卖砒霜给杨乃武伪证词，还提出：

第一，余杭县监生吴玉琨曾到县衙作证，杨乃武十

了两次，没有动刑，想敷衍一下。他现在不大怕了，因为“钱宝生”（钱坦）于十一月十二日突然死去，他因何而死，至今是个悬案，死无对证，胡瑞澜长出了一口气。但他接到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才感到大事不妙，知道这批人到北京会说些什么，可面对煌煌圣旨，又束手无策。

光绪二年四月底，刑部先审讯杨乃武买砒霜事，吴玉琨、杨恭治、詹善政均证明杨乃武于十月初三至初六在南乡，不可能买砒霜，爱仁堂伙计杨小桥、钱宝生之母钱姚氏亦作证明杨乃武未买过砒霜。葛毕氏亦供出真实情况，承认在酷刑下诬陷了杨乃武。再审沈喻氏，也说了实话：儿子有“流火”症，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否被毒死，只请求验尸。又审王林、王心培，他们证实葛品连死前已病，不知中毒否。

刑部又审件作沈祥，沈祥说了实话：自己是个学习件作，葛品连到底因何而死，根本说不清楚，且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是沈彩泉让自己说是中砒毒的。

刑部复审结果上奏慈禧，请求将葛品连尸棺及刘锡彤、沈彩泉等押解北京，开棺验尸。九月十七日，得到慈禧太后同意，通知杨昌濬立即执行。

海会寺开棺验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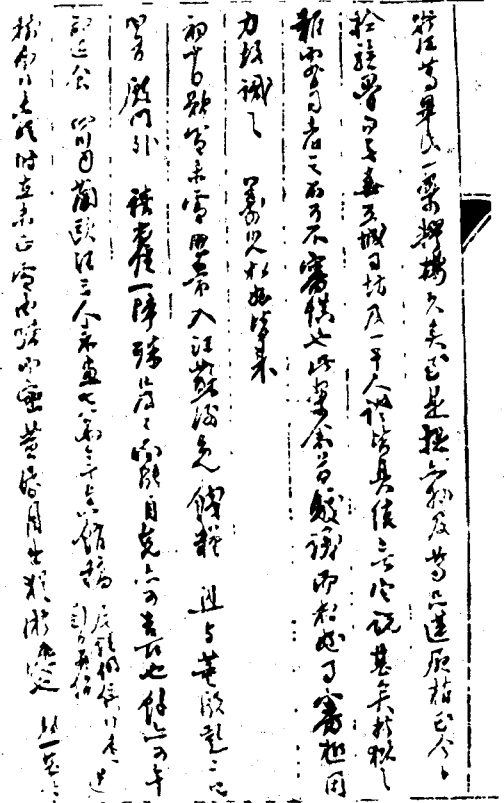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刘锡彤、沈彩泉和葛品连尸棺被押解到京，尸棺停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海会寺内。

刑部先提审刘锡彤，他只承认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因为他不是件作，可以不负责任，其他事概不承认。又提沈彩泉，他供出了如何逼迫钱坦证实杨乃武买砒霜的经过，在一旁的刘锡彤也顾不得官场规矩，举拳就打沈彩泉，堂上乱成一团，无法审讯，实则亦无须再审了。

必须证实葛品连是病死还是毒死，以便定案。十二月初九日，在海会寺开棺验尸。这一天，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以及证人们全到海会寺，开棺之前，先令刘锡彤查看封条，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件作开棺。

棺木打开，尸臭扑鼻，人死近三年，皮肉已腐烂，仅余骨髓。老练的件作一见骨头黄白，即断言：“因病身死”。刘锡彤明白这关系到自己前程乃至身家性命，还不死心，指着几块骨头，说是“青黑色”，件作说“外边青黑色，乃发霉所致，挫断骨头，里边黄白；若中毒，里边亦青黑色”。

刘锡彤仍绕着棺材细看，其实他什么也不懂。新任



翁同龢日记手迹

月初三日到南乡岳父家，初六才回余杭。而杨昌濬在报刑部时称杨乃武初三日买砒霜，初五日给葛毕氏，出现明显漏洞。因此胡瑞澜复审改为“初二日买砒霜”，并勒令吴玉琨将证词改为杨乃武“初五日回余杭”，以证明这天给她砒霜。

第二，胡瑞澜复审后，犯人与证人均不画押，无法结案，胡瑞澜令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一人代画八个人供词。

第三，若杨乃武真的初五给葛毕氏砒霜，葛品连初九日才发病，难道发病前四天杨乃武就能预料到吗？

都察院将十八人呈文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对胡瑞澜也不信任了。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传旨将本案犯人，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刑部京审洗沉冤

胡瑞澜先接到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上谕，草草审

刑部尚书皂保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刘锡彤自己才摘下顶戴,跪在刑部各官面前,承认“委系无毒,因病身死”。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以刑部尚书皂保领衔上奏,洋洋万言,以很大篇幅详细介绍了全案经过,结论为:“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伪证),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题结,胡瑞澐迁就复奏,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

有意思的是几位刑部官员也在探讨此冤狱形成的原因:杨乃武与刘锡彤都坚称,在此案之前,他们毫无私仇,案发后,刘锡彤也没有勒索杨乃武。刑部官员还发现,十一日早上沈喻氏上告,十二日审完杨乃武,即请求上司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中间没有间断。若企图勒索杨乃武,必然要耽擱几日,勒索不成,才上报,以此证实,刘锡彤不是贪官,那么,是否由于刘锡彤不能容忍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私呢?这几位刑部官员反复查阅案卷,并审讯人证,未有任何人证实他们通奸,在定案时,亦未指斥他们有奸情。那么,各级官员为何齐

心协力制造这起冤案呢?

当然,刑部官员们不可能认识到,在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下,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法制极不科学,极不健全;各级官员素质极差,愚昧、野蛮,只知严刑逼供,一味草菅人命,且吏治败坏,官官相护。这样的社会里,由这样的官吏办案,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的处理为:沈祥“杖八十,徒二年”;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陈鲁、郑锡津、杨昌濬、胡瑞澐均革职;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体仁“杖八十”。

自本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像变戏法似的突然“公正”起来,“公正”得令人啼笑皆非,这体现在对杨乃武和葛毕氏的处理。本来已给他们平反,但刑部官员依然认为:“无风不起浪,为何不冤枉别人,单冤枉你俩?”这句话,刘锡彤、陈鲁、杨昌濬、胡瑞澐全都讲过,今天,刑部官员也如此看法,并如此处理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玩笑,虽因图脱已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民,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杨乃武落个“杖一百,革去举人功名”。关于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陈湖、钱宝生、刘锡彤之子已死,未作处理。但刑部亦未调查钱宝生因何而死,乃本案一大疏漏。葛品连尸棺就近埋在京郊。

这件冤狱,慈禧太后共下十道上谕,才得平反。

余论

杨乃武自遭官司,家产荡然,以养蚕种桑为生。1914年9月,腿股间患疮疽,不治身死,葬于余杭县城西门外新庙前,年74岁。

葛毕氏回到余杭,孑然一身,万念俱灰,在余杭县城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中没有香火,以养鸡、猪谋衣食,了此残生。死于1930年,亦享年74岁,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

(责任编辑 王 恂)



慈禧太后(上图)共下十道上谕,杨乃武与葛毕氏冤案才得平反

明初削藩的悲喜剧

● 王世华

明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曾连续上演了两幕削藩的活剧。两剧的导演，一是建文帝，一是永乐帝。建文削藩，激成“靖难之变”，刀光剑影，干戈扰攘，结果皇冠落地，江山易主；永乐削藩，从容不迫，谈笑之间，恶藩被削，众王俯首。同样是削藩，为何结局竟有天壤之别？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问号。

明太祖大封藩

1368年，朱元璋在硝烟弥漫中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大明王朝。初登大宝的喜悦，并未冲淡他对巩固新政权的思虑。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全面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中，作为巩固明王朝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将诸子封藩建国。

皇子分封，古已有之。朱元璋重新祭起个这“古哲先王”的法宝，鉴于历代地方分裂割据和叛乱给中央皇权造成巨大威胁，使他下决心要为朱家的大明王朝建立道道巩固的藩篱，最牢固的藩篱当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朱元璋曾亲身参加过反元斗争，亲眼目睹元末军阀一个个拥兵自重，元朝中央政权孤立无援，最后仓惶北遁的惨况。元朝灭亡的事实，给了朱元璋一个错误的启示，以为实行了诸子封藩，中央王朝一旦危难之时，藩王就能提兵解困，勤王济危。所以他反复告谕群臣：天下这么大，必须建立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如今诸子既长，应该各有其爵封，分镇诸国。这样做，决不是私其所亲，而是为了长治久安之计。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诸子分封问题上，朱元璋大大失策了。因为汉代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死，这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祸乱，其根源就是分封，教训真够惨重的了。当时一个书生叶伯巨冒杀身灭族之祸，上书明太祖，坚决反对分封，他总结历史教训，尖锐指出：“分封隘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但朱元璋竟把这忠言谏论当作要离间皇帝与皇子之间的骨肉亲情。偏见导致固执，固执发展为专横，诸子分封终于在他手中完成了，而叶伯巨也为此送了性命。

洪武一朝分别在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六年进行了三次大分封。朱元璋有26个儿子和一个重孙，除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幼子朱楠出生逾月夭折未及分封外，实际分封了25位藩王。

为了使藩王能够起到“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作用，朱元璋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按规定，王府设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一万九千人。其实，这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象分封在北方边塞诸王，因为

要防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卷土重来，都拥有重兵和相当大的军事统率权，甚至连国公勋臣都受其节制。而且朱元璋还规定，一旦朝中出现奸臣，则所有亲王都要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诸王则统领镇兵讨平之。这样，诸王的权力和责任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了。

洪武三十一年，71岁的朱元璋大驾西归。他满以为诸子封藩为明王朝的大厦立下了一块长治久安的基石，却怎么也不会想到，此举恰恰给明王朝埋下了祸根。

建文削藩的悲剧

皇太子朱标本可以幸运地继位，可是天不假年，偏偏先其父而死，于是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当时诸王在朱允炆面前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之言行。朱允炆不能不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一日，他在东角门问太常卿黄子澄：“诸叔父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汉平七国之乱事为对，首次提出削夺诸王的建议。朱允炆闻之大喜曰：“吾获是谋无虑”。他把十分棘手的藩王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就决定了他在今后的削藩中只能采取简单的做法。

允炆继位，改元建文后，兵部尚书齐泰及黄子澄针对诸王“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一致建议削藩，这与朱允炆一拍即合。当时鲁王、秦王、晋王已先后在洪武朝病故，只剩下燕、代、肃、辽、庆、宁、谷等七王。强藩之首数燕王。故齐泰认为“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但黄子澄却以为，燕王久有准备，削夺很难一举成功。周王与燕王是同母兄弟，手足情深，不如先削周王，翦除燕王手足，然后再削燕就容易了。朱允炆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于是，削藩的帷幕拉开了。

既然要先除周王，于是就有人上告周王朱橚企图谋反。周王封于开封，建文不作任何调查，就命曹国公李景隆以率兵备边为名，假道开封，突围王府，逮捕周王。建文先将其流窜云南蒙化，后又召还，将其禁锢京师。

建文元年二月，下诏“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正式向世人宣布削夺藩王军权。

不久，湘王朱柏伪造宝钞事被揭发，又有人告发其招士马，欲谋反，建文乃令将士伪装成商旅，将兵器藏于车薪中，直趋荆州，并包围王宫。朱柏知道大祸临头，而且又无以自明，乃与宫人痛饮泣别，然后阖宫自焚。封于青州之齐王朱榑，平时在藩国内多行不法，也有人告其企图谋反，建文将其召至京师，废为庶人，与朱橚共同禁锢。代王朱桂在封国中贪虐不法，朝廷时有所

闻。建文采纳方孝孺策，令代王与其同母兄蜀王朱椿共处，朱椿素以贤藩闻名，建文企图使朱椿感化朱桂，后见收效不大，乃将其废为庶人，并幽于大同。接着，西平侯讨晟又上告云南岷王朱榘之过，建文又削其护卫，将其废为庶人，并迁徙漳州。

连削周、湘、齐、代、岷五王之后，下一步削藩所向，必指燕王。燕王朱棣早就看清了朝廷的意图，他当然不甘束手待毙，一直在积极准备起兵。又网罗术人异士，为其出谋划策。他还在府中深挖地穴，并建造重屋，围以高墙厚壁，日夜赶造军器。为掩人耳目，他令蓄养大群鹅鸭，以聒噪之声来掩盖打造军器的响声。

燕王反迹暴露无遗，建文密令先期派往监视朱棣的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叛变，反向燕王告密。朱棣决定誓师起兵，号称“靖难军（即平定国难）”。在誓师大会上，他慷慨陈词：

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绪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死。不得已者，又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

燕王起兵固然是因其早有觊觎之心，但建文对燕王的削藩又给他的起兵制造了口实。

当时在北方诸王中，最能与燕王抗衡的就是大宁宁王朱权和广宁辽王朱植。建文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正统地位争取二王的支持，以牵制乃至打击燕王。关键取决于建文对二王的信任程度。恰恰在这方面建文失策了。他听信朝中庸臣的建议，唯恐二王与燕王联合，使人召朱权至京师。五王的连续被削被禁，不能不使朱权怀疑此行凶多吉少，乃不至京师，建文就下诏削其三护卫。这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后来燕王正是利用宁王与朝廷的矛盾，略施小技，就拉拢了宁王，大大增加了燕王的力量。靖难兵起，建文又召辽王朱植，辽王奉命渡海归朝，这一举动本身就已表明了他忠于朝廷的心迹。但建文又未利用他对朝廷的忠心而委以牵制燕兵的重任，反而恐其为燕联合，不让其回广宁，而将其改封荆州，这又无疑解除了燕王的后顾之忧。建文的疑心病，造成他在宁王、辽王问题上的一再失误，其后果是严重的。

燕王起兵，建文削藩竟成泡影。战火弥漫了四个年头，朝廷方面由于用人不当，指挥失误，终于节节败退。狂澜即倒，回天无力。建文四年，燕师兵临京城（今南京），受命守卫金川门的谷王，见建文大势已去，首先开门迎降，燕师浩浩荡荡开进京城。这时宫中突然火

起，朱棣急令灭火，大火扑灭后，朱允炆不知所终，一说自焚，一说潜逃，总之以悲剧而告终。燕王朱棣终于登上皇位，他就是永乐皇帝。

永乐削藩的喜剧

永乐以藩王身份起兵，夺取皇位，他当然深知藩王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所以他即位后无疑要把削藩作为自己的既定方针。

但朱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削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首先亮出的不是藩王的削夺者而是藩王利益维护者的姿态。他将被建文削废的五位藩王，除湘王自焚外，其余四王全部复爵，并对他们大加赏赐，使得这些藩王皆大欢喜。

与此同时，朱棣又不动声色地将一些藩王改变封地。如宁王原封大宁，因助燕王靖难有功，当初朱棣曾有“事成中分天下”的许诺，但此时却矢口不提，宁王请改封苏州或杭州，均遭拒绝，最后改封南昌。

改封，使那些对永乐威胁较大的藩王脱离了原来经营已久的地盘和军队。这些藩王尽管有奇谋，善用兵，改封以后也只能如虎落平原，龙困浅水，难以兴风作浪了。领兵肃清沙漠、抵御蒙古残余势力的任务，已悄悄转移到朱棣亲信武臣手中，藩王统领重兵的格局也被打破了，解除了藩王对朝廷潜在的军事威胁。

一些藩王完全不懂得乃兄永乐帝的用心，把永乐对他们的优礼看成是对藩王利益的真心维护，于是他们自恃宗室之亲，得意忘形，骄纵不法，这正好给永乐提供了削夺的机会。

齐王朱榑骄纵残暴，复封后在青州城内阴结勇士，招纳王命，擅令校尉，甚至僭用帝号，用自己的护卫兵士守卫青州城，使地方守吏不得登城夜巡。他还任意拘留、监禁无罪之人。王府官吏李拱欲向朝廷举报，被其秘密关押，企图杀人灭口。消息传到朝廷，永乐完全可以凭此将其废削，但他为了不致引起其他藩王的疑惧，做得十分审慎。他先是赐书劝诫，希望他“涵养德性，宽以驭下，用保始终”。两天后，再次赐书劝谕。但朱榑不思悔改，我行我素，并欲图谋不轨。永乐第三次赐书，明确指出他“比为悖逆之事属矣”，质问他为什么“恬不知悔，恣肆日甚”。最后警告他：“非分之思，不可数得，王其省之，毋貽后悔”。这次朱榑似乎受到震

动，上表悔过，并要求来京谢罪。谁知来京后，廷臣交劾，朱榑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凶相毕露，疯狂叫嚣：“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耶？会尽斩此辈”。至此，朱榑的丑恶嘴脸已得到充分暴露，永乐顺从众意，下令罢去朱榑护卫亲军和王府官属，并将其留在京郊，不准返回封国。朱榑心怀不满，怨言啧啧。永乐四年，下诏削去朱榑及其子之爵位，废为庶人。朱榑成了永乐削废的第一个藩王。

第二个被削的是谷王朱穗。他也是凶残成性，驕暴妄为，抢夺民田，侵吞公税，杀无罪之人。王府长史虞延纲数谏，朱穗竟诬延纲诽谤，磔杀之。他又招匿亡命，演习兵法战阵，制造战舰、弓弩器械。大创佛寺，度僧千人，整日咒诅。尤其严重的是，他阴谋乘元旦向皇帝献灯之机，选壮士教之音乐，混入禁中，伺机谋变，还企图拉拢蜀王共同起事。蜀王向永乐告发其阴谋，于是永乐召朱穗入朝，并向大臣公布了朱穗的罪状，诸大臣同声请诛。朱棣引而不发，仍要诸王议其罪。如此慎行，一方面可以避免授人以口实，另一方面通过诸王议罪，又起到警告、教育诸王的作用。用心可谓良苦。周、蜀、楚等王认为朱穗违祖训，谋不轨，诛无赦。应该说，一切都已水到渠成了，但永乐为避免激化矛盾，仍不开杀戒，只是将朱穗及其二子削废为庶人。

宁王朱权改封南昌后，有人告其“巫蛊诽谤事”，永乐经过密查，属无中生有。但风声传到朱权耳里，深知永乐为人的朱权看破红尘，从此不问政治，洁身自保，自建精庐一区，莳花种竹，鼓琴读书。这种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使他与永乐始终相安无事。

周王朱橚复封后，由于对属下管教不严，府中违法违制事件时有发生。永乐多次赐书劝诫，朱橚也向永乐深陈悔罪改过之意。永乐后期，又有人屡告朱橚谋不轨，永乐召其入朝，朱橚顿首认罪。永乐亦以宽大，并未给予处分。聪明的朱橚立即主动交出三护卫官军。从此，朱橚也远离政治，以善述终其世。

岷、代、辽三王，因罪被革去护卫。其余的藩王因能俯首听命，奉制守法，永乐仍保留其封爵。

至此，永乐顺利地解决了明初藩王威胁中央集权的严重问题，彻底打破了藩王掌兵的格局，再也掀不起危及皇朝的狂飚。永乐导演的这出削藩喜剧，成功地降下了帷幕。

（责任编辑 徐 鲁 丁 末）

贵刊1995年第5期登载《天下第一‘血’——芷江修建抗战胜利受降城纪实》一文(以下简称“血文”)反映了在日本投降以后,侵华日军代表到芷江与中国军方代表洽谈投降和为此建立“受降城”的经过。

仔细看后,我认为“血文”有夸大历史事实和拔高其历史地位之嫌。

鉴于《炎黄春秋》以其严肃性、思想性、真实性、可读性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笔者试图对“血文”中的一些内容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湘西战役”不是中日的“最后大决战”

湘西战役是于1945年4月展开的。此时日军发动的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已经结束,粤汉、湘桂路沿线的中美空军基地已被日军完全占领,但中美又加强了湖北省的老河口和湖南省的芷江的空军基地,对日军平汉、津浦、粤汉、湘桂等铁路线及长江航运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日军决定以华北方面军一部、第六方面军一部,共约八万余人分别对老河口和芷江发动进攻,以解除这两个空军基地对其的威胁。中国军事当局为粉碎日军的企图,命令第四方面军(辖第十八、七十三、七十四、一〇〇军)和第三方面军之第二十七集团军(辖第九十四、二十六军)和第十集团军一部,共约二十万人,参加此次战役。

日军的进攻受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在制空权为中美空军完全掌握的情况下,日军伤亡惨重。新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5月9日下令终止湘西作战。中国军队乘胜反击,给日军以严重杀伤。此次战役,日军伤亡二万九千余人。

从中、日双方的历史资料查证,此次战役日军有夺取芷江的企图,但并无“血文”中所说的“直逼重庆”的目的。此次战役,日军惨败的程度远比不上台儿庄战役,近比不上缅北、滇西战役,“血文”说日军“全军覆没”,“成为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都是不妥当的。

军语中的“决战”,其定义是:“敌对双方使用主力进行决定胜负的作战”。中、日两军在湘西数县地区,以有限的兵力,企图达到局部的战役胜利的湘西战役,怎么说也够不上“最后大决战”的程度。

此外,芷江机场确实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后期,这是肯定的。但“血文”中说:“几乎每5分钟起降一架,有时甚至象一排排流弹出膛,随着指挥官的挥手,几十、上百架战机同时射向天穹……”也显然过头了。

二、在芷江应是“洽降”,不是“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日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日军投降原则。其中第二项指出:“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位于江西省东部一笔者)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命令。”

因为当时玉山机场不能使用,遂将地点改为湖南省的芷江。

8月21日11时15分,今井等一行所乘飞机在芷江机场降落。当日下午3时40分,今井等至中国陆军总部晋谒参谋长萧毅肃接洽投降事宜,并接受何应钦致冈村宁次备忘录。今井等于23日中午受到何应钦的接见后,离芷江回南京。当日下午,何应钦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答复记者提问时,透露日军投降书将在南京签字,时间在日本政府对盟国总投降书正式签字后的数日内。

9月9日9时,在南京中央军委礼堂,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受降典礼选择在南京举行,其意义是显然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日本侵占南京时,曾是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中央政权的所在地。

以上事实说明,湖南省芷江县仅仅是日军代表接洽投降的地点,并不是受降的地点。

三、不应把芷江“洽降”的历史意义抬得过高

中国人民在经过了1931年“九一八”后的局部抗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经历了14年的艰苦斗争,作出了重大牺牲,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芷江作为日军使者最早洽降的地点是值得纪念的。在此地建立一座纪念胜利的建筑物以教育后人,也是需要的。但因为仅仅是一个日军代表的洽降地点,而不是受降地点,所以不宜将它的历史意义抬得过高。

“血文”说“在机场东缘的七里桥处,中日双方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受降会谈’,‘宣告了侵华日军的最后失败’。这些说法都过头了。说把芷江建成‘游览圣地’,也显然不伦不类。

王人广

要用准确的语言表述历史事件

读《天下第一“血”》一文
的几点意见

妙手医顽疾 爱心济世人

——记研制糖尿病克星“王氏消渴膏”的王申大夫

● 冯海潮

当今糖尿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攻克这一顽疾，一直被医药界认为是一大难题。王申大夫经过潜心钻研，在继承祖传秘方的基础上，选用上好的海龙、海马、人参、黄芪、沉香等十几味名贵中药，用现代科学方法配制而成的外用药“王氏消渴膏”，其特点是内病外治，标本兼治，无副作用，疗效好，见效快。

自1995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医药咨询栏目中播出了“王申独辟蹊径除消渴(糖尿病)”的事迹后，各地前来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大量的咨询信件和电话倾注了对王大夫的希望和信赖。王申大夫的“消渴膏”确实也不负众望，一位家住北京的42岁的李艳红女士，患糖尿病已有七年，被疾病折磨得身体消瘦、体质虚弱、四肢无力，口干渴、气短、大便干燥、腰酸腿痛、手脚麻木、视力模糊、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她曾服用过多种药物，但病情未见好转。后经王大夫治疗，针灸气海穴贴敷消渴膏，同时口服消渴丸，仅用完两贴膏药，奇迹出现了，由原来的血糖168mg%降至135mg%，尿糖由原来的4个加号降至1个加号。该患者的精神、体力明显好转，合并症减少。当她第三次到医院就诊时就能骑自行车来了。

台湾荣军医院郭同化老先生，患糖尿病多年，四处求医疗效欠佳，来后用了个疗程的膏药，尿糖由4个加号降至2个加号，尿糖也正常了，双腿浮肿消退，精神感到轻松多了，在临走时，从我医院购了三个疗程的膏药，带回台湾。

王申大夫研制的“王氏消渴膏”经实验证明能修复损伤的胰腺组织，活化胰岛细胞的分泌水平，促进胰岛细胞的新陈代谢和胰岛素β细胞的再生。因此，对于胰岛素依赖性的糖尿病患者也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如家住北京永安西里的王风成先生，曾注射胰岛素达五年之久，自使用了“王氏消渴膏”之后就再也无须注射胰岛素了。由此看来此膏药的消渴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正如在鉴定会上著名中医专家祝湛予教授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消渴膏的疗效是肯定的。

王申大夫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医风也是特别让病人敬佩，他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对自费或经济十分困难的患者，他经常免费送药或只收药的成本费。王申大夫对病人疾苦很理解，经他治疗的病人不计其

数，但共同的感受是见到王申大夫倍感亲切，病就好许多。王申大夫和他的女儿王胜霞以一团火的热心为糖尿病患者精心调治，对行动不便的患者登门出诊从不收出诊费，甚至利用下班或休息时到病人家里去治疗。

更可喜的是王氏祖传秘方治疗糖尿病后继有人，王申大夫的女儿王胜霞在郑州医科大学毕业后，随父应诊，刻苦钻研中医理论，作出了显著成绩，被患者称为小王大夫。她撰写的《针灸配合：“消渴膏”外贴治疗糖尿病309例》、《消渴膏外贴治糖尿病及兼症315例小结》，分别在《中医杂志》和《中医外治杂志》上刊发。如今，她不仅是经常到外地应诊的老王大夫的得力助手，而且已独立应诊，受到患者的好评。

王氏父女决心攻克顽疾，为糖尿病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而努力工作着，他们对每一位病人都一样的耐心认真。同时，王氏父女为再开发新成药做更深入的探索。

王申大夫地址：北京市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空军后勤部医院

乘无轨电车107路宝钞胡同下车路北即到

邮编：100720

联系电话(010)6775085

赠擦鞋纸有奖征广告词

广东澄海东里绵来日用制品厂，向您免费赠送擦鞋纸样品试用。本品芳香、卫生，不用鞋油鞋刷，拉擦即亮。适应任何颜色皮鞋、旅游鞋、运动鞋、皮衣皮包及人造革、是旅游居家必备佳品。本品最适合专业业余推销。读者要来信写明是《炎黄春秋》的读者并付邮资2角即赠。敬告：本厂向广大读者征集有奖广告词，该词需要突出上述优点，需明了、简洁、通俗、易记，特设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奖金各1000元、300元、100元。词如被采纳，本厂通知您凭身份证复印件领取奖金。

代表：宋裔全 邮编：515829

注：以往获奖广告词举例“美鞋宝，令足下生辉，送礼旅游佳品”。

习惯性便秘

——健康与长寿的隐患

● 刘结平

纵观人类的生命史，谁都逃不了生老病死这一过程，死亡是必然的，但人类都是尽其天年而终的吗？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各国生物学家曾对动物、人类的衰老过程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人类的死亡大都因疾病而造成的，即“病理死亡”；而尽天年而终，即“生理死亡”却极为罕见。长生不老只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种美好愿望，千岁、万岁、万寿无疆的期望值最终仍是个零。人虽不能长生不老，但长寿尽其天年是可能的。

造成人类的衰老与死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习惯性便秘这一至今未被人们高度重视的常见多发病，却与人类的衰老及死亡有着极其密切的直接关系。

习惯性便秘是指经常反复出现的大便秘结不通、排便时间延长，或欲大便而艰涩不畅的一种病症。中医学认为其主要机理为：气虚传送无力，血虚肠道干涩，或因气滞瘀不能宣达，或阳虚体弱，阴寒内生，凝阴内结所致气机不畅，通降失常。

粪便被称为人体内的垃圾，在生理条件下应及时被清除，大便最好一天一次或两天一次。体内废物只有得到了及时的清除，方能保证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习惯性便秘使得粪便长期蓄积体内，一方面通过机械作用，使得胃肠道蠕动减慢，造成消化不良；另一方面通过化学作用产生毒素进入血液，给人体带来广泛的毒副作用而导致其它各类疾病的产生，并成为导致

死亡的各种危险疾病的直接诱因。这也正如古人所说：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滞”。

对习惯性便秘的治疗，人们早就作了深入的探索。19世纪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老年学家梅契尼科夫认为，衰老的起因是大肠中释放的毒素使人自身中毒，他推荐人饮用酸奶并切除大肠以缓衰老。当然这一方法难以被人接受。迄今为止现代医学也无一特效药物来根治这一疾病。然而中医学这一瑰宝在此方面却有着独特的优势。由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所长、中国咸阳保健品厂厂长来辉武教授根据中医内病外治、外病外治的理论，研制而成的505神功元气袋，对习惯性便秘的治疗作用已得到临床实验的证实及大量患者的首肯。其作用在于培补元气，补阴助阳，活血化瘀，使腑气得通，清阳得升，浊阴得降，而达阴平阳秘，强身免疫，抗衰防老之功效。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505神功元气袋内药粉可使老龄小白鼠红细胞内SOD（即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增高，有利于自由基的消除，即有延缓衰老的作用；美国野生果蝇吸入该药粉后比对照组平均寿命分别延长11.3%（雌性）及10.5%（雄性）；实验还证明本品具有提高耐缺氧、抗疲劳等功效。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而且是短暂的，生命的每时每刻对特定的人来说都是异常宝贵的。人人求长寿，长寿何处求？505神功元气袋将帮您实现您的愿望。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独家生产（严防仿制假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安分院医药保健研究所监制
 厂址：陕西咸阳市乐育北路19号
 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研制
 陕西咸阳五〇五医药保健总公司经销
 联系人：周华 邮政编码：712000
 电话：(0910) 213392 218328 216586
 传真：(0910) 218606 电挂：8286
 京卫药广审（文）第95060073—78号



炎黄春秋



东京审判: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君主立宪派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杨度

发动庐山兵谏的邓演达

洪深: 一身侠胆的中国“易卜生”

厉慧良五次为毛泽东演出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104号 邮发代号: 267 邮发代号: 62-501

定价: 1.30元